

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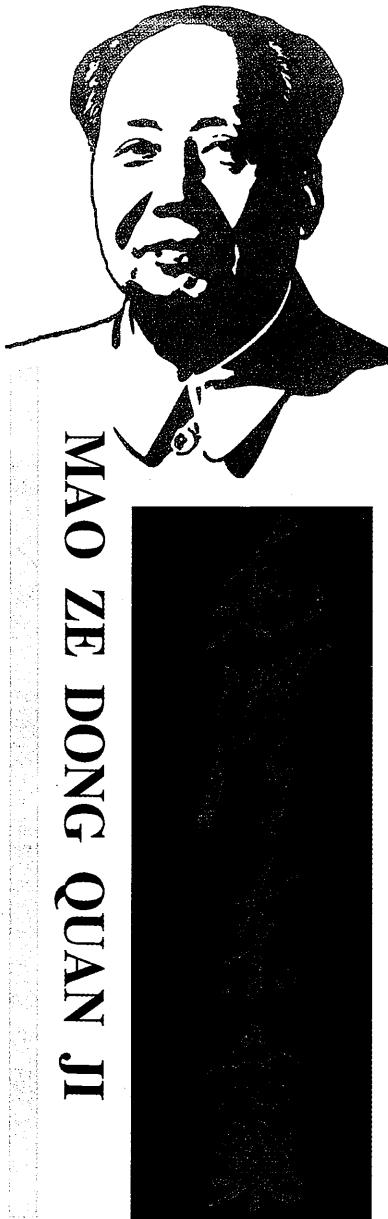
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0卷

毛泽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主编：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革 杨健桉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
(1936年12月)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70
(1936年12月)	
为李治题词	73
(1936年)	
准备对付亲日派进攻	77
(1937年1月1日)	
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	79
(1937年1月1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81
(1937年1月2日)	
关于通电拥蒋迎张揭破何应钦阴谋致周恩来、博古电	82
(1937年1月2日)	
谈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	83
(1937年1月2日)	
和张宗逊的谈话	84
(1937年1月3日)	
十五军团应出陕南	85
(1937年1月3日)	

关于罗炳辉部配合东北军作战等问题致王以哲电	86
(1937年1月3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87
(1937年1月5日)	
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致周恩来、博古电	88
(1937年1月5日)	
关于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电	89
(1937年1月5日)	
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致潘汉年电	91
(1937年1月5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92
(1937年1月5日)	
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	93
(1937年1月6日)	
野战军集中后的工作	94
(1937年1月7日)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给刘少奇的指示*	96
(1937年1月7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98
(1937年1月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	99
(1937年1月8日)	
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可分三步出击	101
(1937年1月8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102
(1937年1月8日)	

力主和平避免内战保持西北目前局面	103
(1937年1月9日)	
关于周恩来给蒋介石的信的内容致周恩来、博古电	104
(1937年1月9日)	
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	105
(1937年1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06
(1937年1月15日)	
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的条件致周恩来、博古电	107
(1937年1月16日)	
关于准备对三中全会提出建议书及要求张学良回陕等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电	108
(1937年1月18日)	
对张宗逊的指示	109
(1937年1月19日)	
致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电	110
(1937年1月20日)	
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111
(1937年1月20日)	
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工题词	112
(1937年1月20日)	
给马海德的信	114
(1937年1月20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116
(1937年1月21日)	
谈判原则和军事部署	117
(1937年1月21日)	

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	119
(1937年1月21日)	
和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	121
(1937年1月22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	124
(1937年1月22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126
(1937年1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127
(1937年1月24日)	
致潘汉年电	129
(1937年1月25日)	
要蒋介石手书消除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	130
(1937年1月25日)	
致周恩来等电	131
(1937年1月25日)	
关于目前谈判要点等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电	132
(1937年1月26日)	
致潘汉年电	133
(1937年1月26日)	
关于对南京让步说服左派撤兵致张闻天、周恩来等电	134
(1937年1月27日)	
致潘汉年电	135
(1937年1月27日)	
致周恩来、博古等电	136
(1937年1月28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137
(1937年1月29日)	
关于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致潘汉年电	138
(1937年1月29日)	
为《红色中华》报的题词	139
(1937年1月29日)	
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140
(1937年1月30日)	
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军应同进同退	146
(1937年1月30日)	
关于提醒杨虎城等对整个政治前途自信心致周恩来、博古电	147
(1937年1月30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148
(1937年1月31日)	
给李克农的信	149
(1937年1月31日)	
题财经工作联	150
(1937年1月)	
关于和平逐步实现，请蒋坚持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不变	
致潘汉年电	151
(1937年2月4日)	
致王以哲家属的唁电	152
(1937年2月4日)	
致周恩来电	153
(1937年2月8日)	
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谈话	154
(1937年2月9日)	

和南京谈判的主要内容.....	155
(1937年2月9日)	
和南京谈判的补充内容.....	157
(1937年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158
(1937年2月10日)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61
(1937年2月11日)	
关于和国民党谈判原则的批复.....	162
(1937年2月12日)	
向南京方面要求增加防地.....	164
(1937年2月14日)	
致周恩来电.....	166
(1937年2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宣传解释大纲*	167
(1937年2月15日)	
致周恩来电.....	170
(1937年2月18日)	
致周恩来等电.....	171
(1937年2月21日)	
致周恩来电.....	172
(1937年2月21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复彭德怀等电.....	173
(1937年2月2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174
(1937年2月24日)	

致周恩来来电	175
(1937年2月24日)	
致彭德怀等电	176
(1937年2月25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彭德怀等电	177
(1937年2月26日)	
致周昆、袁国平电	178
(1937年2月2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79
(1937年2月28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周恩来等电	181
(1937年2月28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182
(1937年3月1日)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183
(1937年3月1日)	
与国民党谈判红军编制和对付反蒋派的方针	204
(1937年3月1日)	
为抗大第二期第二队学员题词	205
(1937年3月2日)	
复周恩来电	206
(1937年3月3日)	
为抗大题写教育方针和校风	207
(1937年3月5日)	
关于周恩来赴南京谈判内容的批复	208
(1937年3月5日)	

致彭德怀等电	210
(1937年3月5日)	
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	211
(1937年3月6日)	
国共合作大局已定	212
(1937年3月7日)	
致周恩来电	213
(1937年3月9日)	
给埃德加·斯诺的信	214
(1937年3月10日)	
致周恩来电	216
(1937年3月11日)	
致周恩来等电	217
(1937年3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218
(1937年3月12日)	
致周恩来电	219
(1937年3月13日)	
致绥远追悼大会唁电	220
(1937年3月13日)	
致周恩来电	221
(1937年3月14日)	
致周恩来电	222
(1937年3月1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223
(1937年3月16日)	

在延安大扫除时的讲话	224
(1937年3月21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225
(1937年3月23日)	
致周昆、袁国平电	229
(1937年3月25日)	
复叶剑英电	230
(1937年3月26日)	
致周恩来等电	231
(1937年3月27日)	
现阶段的中日关系*	232
(1937年3月28日)	
给范长江的信	234
(1937年3月29日)	
四言诗·祭黄帝陵	236
(1937年3月)	
和南京谈判的两个原则	239
(1937年4月1日)	
关于西路军的善后问题致叶剑英电	243
(1937年4月3日)	
关于青年工作问题的讲话	244
(1937年4月10日)	
致潘汉年电	245
(1937年4月11日)	
在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训词	246
(1937年4月12日)	

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讲演	248
(1937年4月12日)	
致潘汉年电	253
(1937年4月12日)	
致叶剑英电	254
(1937年4月13日)	
致叶剑英电	255
(1937年4月16日)	
致叶剑英电	256
(1937年4月18日)	
致刘伯承、张浩等电	257
(1937年4月2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58
(1937年4月20日)	
复周小舟电	259
(1937年4月22日)	
关于党内组织上的一致问题的讲话	260
(1937年4月24日)	
致徐向前电	261
(1937年5月1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262
(1937年5月3日)	
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复周恩来电	281
(1937年5月5日)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282
(1937年5月8日)	

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解决的步骤.....	294
(1937年5月9日)	
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	295
(1937年5月10日)	
复李宗仁电.....	297
(1937年5月13日)	
关于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一事致周恩来电.....	298
(1937年5月14日)	
给西班牙人民与人民军的信.....	299
(1937年5月15日)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	302
(1937年5月15日)	
致李富春、黎林电.....	312
(1937年5月23日)	
会见蒋介石须谈两方面的问题.....	313
(1937年5月24日)	
和国民党谈判要点.....	314
(1937年5月25日)	
给抗大的信.....	315
(1937年5月28日)	
在欢迎中央考察团晚会上的讲话.....	316
(1937年5月29日)	
在延安纪念“五份”和欢迎“中央考察团”大会上的讲话.....	320
(1937年5月30日)	
为参加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题词.....	321
(1937年5月)	

观赏万花山牡丹时的谈话	323
(1937年5月3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324
(1937年6月3日)	
给郭化若的信	326
(1937年6月4日)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327
(1937年6月5日)	
复叶剑英电	334
(1937年6月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335
(1937年6月10日)	
致王世英电	336
(1937年6月12日)	
致潘汉年电	337
(1937年6月12日)	
在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338
(1937年6月20日)	
和美国学者T·A·彼森的谈话	339
(1937年6月22日、23日)	
和尼姆·韦尔斯的谈话	353
(1937年6月24日、7月4日、8月13日)	
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信	359
(1937年6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360
(1937年6月24日)	

致张云逸电	361
(1937年6月24日)	
给何香凝的信	362
(1937年6月25日)	
和廖承志的谈话	365
(1937年6月26日)	
致潘汉年电	367
(1937年6月26日)	
致叶剑英电	368
(1937年6月28日)	
致叶剑英电	369
(1937年6月2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370
(1937年6月29日)	
关于暑期各地学生来苏区参观的接待问题致彭德怀等电	372
(1937年6月30日)	
关于剿匪的基本方针	373
(1937年7月6日)	
为日军进攻卢沟桥致蒋介石电	375
(1937年7月8日)	
为日军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	378
(1937年7月8日)	
致叶剑英电	379
(1937年7月9日)	
致上海、太原、广西、西安党的负责人电	380
(1937年7月9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电	381
(1937年7月11日)	
关于对日作战方针的题字	382
(1937年7月13日)	
在延安全市共产党员及各革命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384
(1937年7月13日)	
致叶剑英电	386
(1937年7月13日)	
致王稼祥电	387
(1937年7月14日)	
军委主席团命令	388
(1937年7月14日)	
各地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	389
(1937年7月14日)	
致中共神府特委电	390
(1937年7月14日)	
致叶剑英电	391
(1937年7月14日)	
致红军各将领电	392
(1937年7月14日)	
红军政治工作决定要重新起草	393
(1937年7月15日)	
红军出动应做真实准备	394
(1937年7月15日)	
给阎锡山的信	395
(1937年7月15日)	

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	397
(1937年7月16日)	
给阎锡山的信	399
(1937年7月17日)	
蒋介石如不让步不再与谈	401
(1937年7月20日)	
为力保平津、张家口致阎锡山电	402
(1937年7月20日)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403
(1937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	411
(1937年7月23日)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	415
(1937年7月24日)	
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	416
(1937年7月25日)	
向蒋介石转达红军改编计划	417
(1937年7月28日)	
红军将领庆贺平津胜利通电	420
(1937年7月29日)	
实践论	422
(1937年7月)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	438
(1937年7月以前)	
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	481
(1937年8月1日)	

致周恩来等电	482
(1937年8月1日)	
在“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483
(1937年8月1日)	
致朱德、周恩来等电	485
(1937年8月1日)	
向南京面交国防计划等事	486
(1937年8月3日)	
对国防问题的意见	487
(1937年8月4日)	
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	489
(1937年8月4日)	
复彭德怀、任弼时电	490
(1937年8月5日)	
复朱德、周恩来、博古等电	491
(1937年8月5日)	
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	492
(1937年8月5日)	
在延安“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494
(1937年8月6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495
(1937年8月8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496
(1937年8月8日)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	497
(1937年8月9日)	

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态度	498
(1937年8月10日)	
致朱德、周恩来电	500
(1937年8月12日)	
和韦尔斯的谈话	501
(1937年8月13日)	
致彭德怀电	502
(1937年8月14日)	
复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电	503
(1937年8月14日)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欢送晚会上的讲话	504
(1937年8月15日)	
和丁玲的谈话	505
(1937年8月15日)	
红军主力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	506
(1937年8月17日)	
坚决不同意黄白案	507
(1937年8月18日)	
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	508
(1937年8月18日)	
给任弼时、邓小平的信	510
(1937年8月19日)	
致谢觉哉电	512
(1937年8月21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

(1936年12月)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

[1] 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5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在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转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随即在12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二年，即1936年，毛泽东又写了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

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般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

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

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两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两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

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

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

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

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廂〉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

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1]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2]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1] “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2] 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军事学家，著《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参见《孙子·谋攻》。

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

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1]，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

[1]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6年毛泽东著此文时，正是15年。

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1]和

[1]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1927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1]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的“左”倾机会主义^[2]，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

[1]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2] 193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

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1]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2]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

[1] 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1933年7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办法。到1934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2] 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

[1]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次代表大会^{〔1〕}）。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

[1]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5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

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拼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

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第四章 “围剿” 和反“围剿” ——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

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

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1]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

[1] 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北的长征。

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福建的两次“围剿”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1]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

[1] “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〇六年^[1]、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

[1] 指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页）。

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1]，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

[1] 1927年10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11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1928年3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领导指挥上的“左”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1]，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

[1]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自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1]，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

[1] 参见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

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

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1]。

春秋时候，鲁与齐^[2]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3]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1] 《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14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参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2] 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693年至前662年鲁国的国君。

[3] 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著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参见《左传·庄公十年》。

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1]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2]、吴蜀彝陵之战^[3]、秦晋淝水之战^[4]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1] “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何必廁身其间”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和“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轼可以望远。

[2] 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208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3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222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个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4] 公元383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60余万、骑兵27万、卫队3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8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1]、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2]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

[1]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10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1928年4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2]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9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0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許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

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 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 (二) 有利作战的阵地；
- (三) 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 (四) 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 (五) 使敌人疲劳沮丧；
- (六) 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

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個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

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

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团^[1]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2]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1] AB团是1926年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5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2] 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1]。

[1] 参见列宁《关于立刻单独媾和并签订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奇谈与怪论》《严重的教训与严重责任》《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等著作，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第七章第七节。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

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1]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

[1] 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

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

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十）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

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

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

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

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

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

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

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

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程度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

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

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动战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得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

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

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

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八节 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1]，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

[1]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8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3句至5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4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4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8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

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第九节 歼灭战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部分版本)。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

(1936年12月)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2]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3]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4]精兵。

[1] 给丁玲同志，1936年夏，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逃离被国民党囚禁3年多的南京，秘密经上海、北平、西安于11月来到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孔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出席。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她答“当红军”。她随后就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因此写这首词送她。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2] 保安，在陕西省西北部，当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1936年改名志丹县。

[3] 纤笔，细致描绘的笔，指丁玲的文笔。

[4] 毛瑟，德国毛瑟工厂所制造的步枪和手枪。孙中山在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枝笔胜于三千毛瑟枪。”

阵图开向陇山^[1]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1] 陇山，在陕西省陇县西北，延伸于陕甘边境。

山上红旗翻自由
而风漫掩松柏
保古人物一时休
川中闻宴会
招待生客人
铁军一枝独占红
三军已集精英发
障固同向险危山东
昨天元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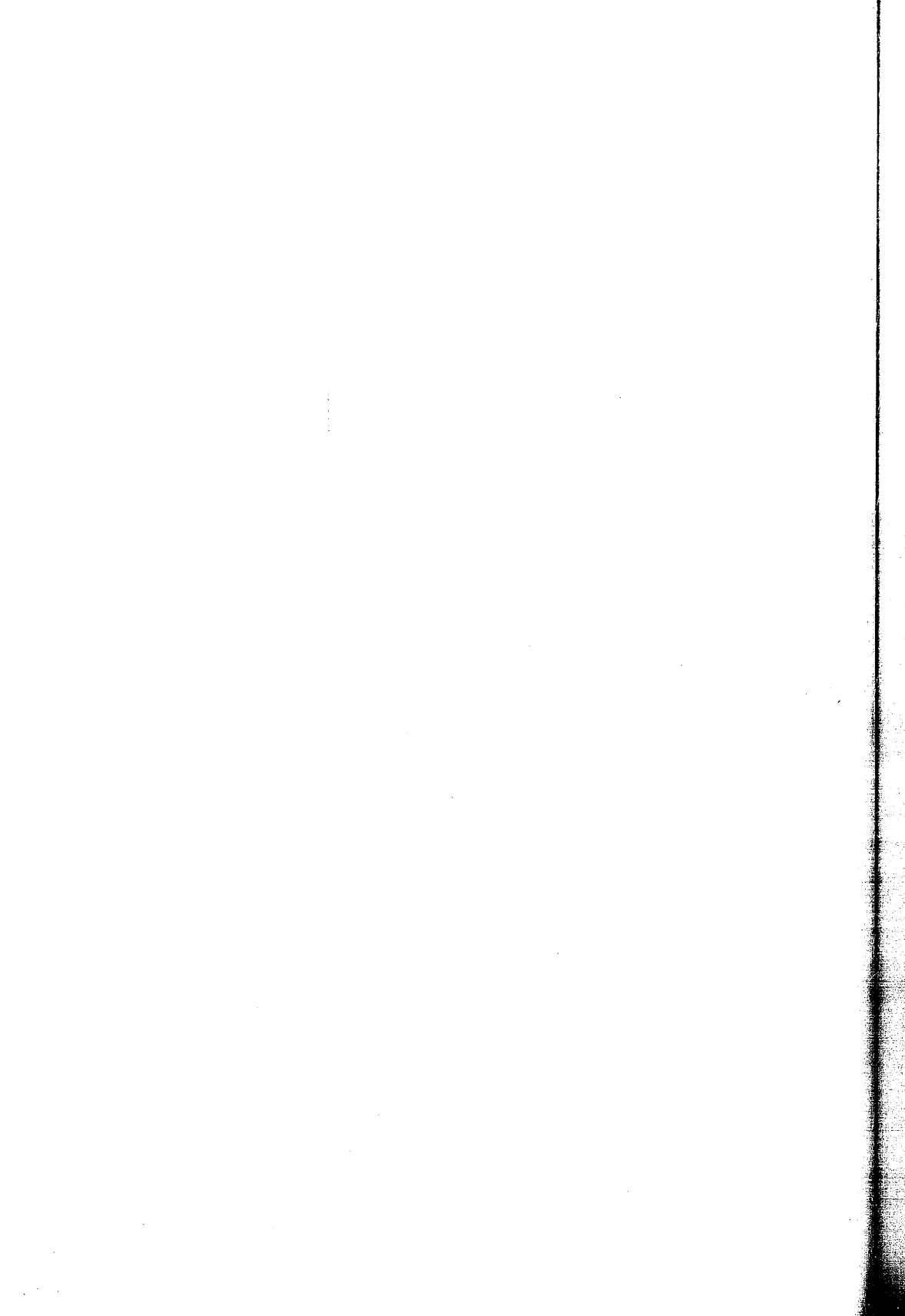
为李治题词^[1]

(1936年)

李治不能死！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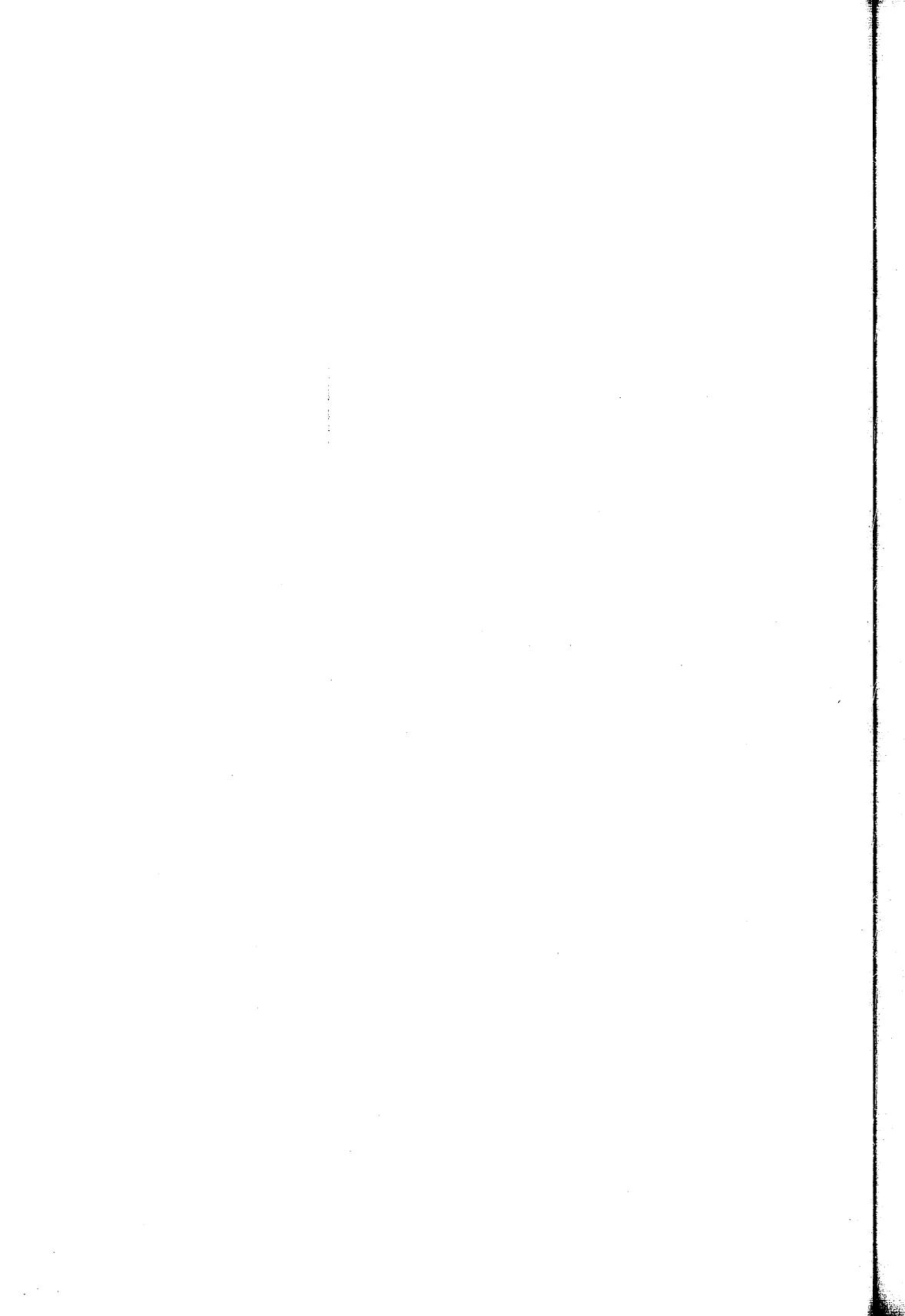
[1] 李治（1899—1989），原名李圣治，又名李守镜，江西省永新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卫生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长征中，曾救治过周恩来和贺子珍。长征胜利后，李治患重病，昏迷不醒。毛泽东除了派优秀医生给他治疗外，又委托贺子珍去看望他，并送给他亲笔写的字条：“李治不能死！ 毛泽东”



1937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



准备对付亲日派进攻^[1]

(1937年1月1日)

周、博，并告彭、任^[2]：

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李毅、进攻西安之危险。昨日何应钦^[3]令刘峙^[4]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本日何令李默庵^[5]，称张杨已与红军联合，形势紧急，该军应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

[1] 1936年12月25日，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在张学良陪同下返回洛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监禁张学良，并调集25个师部署于陕甘，从1937年1月起，重新逼近西安。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积极备战，准备支援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打退国民党军“讨逆”军的进攻。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周恩来和博古（秦邦宪）的电报。

[2] 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国民党军“讨逆”军总司令。

[4]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

[5] 李默庵，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第十师师长。

- 甲、与杨王^[1]筹商团结对敌。
- 乙、秘密通令东北西北两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
- 丙、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县、蓝田之阵地，为坚守计。
- 丁、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
- 戊、加紧晋、绥^[2]、川、桂、直、鲁之活动，反对内战。
- 己、布置张杨之后方。

毛泽东

一日二十四时

[1] 杨，指杨虎城。王，指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去南京后，在西安他是东北军的实际主持者之一。

[2]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1]

(1937年1月1日)

汉年同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委员长新政策之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此仅于政学系^[2]及日本有利，将给民族、国家及国民党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3]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

[1]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与国民党当局就红军的驻地、给养等问题进行谈判。本篇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的电报。

[2] 政学系，是对1916年由一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及进步党分子组成的官僚政客集团——政学会的通称。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它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前后，政学系一部分成员先后投靠蒋介石，帮助蒋介石建立和维持反革命统治，又成为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一，也被称为“新政学系”，其主要成员有黄郛、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

[3] 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孙哲生，即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冯焕章，即冯玉祥，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洽，并以结果电告。

又红军全部已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民党区域之企图。

毛 周

东午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2日)

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发展。

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通电拥蒋迎张 揭破何应钦阴谋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2日)

周、博：

甲、昨夜二局通报李默庵转何应钦世申电，中间脱落“中央派大员往前方改编，为使该部易于就范，应充分为军事之准备”。

乙、南京以王树常代李毅之阴谋已极明显。

丙、应立即通电拥蒋迎张反王，并准备以王以哲或于学忠代张职，着重揭穿何应钦之阴谋。因目前数日内敌布置还在秘密，最怕事先揭穿。

丁、速谋张、杨、我三军之团结。

毛泽东

一月二日十二时

谈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1]

(1937年1月2日)

自张学良被扣留南京的消息传出后，西安左派要积极起来，同时右派也要积极起来。南京方面，左派在奋斗中，亲日派也在大大活动。蒋介石的态度还不甚清楚。目前局势在混乱中，亲日派与各个右派结合起来，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弄坍西安，正向西安进军。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以下两点是不变的：一、与西安合作；二、打击亲日派，争取中间派。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改变态度，还要看一看。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和张宗逊的谈话^[1]

(1937年1月3日)

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但还会有斗争。

释放蒋介石是对的，有人^[2]主张杀掉蒋介石是不对的，杀了蒋介石有利于亲日派，不利于抗日。

[1] 1937年1月3日，张宗逊率红军大学学员到保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学校的情况。毛泽东和他谈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有关蒋介石飞回南京的情况。这是谈话的部分内容。

[2] 指张国焘。

十五军团应出陕南

(1937年1月3日)

彭、任^[1]:

十五军团出陕南有如下理由:

(一) 该地为影响数省之战略区域，为敌进攻之一翼。该军向陕南，不但可打击正向洋县集中之万耀煌王耀武^[2]两师，且可钳制正向商县进攻之李默庵李铁军^[3]，以保障西安右翼。

(二) 与陈先瑞^[4]配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

(三) 敌遇我军消灭其一个师左右，该战场之敌必立即停顿，我集中大兵无所用之。故十五军团出陕南有助于主力而不妨碍主力之作战。

毛泽东

三日二十时

[1] 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2] 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第十纵队指挥官兼第十三师师长。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第十纵队第五十一师师长。

[3] 李默庵、李铁军，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第十师师长和第九十五师师长。

[4] 陈先瑞，当时任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在陕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关于罗炳辉部配合东北军作战等问题 致王以哲电

(1937年1月3日)

鼎方兄：

(甲) 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惟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之胜利。

(乙) 罗炳辉军明日从大水坑向固原附近开进，配合兄部作战，大概五天至七天可达固原附近。

(丙) 我二十九军在定盐一带，一部向宁夏钳制马鸿逵，我独立师在三岔一带，我红军大学附属步兵学校在庆阳，请饬贵军与之连结。

弟 毛泽东叩
江亥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5日)

周、博：

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2]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你们速发拥蒋迎张通电。我们把朱老总谈话在上海散播。彭、任^[3]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

洛甫 泽东

1月5日21时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关于援救张学良给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的电报。

[2] 指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

[3] 指彭德怀、任弼时。

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 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5日)

周、博：

- (甲) 基本上同意你们商定的军事计划。
- (乙) 十五军团第一步到西安西南地区集结待命，准备或出东江口或出商县。
- (丙) 野战军主力集中旬邑、淳化地区待命。
- (丁) 请周注意补充二、四方面军的子弹，并发给十五军团一万元至二万元经费。

毛 朱 张
一月五日二十时

关于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 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5日)

周、博：

汉年四日由南京来电转上，他与张冲即来西安，关于此事处置我意如下：

甲、蒋、宋^[1]责备我们宣布西安协定无信义，我们回答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破坏信义。

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

- 一、立即撤兵。
- 二、立即释张学良回陕。
- 三、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

丙、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宋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但在撤兵释张改组政府实行后，即证明南京尚愿顾全信义时可去南京一行，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

[1] 蒋、宋，指蒋介石、宋子文。

丁、请在汉年、张冲来西安前，预先考虑并望飞告。

戊、电台应时刻联络。

毛泽东

五日二十二时

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 致潘汉年电

(1937年1月5日)

汉年同志：

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之条件：（一）停战撤兵。（二）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复彻底改组。（三）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地，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五）联俄并与英美合作。（六）西北交张学良处理。

宋子文要我派代表在上海与他接洽，你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洛毛
五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5日)

向张冲表示，只要南京军不开火，红军决不向南京军开火，仍处于调人地位。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1]

(1937年1月6日)

周、博：

- 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2]迎张^[3]。
- 乙、顾来则张杨^[4]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
- 丙、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可证。
- 丁、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5]已上了大当。

洛 泽

六日二十时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的电报。

[2] 顾，指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国民党军“讨逆”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3] 张，指张学良。

[4] 杨，指杨虎城。

[5] 宁，指江苏南京。

野战军集中后的工作

(1937年1月7日)

周、博，彭、任^[1]：

甲、野战军十号全部在耀县、三原、咸阳集中后，应于十二日以前（愈快愈好）完成下列工作：

（一）款项、弹药、被服、交通、通讯器材、军用地图及书报等交与应补充之各兵团，款项须发足两个月三十万元（对外说一个月）。

（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解释政治任务，鼓动作战。

（三）解释对友军^[2]关系。

（四）解释地方工作方针，严整群众纪律。

（五）努力扩红。

以上五项请彭任办理，并须深入战斗员。干部会议如可能时，拟请周博或罗瑞卿^[3]分往三原、咸阳参加。

乙、准备以主力（拟一、四方面军）出商洛^[4]，控制陕豫鄂边

[1] 周、博，指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当时是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2] 友军，指国民党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

[3] 罗瑞卿，当时是中共中央派往西安协助中共代表工作的成员。

[4] 商洛，指陕西商州和洛南。

境，留一部于渭北（拟二、四方面军），战略上突破敌人包围形势，使平汉^[1]陇海两路暴露于我面前，迫蒋^[2]就范。此项周办理。如何望复。

毛泽东

七日二十二时

[1]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2] 蒋，指蒋介石。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 给刘少奇的指示*

(1937年1月7日)

胡服：

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如下：

(一) 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

(二) 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三)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四) 为使中国从此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即应命令张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见。

(五) 但如南京政府不顾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在特赦令之后，仍将张氏幽禁于南京，并将已撤退之军队重新开回，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则内战之祸必将继起。这种内战应由南京政府完全负责。

(六) 本党将继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而奋斗，反对日寇及亲日派挑拨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本党这种主张，虽为全国人民所拥护，但总是遭日寇及亲日派所反对。因此，我们成了日寇及亲日派的攻击目标，并以此作为造成灭亡中国的“防共”协定的资本。

中央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7日)

西路军现占领高台、临泽，令其暂时在该地停住。但二马骑兵
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希望派飞机送子弹去，如有可能请设法
运送十万发。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 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

(1937年1月8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奉化蒋介石先生，各省党、政、军首长，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公鉴：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亲日派，均认为千载良机，以“拥蒋”为名，挑拨内战，以遂其灭亡中国之阴谋。当时本党、本政府及全国人民，南京与各省抗日志士，均主张和平解决，以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卒因蒋介石先生之接受张、杨二先生之抗日主张，张、杨二先生亦均以国家民族为重，致内战之祸，幸而得免。本党、本政府深庆国内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从此完全实现，红军主力亦正准备接受抗日命令，开赴前线，参加抗战。然而日寇与亲日派终不愿中国真正和平统一，见诸事实，当蒋介石先生一返南京，形势突趋险恶，在日寇援助下，亲日派一面扣留张汉卿先生，一面指挥已奉蒋先生命令正在撤退之中央军又向西安进攻，企图爆发空前之内战，为日寇效忠。日寇与亲日派的阴谋毒针，凡属国人，已洞若观火。当此危急关头，本党、本政府站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立场，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

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之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今日中国人心之向背，已显而易见，一切甘冒不韪、投降日寇之亲日分子，必将自趋于毁灭之途。全国人民团体与舆论机关，各武装部队，尤其是蒋介石先生及当权之国民党诸公与其大多数党员，亟宜一本救国至诚，起而裁制亲日派分子，化内战为抗战，此其时矣。临电不胜企祷之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一月八日

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可分三步出击

(1937年1月8日)

彭、任^[1]:

甲、到三原后，准备休息三天，情况许可，再延长至五天或七天，请规定工作日程。十五军团在咸阳亦然。

乙、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2]，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3]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但目前争取在三原、咸阳多休息几天，不致和平被敌人破坏，一时不向东出动。

毛泽东

八日二十四时

[1] 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2] 商洛，指陕西商州和洛南。

[3] 友军，指国民党军东北军和西北军。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8日)

解放社昨日广播过于尖锐，在没有开火以前，要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和平解决，攻击的锋芒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力主和平避免内战保持西北目前局面^[1]

(1937年1月9日)

周，并告彭、任：

甲、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此方针应使杨、何、孙、王、缪、刘、杜、黄^[2]及宣传委员会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传，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

乙、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商县方面加派杨部一团固守，但十五军团准备休息三天后开至商县待机。

洛毛

九日二十时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并告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杨，指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孙，指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指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缪，指缪澂流，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刘，指刘多荃，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杜，指杜斌丞，当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黄，指黄显声，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副军长。

关于周恩来给蒋介石的信的内容 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9日)

周、博：

汉年出去及周致蒋信内容：

(甲) 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要蒋限制一部分主战人物的不顾大局客观上帮助日本大损中国。及张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注意此点。

(乙) 撤兵组府请蒋一力主持不为外方所阻挠。

(丙) 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

(丁) 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

(戊) 措词不可太尖锐并须有恭维蒋初出时撤兵赦张顾全大局甚可钦佩的话，把主战责任放在何应钦一人身上，以留转圜余地。

(己) 汉年，可多留一二天不必明日就去，以利军事布置。

洛毛
九日十四时

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

(1937年1月11日)

周、博^[1]，并告彭、任^[2]：

过细考虑，红军主力以出商洛^[3]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转入豫西，敌中右两路无能为矣。使用二方面军及二十七军^[4]于蒲城，威胁陈诚^[5]集团之翼侧，使之不敢猛进，协助我主力在商洛之成功。请即取得杨^[6]之同意。如主力用于渭北，则战略上全处被动地位，战术上亦有许多困难，如彭任所顾虑者，故不宜取此方针。

毛泽东

十一日二十一时

[1] 周、博，指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当时是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

[2] 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商洛，指陕西商州和洛南。

[4] 二十七军，指1936年12月组建的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王平。

[5]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6] 杨，指杨虎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1月15日)

—

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

—

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2]、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过分的。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延安工作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金融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2] 白票，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苏票，指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

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的条件 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16日)

周、博：

- (甲) 杨、于即日通电就职。
- (乙) 向蒋交涉条件仍以你们前电各条为妥，因杨、于就职后南京更加无名，条件略高无妨碍，并为以后留出再退一步之余地。
- (丙) 条件中主要者为：
 - (一) 张回陕，顾驻洛。
 - (二) 华县以西属张、杨军。提出之语气尽量改得缓和些，可以不提红军。
- (丁) 携赴奉化以速为妙。

洛毛
十六日二十四时

关于准备对三中全会提出建议书 及要求张学良回陕等问题 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18日)

周、博：

(甲) 对三中全会，正由上海、华北两方策动一大的左派运动，西安方面望注意策动宁绥、川桂，我们亦准备提出建议书。

(乙) 南京已宣传陕北〈变〉即可告一段落。汪入京后左右派斗争当更趋激烈，内战对蒋系已处不利，和平解决之趋势已渐明显。杨、于、孙就职应与要求张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对后二事目前不应让步，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着之实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洛毛
一月十八日十四时

对张宗逊的指示^[1]

(1937年1月19日)

做好进城工作，要注意多交朋友，防止关门主义倾向。

[1] 毛泽东任命张宗逊兼任甘泉警备司令。赴任前，张宗逊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这是毛泽东给张宗逊的指示。

致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电

(1937年1月20日)

周、博、彭、任：

上海十五日情报：

一、京息：十二月二十七日蒋到京后，即会表示张、杨八项主张除容共联俄外，余可交三中全会讨论，又云暂时可由汪精卫过渡行政院长以后是否由宋子文长行政院，要看英美派如何做法而定，检查过去消息，仍可作参考。

二、十六晚京息：以前力主扣留张的何应钦，现亦云要放张回西安，因西安已赤化，不在乎一个张学良。

三、蒋表示谋和平解决西安，而不改变反共政策，京方以杨、张软化东北军、西北军。以赤化相恐吓，令与红军分裂。

四、汪现有上台过渡形势。

五、陈诚已去山西布置军事，以胡、关二部包围于学忠，杨等从绥撤陕，中央军对山西红军部队作孤〈弧〉形包围。

六、二宋^[1]仍在奉化。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十八时

[1] 指宋子文、宋美龄。

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1]

(1937年1月20日)

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1] 抗日红军大学第一、第二校由保安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这是毛泽东在抗大第二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的一部分。

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工题词

(1937年1月20日)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毛泽东

忠誠教育
事業第一

毛泽东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工的题词。

给马海德的信^[1]

(1937年1月20日)

马海德同志：

照片一张，请附在你的信内寄给施乐先生为感。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

[1] 1937年1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马海德，请他将一张有自己签名的照片转给斯诺。

馬海德同志：
照此一函請附在你信
內。施樂先生為感
毛泽东
八月

毛泽东致马海德信的手稿。

馬海德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21日)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二十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谈判原则和军事部署^[1]

(1937年1月21日)

周、博，并告彭、任：

甲、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2]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

乙、无论和战，应使杨、孙、何、王、于、缪、刘^[3]及左派自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并告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军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1936年12月12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3] 杨，指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孙，指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骑兵军军长。王，指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于，指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缪，指缪澂流，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刘，指刘多荃，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

已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免致不利时招怨。

丙、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阳、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同意让出各该县。

丁、西路军东进，徐陈电^[1]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2]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

戊、汉年^[3]从南京来长电述蒋^[4]答复周信之意见，内容与米春霖李志刚^[5]所述略同，我们复电要求保证。

洛毛

二十一日二十时

[1] 指1937年1月21日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给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相机取凉、古接通兰州，增援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2] 文、武、成、康，指甘肃文县、武都、成县和康县。

[3] 汉年，即潘汉年，1936年至1937年任中国共产党与南京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的代表。

[4] 蒋，指蒋介石。

[5] 米春霖，曾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李志刚，当时是杨虎城派驻南京的代表。1936年12月下旬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南京遭扣留后，为营救张学良，杨虎城曾于1937年1月派米、李分别代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由西安飞往南京进行交涉。

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 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

(1937年1月21日)

汉年同志：

电悉。

(甲) 我们自始即主张和平，决不愿意战争。

(乙) 但南京讨伐与剿共空气又形高涨，刘峙^[2]谈话尤为显然，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确有团结对外之诚意。

(丙) 我们可保证，一方面红军只要有适当驻地与相当给养，不但不向白区作任何攻击行为，而且停止打土豪，目前红军已实行此两点。另方面可向西安当局进言，服从蒋先生及南京。杨、于、孙^[3]已通电就职并取消临时组织。剩下仅一适当分配防区与张汉卿回陕问题，此须蒋先生从大处着眼，采取适当办法以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心。蒋能如此，我们当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赞助蒋先生，团结各方一致对外，但蒋先生须给我们以具体的保证。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

[2]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豫皖绥靖公署主任。

[3] 指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

(丁) 我们要求蒋先生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望与蒋先生商量这种保证问题。

毛泽东 周恩来

一九三七年一月马亥

和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1]

(1937年1月22日)

汉年同志：

本日十一时电悉。答复如次：

甲、红军干部所担心的是继续“剿共”战争的危险问题，这种可能如果存在，则红军束缚于渭水黄河之间是危险的。因为现有红军实数即照过去一样仅发很少的伙食钱，每月也需五十余万元，以后停止打土豪将决无办法，这是第一。庆阳、淳化、富县、延安等县粮食极少，多兵久驻，亦绝无办法，这是第二。因此要求：第一，蒋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我们并不要求商洛大道及汉中等要地，但请指定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上述各县本来大部是苏区。至红军主力则请指定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2]、旬邑、淳

[1] 由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一致要求，由于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了对付国民党军“讨逆”军的充分准备，西安事变后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终于得以制止。中国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及红军驻地、给养等问题进行谈判。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给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谈判代表潘汉年的电报。

[2] 西峰，旧镇名，即今甘肃西峰市。

化、中部^[1]、洛川、富县、甘泉、肤施^[2]、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3]等十五县三镇^[4]。我们本来拟请蒋调去陕北二高^[5]及宁夏马鸿逵^[6]，以其防地让与红军，但在目前恐增加蒋之困难，留待将来可能时再商。此外红军在肃州^[7]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8]进攻，则令马军让出凉州^[9]以西各城，使其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则请速办。

乙、对张杨^[10]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确定爱护政策，其方式宜表现在防地分配及对张杨二人之待遇上。在一致对日立场上，他们决不会造成割据及妨碍国防政策的，假如他们不对，我们当同蒋一道干涉他们。他们现在所顾虑的，完全在事件解决后，抗日主张实现与部队之保存恐无保证，蒋应于此点施以宽大，以安其心，在共同对付日本与汉奸面前，是决不会也不能与蒋分歧的。

[1] 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2] 肤施，旧县名，即今陕西延安。

[3] 瓦窑堡，镇名，今为陕西子长县县治。安边，位于今陕西定边县东部，1935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曾置安边县，1949年10月撤销。豫旺，旧县名，即今宁夏同心县。

[4] 按原文所列是十五县两个镇。

[5] 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和第八十六师师长。

[6]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路军总司令、“讨逆”军第三预备军总司令。

[7] 肃州，旧府名，即甘肃酒泉。

[8] 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军军长。

[9] 凉州，旧府名，即甘肃武威。

[10] 张，指张学良，当时已被蒋介石扣押。杨，指杨虎城。

丙、向蒋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毛泽东 周恩来
二十二日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1]

(1937年1月22日)

汉年^[2]同志：

甲、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3]以宽大，以安其心。

乙、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

(一) 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

(二) 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

[1]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监禁了张学良，并调集25个师部署于陕甘，从1937年1月起重新逼近西安。与此同时，派人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东北军调豫皖，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在周恩来的斡旋说服下，杨虎城表示可以接受甲案。本篇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就和谈问题给驻南京的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的电报。后蒋介石托宋子文答复潘汉年，同意联合抗日。

[2] 汉年，即潘汉年，1936年至1937年任中国共产党与南京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的代表。

[3] 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

(三) 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可不驻商洛^[1]）因为合水、庆阳、正宁、淳化、富县、肤施^[2]等地，粮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驻别处。

(四) 请令马步芳^[3]停止进攻河西红军^[4]。

丙、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以便很好的准备抗日，要求蒋亲笔答复恩来一信，我们可保证绝对守秘密，因为红军干部尚有许多怀疑者。

丁、西安现没有什么变化，红军亦未宣传与张、杨联合。西安供给了一个月经费，因此红军停止了打土豪〈豪〉。亲日派的造谣，蒋不应相信。

戊、美国女记者斯密特莱，西安事变后在西安所作的错误宣传，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

毛泽东 周恩来

二十二日午

[1] 商洛，指陕西省商州和洛南。

[2] 肤施，即今陕西省延安。

[3] 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军军长。

[4] 河西红军，指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在黄河以西作战的西路军。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23日)

西路军已于二十一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十天行程到达黄河边。甲、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乙、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丙、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接应西路军东进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1月24日)

—

和平问题主要看我们决定，问题是如何保证。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划清防地，第三保证给养。蒋介石有电报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地方，我们提出了八个地方，我们有了这些地方，可以监视他们并同四川取得联系。关于防地，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增加瓦窑堡以及豫旺等。蒋介石已答应凉州以西归我们，令马步芳不要进攻。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中国有理；西安与南京，西安有理。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再次发言的一部分。

—

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对西安事变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西安事变将蒋扣留，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释放蒋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了和平，我们的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时提出了抗日没有放弃反蒋，然而在五月间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以后。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

致潘汉年电^[1]

(1937年1月25日)

全部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每月伙食费至少需一百万元。如照国民革命军待遇，发给薪饷再加购买费，每月至少一百二十万元。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红军经费等问题致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

要蒋介石手书消除疑虑 即可彻底和平解决^[1]

(1937年1月25日)

汉年同志：

电悉。

(甲) 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

(乙) 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

(丙) 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2]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毛泽东 周恩来

有午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

[2] 指马步芳的军队。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1月25日)

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

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后，应注意张、杨两军内部间以及与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目前谈判要点等问题 致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电

(1937年1月26日)

周、博、王：

(甲) 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陕甘不驻多兵与红军一部驻陕南，后者由汉年交涉，前者应由杨向顾祝同严重提出，要求不超过十个师至低不超过事变前数目。蒋如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无拒绝此点之理由。

(乙) 严重注意左派的过左情绪，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说服左派，我们不宜说得过多。

(丙) 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二十时

致潘汉年电

(1937年1月26日)

汉年同志：

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毛泽东 周恩来

二十六日

关于对南京让步说服左派撤兵 致张闻天、周恩来等电

(1937年1月27日)

洛，周、博，王，彭、任各同志：

(甲) 无论从那一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不〕应对南京让步。

(乙) 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

(丙) 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

(丁) 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的新的战争。

毛 朱 张

二十七日二十时

(1937.1.)

致潘汉年电

(1937年1月27日)

汉年同志：

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毛泽东

二十七日

致周恩来、博古等电^[1]

(1937年1月28日)

罗、宋^[2]所部可出平凉。西路军东进至山丹的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枝。请与王以哲交涉，罗、宋所部开至平凉附近策应，防胡宗南军由天水东进。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以西策应西路军。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罗，指罗炳辉，当时任红三十二军军长。宋，指宋时轮，当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29日)

蒋介石令胡宗南绕过难攻的据点，向西安进逼，已达静宁、会宁地区。

判断蒋意，仍以军事威胁求不战解决问题，因正面不好进，故从天水、汉中两方前进，威胁西安，以此尚有相当时间，以利交涉与说服左派。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 致潘汉年电

(1937年1月29日)

汉年同志：

(甲) 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与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乙) 关于北军北路军^[1]撤兵问题，见另电。

毛泽东 周恩来

二十九日午

[1] 另一份文件此处为“东北军十七路军”。

为《红色中华》报的题词

(1937年1月29日)

努力学习。

为徐特立^[1]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1937年1月30日)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2]，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臜龌龊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

[1]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2] 徐特立1913年至1919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毛泽东曾在那里求学。

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延安

徐老同志。

你是我工作前的先生，你现在的
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永远是
我的先生。去年中秋的时候，许多老
友至主席团下榻处，你特甚已跑
到新友邸去了，至十一月上旬就天
地大变，而且你的健康急转
直下，那时已今长期的服药
治疗中，你比往常年壮年竟更衰弱
和消瘦，精神萎靡，连虚心学习写
稿的东西。什麼？什麼？你身体第二
行？什麼？国际形势？在席面前

却障眼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先
却做了最害己利的猪。你是嘴
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
本性品行本相机，却偏要高谈阔论。
你是心虚的！但是嘴说的多，做
的少，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
角落，却贮藏着一些肮脏阴暗
贪婪的东西。你是徘徊时候却是
同群众在一起的，而在有些人却以
争当所谓群众为快事。你是空虚地
自己到空虚尾到的与群众分离，这样
而已，而在有些人却似充塞虚空。

中博士家的自己至乞怜哀告。你
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自己
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自己
第一。你像是捷报事做，民系也工躲
避责任，而在别人则只敢惹捷报
好事做，遇到捷报后的唯独就
躲避了。动听这些方面我都是
佩服你的，乐意继续地予以
你，也愿意乞求同共你写
你，当你二十岁生日的时候

写这封信祝你，祝你健康，
幸福长寿，祝你成为一个革命党人
与全世界人民的模范。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一月廿九日
于延安。

毛泽东致徐特立信的手稿。



毛泽东和他青年时代的老师徐特立在保安。



《毛泽东与徐特立》(中国画)



《师生》(中国画)

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军应同进同退^[1]

(1937年1月30日)

周、博，洛，王，彭、任^[2]：

我们意见如下：

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3]的基本方针。

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毛 朱 张

三十日二十四时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给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的电报。

[2] 洛，指洛甫，即张闻天，当时在西安。王，指王稼祥，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

关于提醒杨虎城等对整个政治前途 自信心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30日)

周、博：

(甲) 杨说愿意做我们政策牺牲品，应向他说明此政策非我们的，乃张、杨与我们共同的。提醒他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的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

(乙) 对东北军宜以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电为根据说话，说明张之意见是正确的。

(丙) 杨之绥署宜设三原，王树常宜来。

(丁) 杨如不愿放弃富、甘两城，可仍交还他，我们驻乡下可也。

毛泽东

三十日三时半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31日)

我们与张、杨两部应取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之方针，我们立场已向南京表时，即打亦不至基本妨碍我们方针，无论打胜打败，结果仍是讲和，但对张、杨两部影响较好。当然在打之前，力争张回，而免去打。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给李克农的信^[1]

(1937年1月31日)

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1] 这是毛泽东致李克农信的主要内容。

题财经工作联^[1]

(1937年1月)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1] 这是1937年毛泽东提出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再次明确强调了这个总方针。

关于和平逐步实现，请蒋坚持 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不变 致潘汉年电

(1937年2月4日)

汉年：

甲、接恩来电，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杀王事件东北军各将领均欲追究祸首，激烈派已悔过认罪，离队远避。

乙、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七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

丙、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我们诚意为国为蒋，要蒋不要认〔为〕我们所提建议含有外交性，我们对蒋无任何外交用意。

丁、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来』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戊、如何望复。

毛泽东
支午

致王以哲家属的唁电

(1937年2月4日)

杨主任虎城先生、于主席孝侯先生转王鼎芳先生之家属诸君大鉴：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遂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

毛泽东 朱德 张国焘

四日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2月8日)

请与顾祝同面商：防地必须增加金积、灵武、中宁、豫旺、安边、宁条梁、瓦窑堡、清涧、宜川等处。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谈话^[1]

(1937年2月9日)

—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不应当搞广昌大决战，不应同陈诚指挥的主力硬拼。应当暂时放弃苏区，分红军为四路，猛出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施以佯攻，以诱动江西兵力，然后择弱点一战，胜而后回江西，再突破弱的方面，则苏区可以保全。

—

希望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放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名义。有人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这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

[1] 1937年2月9日傍晚，《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到达延安，毛泽东出席欢迎宴会。晚10时，在凤凰山住处会见范长江，彻夜长谈。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一段谈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共产党现时的要求的一段谈话。

和南京谈判的主要内容^[1]

(1937年2月9日)

周：

- (一) 关于和宁方^[2]交涉之政治的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3]。
- (二) 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4]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5]正彭^[6]副。^[7]
- (三) 饷项，如对方允即改番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
- (四) 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的电报。

[2] 指南京国民党政府。

[3] 指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电报。

[4]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徐，指徐向前，当时任红军西路军总指挥。

[5] 朱，指朱德。

[6]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

[7] 1937年2月1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补充提出：“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

(五) 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长江^[1]明日回)

毛 洛

九日二十三时

[1] 长江，即范长江，新闻工作者。当时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延安采访，2月10日回西安。

和南京谈判的补充内容^[1]

(1937年2月10日)

周：

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治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

洛毛

二月十日午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的电报。

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1937年2月10日)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 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 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 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 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 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四)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

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并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

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先生蓋：

兩者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自此和平統一圓滿完成，方針得以實現，實為我民族之福。吾日曷忘！中華民族之存亡，千鈞一髮之際，本黨深望貴共三中全會，由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

(一) 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全國之力一致對外；

(二) 各派代表就社會主義釋放一切政治犯；

(三) 召集各黨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民共同救國；

(四) 訂定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五) 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貴先生等全公眾能賴此大典確定，此固深幸。特此請示，本黨為表示因應之誠意，明繪貴黨三中全會以下之保證：

(一) 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暴亂動方針；

(二) 當維持政府政令，維護國民政府，並軍政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中央及中央政府委員會之指導；

(三) 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善後的徹底的民主制度；

(四)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領導。

特此致謝，請予轉示。

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
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937年2月11日)

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我们这种估计是从去年九月开始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我们过去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全国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巩固和平的政策，应向着联合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我们的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上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关于和国民党谈判原则的批复^[1]

(1937年2月12日)

周：

下列各事请注意：

(甲) 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真调走，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因为现有的防地实在不够。但我们不是促成东北军调走，而是东北军调走后无可避免时，至要求整个陕北与宁夏，前已向南京提出，此时亦宜提一提。但为不增加蒋之困难，允候将来再商。

(乙) 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

(丙) 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宣调来陕甘集中。

(丁) 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

(戊) 经费须从二月领起。

(己) 致三中全会电中所述要求他们实行五条，则我们实行四条，你谈判时应同时提出，否则彼方将迫我方再让步，实际在我方者是最低条件，勿要再让。且实行尚需时间（说服干部与民众大不易），只有要求彼方实行五条，方能避免迫我再让与立即实行。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的电报。

(庚) 三中全会孙夫人等左派不可太突出，提议宜先问蒋，估计蒋不能采纳者则不提此点，请告汉年。

洛毛

十二日三时

向南京方面要求增加防地^[1]

(1937年2月14日)

周：

甲、立即派飞机来接伯承^[2]。

乙、借十五军团北调允许增加防地之机会，要求金积^[3]、灵武、中宁、豫旺^[4]、清涧、宜川六县及安边地区（包括宁条梁及靖边以北）与瓦窑堡^[5]。此外无定河下流两岸直至黄河，包括河口、川口、马灰坪、枣林坪一带原有苏区，现驻李仙洲^[6]部须退出。

丙、宁夏及整个陕北亦应提及，但可将来再商。

丁、蒋^[7]指定凉州^[8]以西，甘州府、肃州府^[9]及安西州^[10]所有各县在内。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2] 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

[3]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4] 豫旺，旧县名，即今宁夏同心县。

[5] 瓦窑堡，镇名，今为陕西子长县县治。

[6]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7] 蒋，指蒋介石。

[8] 凉州，旧府名，即甘肃武威。

[9] 甘州府、肃州府，均为旧府名，即甘肃张掖和酒泉。

[10] 安西州，旧府名，即甘肃安西。

戊、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1]部退出该地。

己、以上请斟酌办法。

毛

十四日二时

[1] 马，指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军军长。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2月15日)

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 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宣传解释大纲*

(1937年2月15日)

(一) 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国内战争，结果分裂中国，便利于日本之侵略与汉奸之卖国；一是国内和平，结果团结中国，便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对日抗战之实现。

(二) 中央采取一贯的和平方针，避免了战争危险，基本上建立了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

(三) 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对此任务，我们须给予极大的努力。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即为执行此种新任务的具体方向。

(四) 我们要求国民党实行下列各条：

- 甲、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 乙、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 丙、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 丁、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 戊、改善人民生活。

(五) 如果国民党能够保证实行上列各条，即是说国民党放弃了他们过去的老政策，采取了上述的新政策，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在全国形成了，对日抗战就有了基础了。

(六) 我们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之目的，愿意向国民党及全国保证实行下列各条：

甲、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

乙、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丙、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

丁、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七) 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地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便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便于迅速实行对日抗战。这是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案与去年九月决议案的具体实行步骤之一部分。

(八) 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分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不能恢复苏区土地剥削制度，而要继续保障土地在农民手中。但在全国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必须没收汉奸分子的土地。

(九) 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以来一贯执行的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以来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仅能执行这样的路线；一九三五年党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案以来，我们一贯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与为着

彻底执行此路线，现在又提出取消苏维埃制度与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只能够执行这样的路线。

(十) 总之中央的政策是从团结全国抗日救亡的历史任务出发，从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出发，全党的同志都应彻底了解中央的政策，团结在中央政策的周围，为民族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而斗争。

中共中央
二月十五日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2月18日)

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2月21日)

桂代表本日返三原，令其速赴川、桂、粤活动。京、沪两方小开^[2]负责。山西彭雪枫回。直、鲁暂时无办法，过一时再说，但唐则民即可回津。各方活动均以巩固和平促成抗战为目标。

后方已实行裁员减膳，党政军共裁两千多人，伙食费每人每月不超过三元。

[1] 这是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小开，即潘汉年。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2月21日)

目前重点在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一) 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二) 前方三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2]谈话应着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伯承，即刘伯承，当时在西安参与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复彭德怀等电^[1]

(1937年2月22日)

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到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复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刘伯承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2月24日)

苏区工作委员会可暂不成立，中央在此，特区政府当然要归中央管，不归工作委员会管。

[1] 1937年2月2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人事安排和特区组织机构问题。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2月24日)

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37年2月25日)

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讨论拟稍等一等，目前着重对南京关系各具体问题的解决及前方部队的训练。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彭德怀等电^[1]

(1937年2月26日)

甲、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乙、立即准备完毕。丙、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丁、对外守秘。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电的主要内容。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

致周昆、袁国平电^[1]

(1937年2月27日)

现因准备增援西路军，须立即整理工兵连，并用大力在三天内招雇并准办匠工、器具、物料等，以每天造一只大型船为度。

[1] 这是毛泽东致抗大第二分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周昆和政治委员袁国平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2月28日)

(一) 西安事变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偶然地仓促地发生的，是不能事前准备的，并且转了很多弯，以后也少有。工作要按照政治情况急速地变化，在这里表现出与地方工作的隔离，我们定下来的方针与地方工作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我们在急速转变的环境中，大的方面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这是好的。不过在总方针与地方方针隔离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革命政党的方针，应注意到全部与局部的联系，要把我们的方针在政治上与群众联系起来。这次有一种冲突，一是要打要杀，一是要和要放，这种冲突表现在领导者与群众中。我们坚持了和平的方针，但在政治上与群众隔离了。

(二) 西安事变是暂时性的，我们的工作应在暂时的原则下进行与布置。

(三) 十五年来的斗争证明群众信仰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更证明了群众从政治经验中相信共产党。我们政治路线上有大的转变，应对群众做大的教育，这是我们重要的工作。

(四) 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改变，主要是争取上层分子，土豪、商人、资本家，是消灭两个政权的对立。所以，这次是胜利了，是有意义的。

(五) 关于取消

[1] 1937年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并讲话。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苛捐杂税、加薪加饷问题，尽量地废除苛捐杂税，这是必要的，然而仅限于此。（六）红军的影响很大，工作方法上应注意。组织参观团到西安与群众相见，解释和平解决的意义。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2月28日)

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

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2]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3]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徐陈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增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

[3] 罗宋两部，指罗炳辉任军长的红三十二军和宋时轮任军长的红二十八军。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3月1日)

增援军主力改以四军、三十一军即四方面军之两个军充之，十五军团不去，免平分兵力。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和史沫特莱^[1]的谈话

(1937年3月1日)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你去年秋季跟斯诺记者所谈的，基本上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如果从根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

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

三、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下面各项：

- (一) 国内的和平统一；
- (二) 对日抗战；

[1] 史沫特莱（1894—1950），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

(三) 人民的民主自由；

(四) 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

(五) 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

(六) 改善人民生活；

(七) 发展工商业；

(八) 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1937年春，毛泽东、朱德和史沫特莱在延安。

问：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们准备牺牲到什么程度？

答：这要看看历史情形。从一九二七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放弃了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政纲，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当时采取的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就发表宣言^[1]：要求停止内战，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可是那时仅有十九路军同意我们的主张，南京方面则完全不同意，并且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及至华北问题^[2]发生，国难已临极端严重关头，我们乃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进一步发表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宣言^[3]。同年十二月发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的决议案^[4]，并提出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这个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国民党中不少爱国分子也都赞同了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更大敌

[1]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33年1月17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宣言中提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2] 指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系列事件，通称华北事变。

[3]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5年8月1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

[4]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国内战争，才能进行抗日御侮，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放弃其老政策。到了去年八月，我们又写给国民党一封长信^[1]，坚决要求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变国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召集普选国会，要求他们痛悔既往，与民更始。我们声明：苏区愿意实行与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这封信获得了国民党中央广大的同情。然而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回答我们。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我们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迅速抗日起见，当国民党三中全会^[2]开会之前夜，乃于二月十日给了国民党一个重要的电报，在电报里表示了下列各点：

- 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 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 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此种方针，在去年我们就已实行，现在不过重说一遍）；
-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为了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他们根本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纲领。

[1] 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2] 指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由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问：你们现在在这里和在别的区域，将如何实行你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例如对于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农民、工人、军队等方面的办法？

答：对商人的关系，过去与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从来就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红军所至，无不保护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带，红军不但保护商人，并且连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称赞，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至于苏区里面，商业是完全自由的。

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

对地主，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没收他们的土地，但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

工人方面，则斟酌情形，实行各种改良待遇的办法。

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问题，任何中国军队尤其是有光荣历史的黄埔军都应在民族阵线下亲密团结，一致抗日，枪口向外，不生内战。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虽打了十年，但我们绝不记旧恨，愿和他们携手偕行，并在统一指挥下，一致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和我们有同心的。

上述这些政策，我们都愿意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把这些附在抗日方针、国家制度等等主要条款之后，一并放进民族阵线的纲领里面去，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问：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谓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阵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答：如前所述，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

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下述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此问题：

第一，在地主资本家方面，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首先应当尊重民族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因为地主资本家如果照旧对工农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只顾他们一部分一阶级的利益，工农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灭亡，地主资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已经代表全国工农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为了大局与民族利益，对此应该有满意的答复。

第二，在工农贫苦群众方面，他们是无钱无势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础，是最大的阶级。当此亡国灭种关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样是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并且他们将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他们在得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们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的不满，也就可以减少。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共产党主张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没收土地，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的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问：如果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建立起来，那末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

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下列各项：

第一，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1]与广田三原则^[2]，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

第二，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3]，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

第三，撤退华北驻屯军；

[1] 大陆政策，指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吞并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并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侵略计划，又叫田中政策。

[2] 广田三原则，指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3] “满洲国”，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1932年3月在长春成立，扶溥仪为“执政”。1934年3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

第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的自由飞航；

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侦探组织，即所谓特务机关；

第六，禁止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所施的横暴无理态度；

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1]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

问：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国共合作是妨碍远东和平的，你如何答复这种理论？

答：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让其占领，同中国问题有关系的各国如英、美、法、苏等也不要反对。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是日本军阀需要的所谓“远东和平”。但是还有一种远东和平，那就是实行我在上面讲过的办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撤退驻屯军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这是另外的一种远东和平。

[1] 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缔结的这一协定，实际上是同年10月25日德国和意大利通过签订协定形成的柏林—罗马轴心的扩展。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参加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法西斯国家的反共同盟（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但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这种和平的，仅只有日本军阀及其侵略盟友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前一种“和平”；我们又赞成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后一种和平。我们主张拿后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因为日本军阀口中的所谓“和平”，只是战争的别名，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而且只是给日本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别名。这种“和平”，据我看来，是应该对它“妨碍”一下的。

问：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调和的基点呢？

答：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军阀则希望战争。这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针是不能调和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只有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适应的。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问：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1]等类和平公

[1]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指由法国外长白里安、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美、英、法、德、比、意、日、波、捷等国代表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非战公约）。但在签约同时，美、英、法等国即先后声称各国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诉诸战争”。截至1933年，加入非战公约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63个国家。国联盟约，指1919年在法国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条约。

约，你以为能够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吗？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这些条约将起何种作用，有何种意义？

答：这些条约，在今天看来，确表示着一种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国家就表示了它们的坚决反对。但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意义。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问：在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之后，中国能够立即对日作战吗？或者还需相当的准备时期？

答：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但我们并不主张向日本挑衅，我们的方针是自卫战。因此，我们应该迅速地切实地从各方面作准备，使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应付事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所谓“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问：如果没有国际帮助，中国人民现有的资源、财力，是否已足以发动一个胜利的抗日战争？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

答：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红军的十年作战史，就是活的证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对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

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问：在现状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状况之下，这样一个战争，对日本的经济、财政、贸易等的影响将如何？日本能够在这两国的帮助下渡过这个战争吗？

答：日本侵略中国，对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日本军阀已经结合了一个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帮助和策应。他们不但希望用这种方法去渡过向中国侵略的战争，而且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他们所做的梦当然是很完满的，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样完满的。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

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

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1]，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问：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

[1]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1936年7月，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叛乱，并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西班牙人民在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之下，进行了保卫民主反对侵略的英勇抗战。这个战争，以马德里的保卫战最为激烈。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从1936年10月起，前后坚持2年零5个月。



1937年，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史沫特莱在延安。

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屈服、投降和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与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观察中国问题有一个标准，就是凡属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凡属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检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动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十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

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央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1]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2]，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高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

[1] 指《阿Q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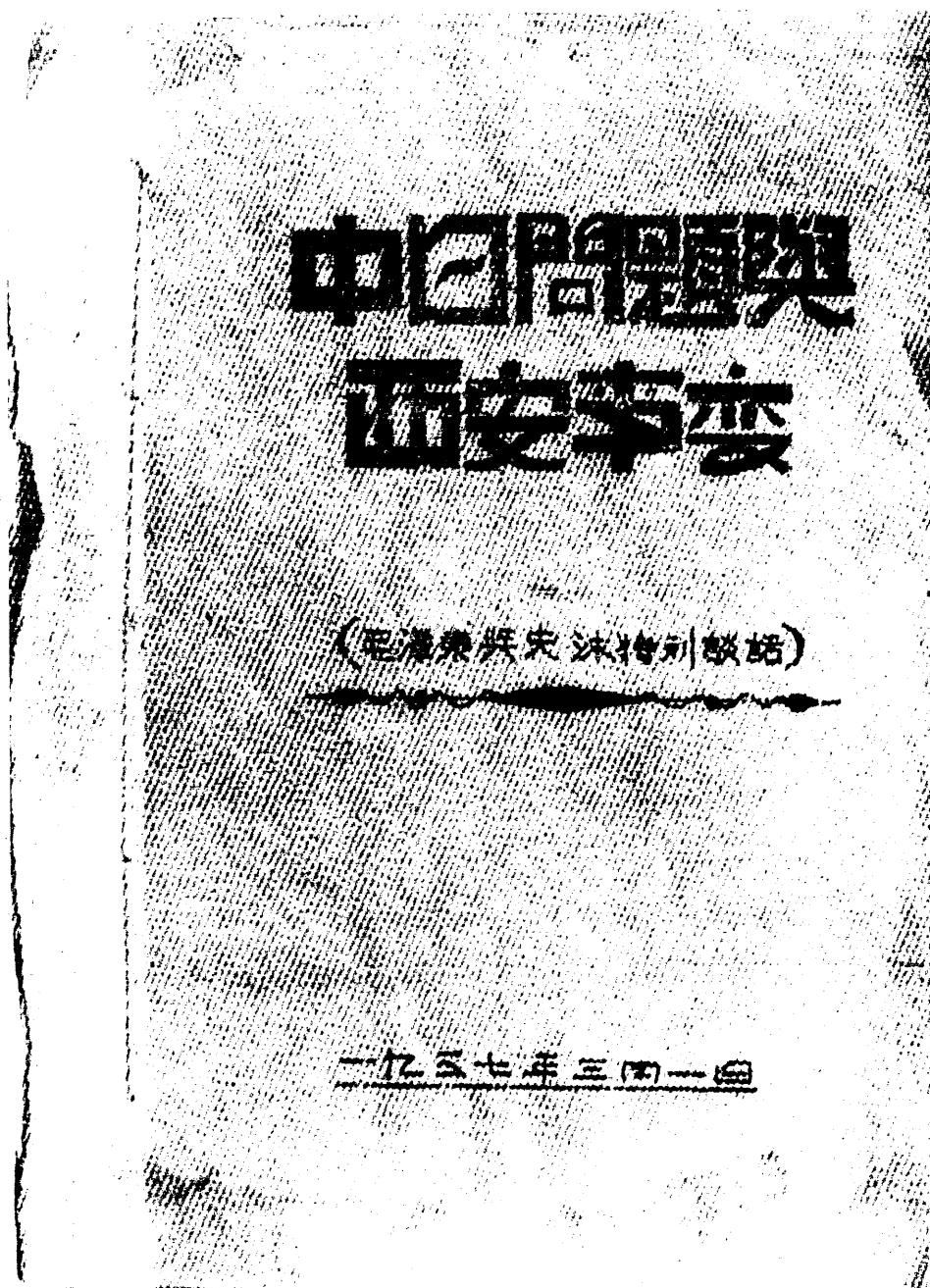
[2] 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关押在南京。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内一部分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理解的青年军官孙铭九（当时任东北军特务团团长）等，派人将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枪杀。

救亡的事业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分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分子，同实际卖国的分子即所谓亲日派区别开来，他们把这二者混而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多方说服暂时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敌。这其间需要忍耐性，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都可以商量。关于这部分性急的志士们，对于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评奉献他们。至于有些唯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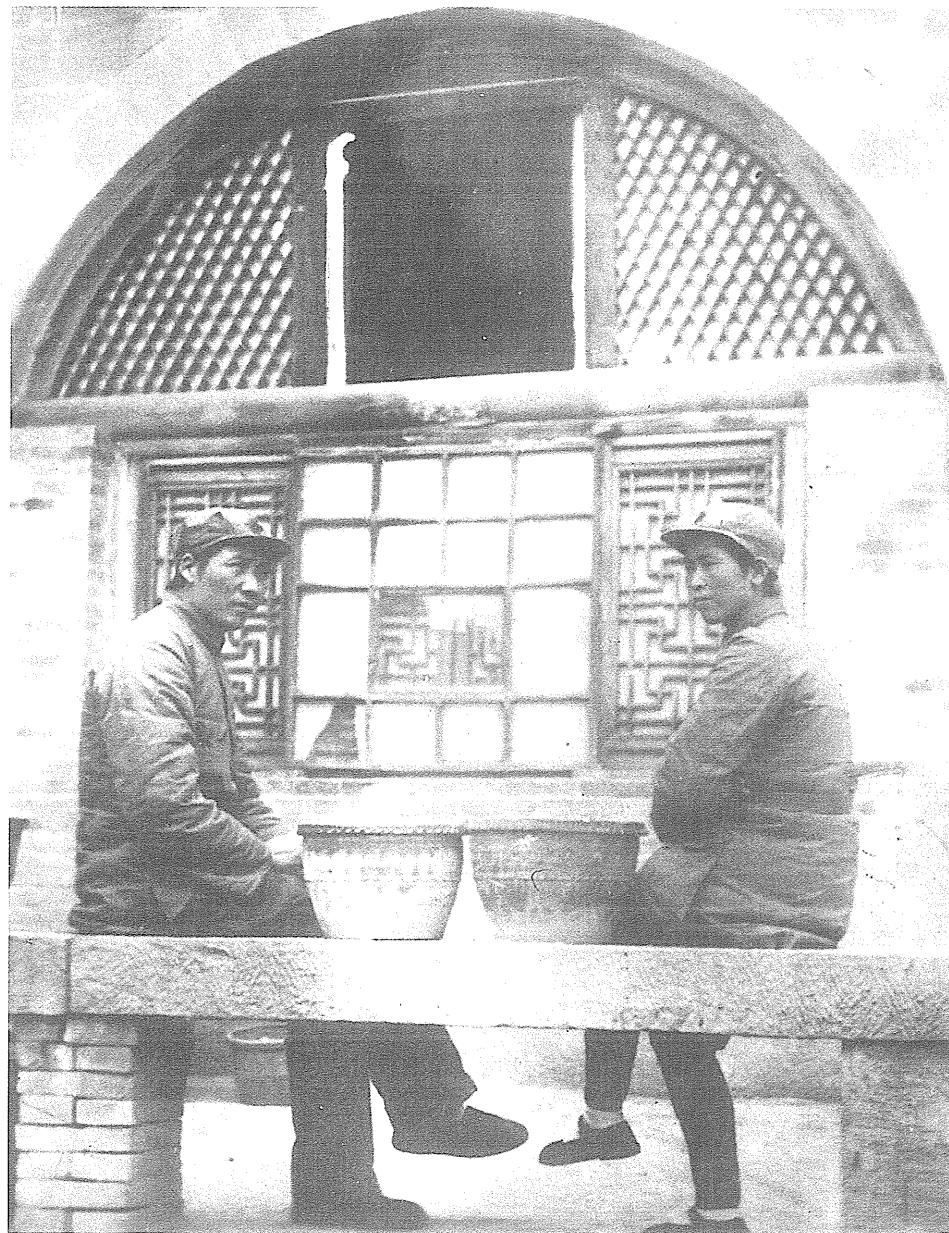
问：你们对于三民主主义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维键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八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主义中国而

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1937年3月，毛泽东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油印本。



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保安。



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风雨同舟 相依相伴》(中国画)



《宝塔山下》(中国画)

与国民党谈判红军编制 和对付反蒋派的方针^[1]

(1937年3月1日)

周，并告彭、任、叶：

(甲) 关于谈判方针：(一) 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 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2]之善后费。

(乙) 关于对付反蒋派之方针：(一) 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二) 一方面向蒋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改为实际的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三) 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

洛毛

一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

[2]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一般称为苏票或苏纸。

为抗大第二期第二队学员题词^[1]

(1937年3月2日)

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1] 1937年3月2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发表讲话。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并为第二队学员题词。

复周恩来电^[1]

(1937年3月3日)

目前谈判焦点只在红军人数问题上，为使谈判迅速成功，我们认为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及两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地可以接受。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我们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为抗大题写教育方针和校风

(1937年3月5日)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毛泽东为抗大题写的教育方针和校风。

关于周恩来赴南京谈判内容的批复^[1]

(1937年3月5日)

万万火急

周：

(甲) 总部直属队即以前后方两特务团编成，人数约一千五百，其余均机关，旅长人选及部队编成候彭、任^[2]提出意见再复，其余均同意。

(乙) 与我们发表宣言同时，要求国民党亦发表宣言形式之公开文件，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

(丙) 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会制为宜，经费（包括保安团队在内）每月三十万，又收回苏票^[3]二百万。

(丁) 党员数告以尚待清查，但总数估计约十万，苏区白区各半。暂以周、叶^[4]二人参加国^[5]会议，毛不参加。林^[6]为特区主席，也参加经委。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的急电。

[2] 指彭德怀、任弼时。

[3] 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4] 指周恩来、叶剑英。

[5] 原文如此，似漏“防”字。

[6] 指林伯渠。

(戊) 请将伙食费与增援西路军二事日内办妥。

洛毛

五日二十一时

并告彭、任。

致彭德怀等电^[1]

(1937年3月5日)

请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特别说明四军、三十一军要求西援之迫切，如顾电令二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二马，我军即中途停止。

[1] 这是毛泽东致刘伯承、林育英、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电的主要内容。

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

(1937年3月6日)

弱时：

甲、三中全会^[1]在法律上确认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

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应转变，以适合于这一总任务。

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争取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毛 洛
六日

[1] 指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国共合作大局已定^[1]

(1937年3月7日)

富春：

所传非实，但谈判正具体化，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国民党政策正在转变中。

毛复
三月七日亥

[1] 1937年3月6日李富春致电毛泽东说：“据□□□传播：南京已组国防委员会，蒋为总司令，阎、张及朱德副主席。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红军编九个师。”这是7日毛泽东给李富春的复电。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3月9日)

甲、西援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咀之间待命。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西路军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给埃德加·斯诺^[1]的信

(1937年3月10日)

斯洛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2]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1]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进步新闻记者，1928年来中国，1936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后根据此次采访所得写成《西行漫记》一书。

[2] 史沫得列，即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4—1950），美国进步作家、新闻记者，1928年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中国，1937年年初访问延安，著有《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书。

斯诺先生：

你像孙少川，时态到俗人，
你现代化搞好？

我同史沫特莱谈到该书，表示了
我们改革的方针和步骤，今
把征求意见稿一节，清校复阅，呈为
宣扬，我们都感谢你。

此问 健康！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

毛泽东致埃德加·斯诺信的手稿。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3月11日)

请你估计此刻即去南京或牯岭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2]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对外宣言，已有毛的谈话^[3]（允生^[4]带上），党的宣言以暂缓为宜。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关于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等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指贺衷寒对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商定的准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的提案所作的重大改动，亦称“贺案”。主要内容有：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裁减红军改编后的定员，三个师，两万七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西路军。

[3] 指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

[4] 允生，即李允生，是冯雪峰的化名。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3月11日)

全体的政治局会议，须待与国民党关系确定后才好开会。你如能在近日去南京而在两星期左右确定国共关系，则拟在月底或月初开会。会后并须召集代表会议，拟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开会。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再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张浩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3月12日)

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走日本的路，一是走向我们，他现在还在徘徊中。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谈判的胜利是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于谈判的方法，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我们应召集会议，发表宣言，从政治上动员。国民党的代表应确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谈。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3月13日)

请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在延安留三五天出去见蒋谈判。剑英
留西安与顾祝同保持联络。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绥远追悼大会唁电

(1937年3月13日)

归绥傅作义将军、赵承绶将军，并转阵亡将士追悼大会鉴：

日寇驱使伪匪，进犯绥东，诸先生领导全军，守土御侮，屡挫敌锋，略洗吾民族所遭受之奇耻大辱。诸将士英勇杀敌成仁取义，伟大之精神足以昭示后世风励全国。泽东等追念国殇同深恸悼特电奉唁，诸维共鉴。

毛泽东 朱德叩

元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3月14日)

谈判并不破裂，只是不承认贺案，而对十五条^[2]须加以原则上与条文上的补充修改。和平大计已定，现谈判者是国家政策与两党关系（包括红军、苏区等组织方式问题）之具体方案问题，必须原则上妥当与事实上能行，故须会商后续谈。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将一个月来双方谈判作一归纳，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准备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周恩来起草的条文，包括政治问题五条，改编问题四条，善后问题六条，共十五条。同日，周恩来将这十五条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3月16日)

- (甲) 既然张、顾愿不采用贺案^[2]，你即在西安顿住几天待命。
- (乙) 惟要顾立电两马停战，否则要顾担负西路军损失的全部政治责任。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1937年3月15日，张冲向周恩来申明贺案作废，仍以3月8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3月16日)

财政观点当然是需要的，但有一个原则即须受政治上的限制。关于“平等观念”，在游击时代就有的。将这个原则用到具体事实，红大每人每天八分伙食费是不能动摇的。津贴问题应有分别，红大一队的应特别，一般的是不是平等，要看情形。伙食是第一，应增加到八分，津贴还是其次的。应组织中央一级购买委员会，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购买，以国民经济部部长为该委员会主任。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财政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在延安大扫除时的讲话^[1]

(1937年3月21日)

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加国防力量。搞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

[1] 1937年3月15日至21日，延安举行卫生运动周，21日进行大扫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参加大扫除并作重要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

(1937年3月23日)

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问题早在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

[1]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称延安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23日至26日（其中25日休会一天）进行第一项议程，27日至31日进行第二项议程。这是毛泽东在23日就第一项议程的讲话。

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关于过渡阶段问题

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

关于领导权问题

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三十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问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

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

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

致周昆、袁国平电^[1]

(1937年3月25日)

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的统一与团结。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庆阳步兵学校负责人周昆、袁国平电的主要内容。

复叶剑英电^[1]

(1937年3月26日)

民族扫墓我方决派林伯渠参加，并与张继^[2]见面，请询问礼节仪式及日期见告。

[1] 这是毛泽东复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张继，国民党元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3月27日)

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乙、对两马不但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丙、此事须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将来有莫大利益。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朱德、张国焘关于解救西路军危局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现阶段的中日关系*

(1937年3月28日)

问：阁下如何认识目前之阶段？

答：由于国民党执政人士对目前举国一致之重要性，与国难之艰巨性之进步的了解，与全国人民及中国苏维埃红军之坚决主张停止内战，现在国内和平已开始实现，而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准备对日抗战之非常时期于兹开始。在此非常时期中，全国人士应深刻明白自己救亡责任之重要，应进一步谋团结之巩固，切勿为敌人之离间毒计所乘，更不应为敌人之甜言蜜语所惑，应切实了解敌人之每一步进攻步骤而努力于切实实现人民之民主权利，以充实国力也。

问：少数人民，颇对佐藤之所谓“和平外交”发生幻想，阁下意见如何？

答：佐藤之所谓“新政策”云云者，明眼人民自不难洞悉其毒辣之阴谋实质，即如津沪大报中亦不少直指其为外蜜中鸩之糖浆，此种描写实亦颇称恰当。今日少数人民之仍为其所惑者，因亦许有种种复杂之原因，但一言以蔽之，主要原因正在于此辈人民不能将其种种顾虑服从在中华民族总利益之下，故不免畏惧抗战，而敌人之甜言蜜语得以乘机奏效矣。佐藤虽已赤裸裸地宣称新政策，无非为执行三大原则之手段变换，但其外里之糖浆，对意志薄弱之辈仍不难发生诱惑力量，对此吾人应充分了解其危险性也。



1937年春，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接见美联社记者厄尔·利夫。

给范长江^[1]的信

(1937年3月29日)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2]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寄上谈话^[3]一份，祭黄陵文^[4]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

敬颂撰祺！

弟 毛泽东

三月二十九日二十四时

[1] 范长江（1909—1970），四川内江人，新闻工作者。1937年2月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西安和延安采访。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党的新闻部门做领导工作。

[2] 指范长江访问西安和延安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新闻通讯。

[3] 指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这个谈话发表于1937年3月29日至4月3日延安《新中华报》，题为《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4]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人民抗日红军准备在1937年4月5日清明节致祭陕西黄帝陵的祭文。此文后来发表于同年4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

范长江：

那次很感谢你，对社论
评价很高！你的文章我们都有
过目，深致谢意！

寄上谈话一稿，算共商一稿，
藉供参考，不能时附为图表。
也盼时赐 教言，匡正不虚。
敬祝 横批！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

毛泽东致范长江信的手稿。

四言诗·祭黃帝陵^[1]

(1937年3月)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2]，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遣代表林祖涵^[3]，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

赫赫始祖^[4]，吾华肇造^[5]。胄衍祀绵^[6]，岳峨河浩。

[1] 祭，祭祀。这里是表示崇敬之意。黄帝，为传说中的中国上古时代的部落领袖。黄帝陵，轩辕黄帝的陵墓，简称黄陵。在陕西省黄陵县城北约一公里的桥山上，史书称桥陵。

[2]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即1937年4月5日。这一天是清明节，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清明节扫墓祭祖的风俗。

[3] 林祖涵，即林伯渠（1885—1960）。湖南临澧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七大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病逝于北京。

[4] 赫赫，显著、盛大的样子，形容显耀盛大。始祖，指黄帝。

[5] 吾华，我们中华民族。肇，开始。造，建造。吾华肇造，即肇造吾华，建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6] 胄，古代称帝王或贵族的子孙。这里指黄帝的子孙。衍，繁衍，繁殖。祀，祭祀。绵，绵延，延续不断。祀绵，对黄帝的祭祀累世不绝。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1]。
 琉台不守^[2]，三韩为墟^[3]。辽海燕冀，汉奸^[4]何多！
 以地事故，敌欲岂足^[5]？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6]，命世之英。涿鹿奋战^[7]，区宇^[8]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9]？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1] 强邻，强悍的邻国，这里指日本帝国主义。蔑，无。蔑德，无德行。这里指不讲道义。

[2] 琉，指琉球群岛。本属清朝版图，光绪五年（1879年）被日本侵占。台，指台湾。本属清朝版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日本侵占。不守，失守，为敌人所攻占。

[3] 三韩，指朝鲜。汉时，朝鲜南部分为马韩（西）、辰韩（东）、弁韩（南），合称“三韩”。后用为朝鲜的代称。为，变为。墟，废墟，原来有很多人家聚居而现在已经荒废的地方。

[4] 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

[5] 欲，欲望。岂，哪里。足，满足。敌欲岂足，敌人的侵略野心哪里能够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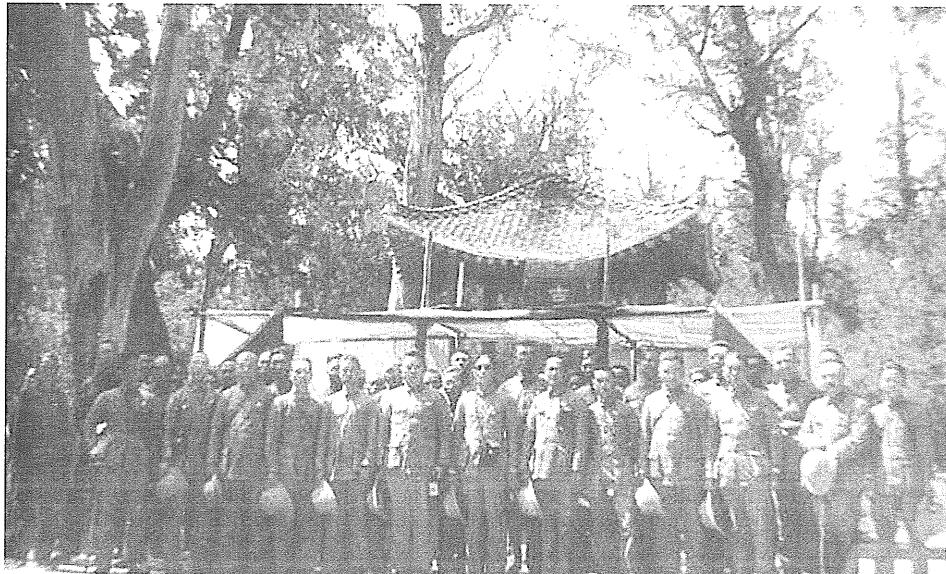
[6] 懿，通“噫”，古汉语叹词，表示悲痛或叹息。我祖，指轩辕黄帝。

[7] 涿鹿奋战，相传黄帝与蚩尤曾在涿鹿进行大决战，蚩尤全军覆没，为黄帝击毙。

[8] 区宇，区域，疆域，天下。

[9] 其，指代中国。沦，沉没，没落。胥，语助词，用于句末，无实义。沦胥，沦丧衰落。

民族阵线^[1]，救国良方。四万万众^[2]，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3]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4]。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5]！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红军代表叶剑英、陈赓等的陪同下，同祭黄帝陵。
图为合影留念。

[1] 民族阵线，指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四万万众，即四万万人民，当时全国人口约四亿。这里即全国人民之意。

[3] 兆，古代指一万亿。亿兆，犹言广大人民。

[4] 矢，誓，发誓。勿，不。谖，忘记。永矢勿谖，犹言永志不忘。

[5] 尚飨，旧时祭文结束语，意即请享用祭品吧！

和南京谈判的两个原则^[1]

(1937年4月1日)

雪枫：

(甲) 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

(乙) 南京并无毛出洋之条件，华北消息系误传。

毛泽东

一日二时

[1] 这是毛泽东给彭雪枫的电报。



1937年4月，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迎接从西安返回的周恩来时的合影。



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毛泽东在延安机场》(中国画)

关于西路军的善后问题致叶剑英电^[1]

(1937年4月3日)

向顾祝同说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的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现集凉州的西路军被俘的六千人，要求顾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让其转赴新疆。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张国焘等关于西路军的善后问题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青年工作问题的讲话^[1]

(1937年4月10日)

青年工作，依靠多数是很重要的，不要孤立。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青年工作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潘汉年电

(1937年4月11日)

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1]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1] 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在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 开幕典礼上的训词^[1]

(1937年4月12日)

把共产党过去策略与口号，与目前新的口号策略的关系及变化加以解释，说明我们在大革命失败后，为苏维埃奋斗是正确的，因为那时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工农的出路只有与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斗争，再没有别的办法，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形势有了大的变化，日本的进攻，灭亡中国的手段，不仅危害及工农劳苦群众，而且危害及资产阶级，大家均不愿做亡国奴，所以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步骤——争取国内和平——基本上完成了，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开展民主权利。未团结全国人民到抗日战线上来，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以后，希望大家把共产党的策略口号向全国青年宣传解释，使全国青年都懂得……（会场热烈的鼓掌）。

[1] 1937年4月12日下午1时，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大会首先由冯文彬致开幕词，继由毛泽东、共产党代表洛甫、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人训词。这是毛泽东的训词。



1937年，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在延安凤凰山。

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讲演^[1]

(1937年4月12日)

同志们：

今天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开会，将号召西北及全国青年群众与各界联合，走上团结抗敌的道路，我就来说一点关于共产党的团结抗敌的政策。共产党过去的政策是国内战争与土地革命。现在政策是和平团结，对日抗战。这是什么原故呢？为什么我们过去和现在有这样不同的政策呢？原因就在过去若干年间，我们不能不那样做，也只容许我们那样做。过去是两个政权对立的斗争，阶级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拿着枪，杀革命人民，革命的人民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第二种办法和出路。那时候的那样干，完全必要与正当的。

如果说共产党过去错了，那末请问除了这条道路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道路？难道我们应和国民党一道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吗？不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就得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

[1] 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国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号召和团结全国青年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出席大会的代表312人，代表20多万有组织的青年群众。毛泽东、周恩来、洛甫、朱德、博古、林伯渠等到会并发表讲话。这是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

二者之间没有中间的道路。

“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日本要单独独占中国，灭亡中国，使得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了，使得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压力也变化了一些。资产阶级同国民党里面都发生了分化，国家处在危亡面前，我们的政策就有改变旧的采取新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我们采取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我们统一战线的目标是抗日的，而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不分阶级与党派的联合战线，与外国的人民阵线也不相同，这是我们统一战线的特点。

自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号平津学生反日运动以来，经过许多事变直至西安事变与三中全会，中国内部已经由一种状态开始走上另一种状态，即是由内战独裁与不抵抗开始走上和平民主与抗战的阶段。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致国民党书，九月决议，以及西安事变中的和平统一政策，给三中全会通电中的和平政策，都是国内达到新阶段的号召与领导的力量，这些东西都表示我们过去提出了并实行了粉碎国内统治阶级的围剿这个口号，那末，现在就不是如此了，现在是要团结全民族来粉碎日本为首的法西斯对全中国的围剿。倘若内外都有围剿，那中国就唯有灭亡，因此我们提议内部的围剿必须和解，并且建立全民族的大团体来对付外面的围剿，现在这新任务已经开始走了一步，往后就是第二步，第三步，一直粉碎法西斯围剿而后止。

我们停止土地革命是否就不顾民族利益了呢？不是的，恰恰相反，我们更要为民众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坚决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与民主改良就是为的这种目的，因为今天的民主改革，正是抗日人民大众的需要，因为没有民主改革，没有人民的自由权利，抗

日会只是一句空话。抗日与民主二者是不能分离的。

以前的不和平不统一，国共两党之间如此，全国各省之间也是如此。抗日救国必须和平统一，相打分裂是不能抗日救国的，因此和平统一成为全国必须的要求。过去一年的工作是坚决要求和争取这种和平统一，现在算是初步的达到了，但和平还没有巩固，要巩固和平并实现真正的统一，就得实行民主政治。

现在全国人民，除了苏区以外，都没有民主自由，说话有罪，走路也有罪，爱国有罪，如沈钧儒等爱国领袖因为爱国而被关起来，现在听说还要起诉。为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而在街上走路就要被捉，出报纸讲爱国话就要被封。这种情形怎能真正抗日呢？所以我们说，没有和平与没有民主，都不能统一团结，便都不能抗日，所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是实现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也是今日的中心任务，是今日必须要做的文章。

我们曾为扩大红军而努力，现在也不相同了。中国人与中国人从前相打的现在应该改为好朋友，大家去打共同的敌人，这样，红军也可改为国民革命军，一切中国的军队都要变为抗日军，我们应该为扩大与训练真正的抗日军而斗争。

过去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单独负起革命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斗争。

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了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上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

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

西北青年有团结全国青年的责任，全国青年都团结起来，跟成年、幼年、老年就一道结成一个几万万人的大团体，那末日本帝国主义凶悍怎么样，我们是能够打倒它的。



毛泽东在讲话。

致潘汉年电^[1]

(1937年4月12日)

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

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4月13日)

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号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百六百^[2]，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指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余部。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4月16日)

望将中央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改意见与张冲当面商榷，要他转达蒋介石、陈立夫及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4月18日)

送兰州的河西红军，望速向顾祝同接洽，派张文彬去接或开至平凉接收^[2]。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5月下旬，张文彬到兰州孔心墩机场附近的集中营，经交涉将关在那里的1500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解往西安，途中至四十里铺，由附近的红军接应，摆脱押送的国民党军队，回到苏区。

致刘伯承、张浩等电^[1]

(1937年4月20日)

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刘伯承、张浩并转西路军工委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4月20日)

这一联盟应宽泛，不要严密，我们不要替它造成一个组织来制约我们。所以这个规约愈简单愈好，不用固定代表制、执行委员等组织，用有事议议的方式较好。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民族联盟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复周小舟电^[1]

(1937年4月22日)

(甲) 谈话^[2]着重指出，政治制度之民主改革及人民自由权利之重要性与迫切性，为巩固国内和平、增强国内团结、实现对日抗战，没有民主自由是不行的。(乙) 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须按照民主原则彻底修改，过去颁布的选举法、组织法，我们是坚持反对的。(丙) 我们根本反对苏州六爱国领袖之被审讯，主张立即释放。(丁) 向张季鸾^[3]征求能否来延安一行，如同意，我表示欢迎。

[1] 这是毛泽东复周小舟电的主要内容。周小舟，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阎锡山约周小舟几天后到五台县河边村谈话。

[3] 张季鸾是《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当时在太原。

关于党内组织上的一致问题的讲话^[1]

(1937年4月24日)

现在看到一些情况，如有的地方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作法，在陕北也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等等。应当很明白地指出主要是路线上的一致，只有在这一原则上的一致，才可团结一致。过去，我们有过痛苦的经验，陈独秀、李立三的宗派主义等，今后这样的缺点还是不免发生的，因为中国经济落后，容易出现这些缺点。我们的任务是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战胜敌人。党在全国发展中，知识分子的成分是要占一个数目的。这种状况的存在，更加重了我们教育的责任。每一个组织上的错误，总是由于思想上的差误，组织上的一致与思想上的一致是不能分离的。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就要在组织上扩大民主，慎重作组织上的结论。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党内组织上的一致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徐向前电^[1]

(1937年5月1日)

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励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2]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朱德致徐向前电的主要内容。

[2]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他辗转回陕，“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

(1937年5月3日)

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

(一) 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 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

(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2]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

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为顺利实现全党全军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指明了方向。图为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

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央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3]，十二月决议^[4]，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5]，八月致国民党书，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6]，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7]等等步骤之所由来。

丁、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内战与分裂，争取和平与统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四）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内的

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和青岛的反日罢工^[8]，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较的强硬^[9]，两广事变^[10]，绥远战争和援绥运动^[11]，南京在中日谈判中的比较强硬的态度^[12]，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会^[13]。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五）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的主张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动动摇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才能达到目的。

（六）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

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七) 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

(八) 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九) 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

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地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的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十）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

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当我们现在和最近将来力争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无疑地又要来破坏。其总目标，就在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而使他们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达到目的。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分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当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十一)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 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 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 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义^[14]和恶意的污蔑。

(十二) 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15]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

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16]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统治下去，因而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十三）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变为人民的敌人，则革命的动力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唯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

上。仅仅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保持革命的传统，提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且为此口号而艰苦奋斗了许多年。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这里的特点是包括了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环境下，又有重新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拒绝他们，而应该招致他们，恢复和他们共同斗争的联盟，以利于中国革命的前进。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准备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末，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

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过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弃，都是正确的。

（十四）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国内的某些矛盾，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在民主革命阶段内，国内阶级间、党派间、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国内战争，党派敌对，地方割据，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一方面暴动政策和不

利于抗日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批评的自由，党派的独立性，人民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

（十五）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我们的领导责任

（十六）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17]，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

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十七) 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

(十八) 和平实现与两党合作成立之后，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

(十九) 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的问题，许多同志已提出来了。我们的答复是：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

(二十) 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

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1] 这是毛泽东在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2]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3] 这是指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是：“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

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为了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了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

[4] 这是指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期间，于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下面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了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

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按照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红色政权，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使他们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办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党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地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5] 指1936年5月5日中国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通电中开始放弃“反蒋”口号。通电内容如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自从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竟

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6] 指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随后，根据情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估计人民共和国这个口号不会为蒋介石集团所接受，于是在1936年8月致国民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接着又在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了具体的说明。两个口号形式上虽有不同，实质上却是一致的。下面是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民主共和国问题的两节：“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

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工农民主专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红色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红色区域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地巩固红色政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艰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7] 这个电报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内容如下：“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

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8] 1936年11月8日，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开始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先后共达4.5万余人。罢工坚持20天左右，获得胜利。日本资本家被迫同意自11月份起增加工资5%，不无故开除工人，不打骂工人，等等。11月19日，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为响应上海工人的斗争，也开始罢工。1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罢工工人遭到镇压。

[9]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海关进入华北以后，特别是自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因此，英美就开始改变对于日本的态度，并且给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影响。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英国曾经主张拒绝日本所提出的不利于英国在华利益的要求，甚至表示只要国民党政府还能够继续统治中国人民，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以便打击日本企图独占全中国的政策。

[10] 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在1936年6月间发表通电，宣布“北上抗日”，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收买了陈济棠的军队。7月，陈济棠被迫下台。9月，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达成协议，事变和平解决。

[11] 1936年7月底至8月初，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向绥远（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进攻，当地驻军傅作义所部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奋起抗战，击退这次进犯。11月，日伪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当地驻军再次进行抵抗。全国人民开展援绥运动，组织后援会和战区服务团，并且募集款项、棉衣等支援前线。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绥远的中国驻军击溃了日伪军，收复了当时日伪军在绥北的主要基地百灵庙。

[12] 1936年，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潮流的压力和英美同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这一年的3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同日本驻华大使举行会谈，最后发表共同公告，宣布双方意见“未能全部一致”。在同年9月至12月的中日谈判中，国民党政府又采用拖延的办法，使谈判未获结果而停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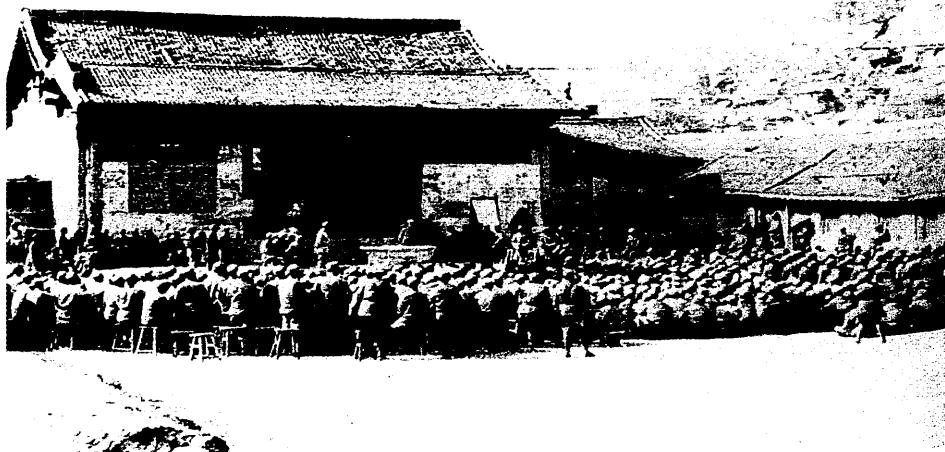
[13] 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所举行的一次会议。

[14] 阿Q是中国伟大作家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角。他的突出特点是习惯于用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在任何情形下都自以为是胜利者即“精神胜利”者。阿Q主义就是指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法”。

[15] 这里所说的三民主义，是指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同意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但并不同意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或理论体系。

[16] 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将国民党改组成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曾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在全国各地屠杀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内许多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他们称之为“清党运动”。从此，国民党基本上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17] 这里是指1927年上半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所造成的情况。



1937年5月，红军指战员在听取有关抗日救国形势的报告。

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复周恩来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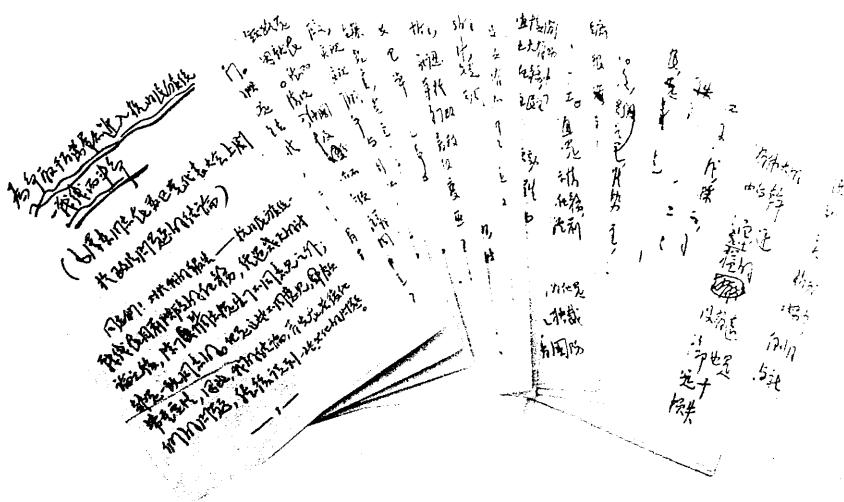
(1937年5月5日)

坚持两党发共同宣言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纲领确定之后发表，宣言大意不外共同纲领草案上所说的。向张、顾说，如他们要我党单独发，则：第一，彼党须同时发宣言，第二，我党宣言中不得不驳复三中全会宣言及根绝赤祸文件中我党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许多东西。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

(1937年5月8日)



毛泽东撰写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手稿。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

[1] 这是毛泽东在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和平问题

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我们的这种意见，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却不能成立。他们的结论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因为他们说：“日本后退了^[1]，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根据这种估计，当然无所谓新阶段和新任务，情况回到旧阶段，或者还不如。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对的。

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变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

[1] 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破坏当时已开始实现的中国国内和平和正在逐渐形成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加紧准备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表面上对国民党当局暂时采取了和缓姿态。1936年12月和1937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曾两次唆使伪蒙古军政府发表通电，拥护国民党政府集中军力进攻红军和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宣称同国民党军队停止作战。1937年3月，日本外相佐藤尚武诡称要调整中日两国的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和复兴”。日本财阀儿玉谦次等还组织了所谓“经济考察团”来华，诡称要协助中国建成现代国家。所谓“佐藤外交”和“日本后退”，就是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玩弄的这一套骗人的阴谋。

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没有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还在企图使中国继续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如果否认新阶段和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努力的成绩，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

为什么这些同志作出这种不妥当的估计呢？原因在于他们观察时局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佐藤外交^[1]，

[1] “佐藤外交”是林铣十郎内阁继广田内阁对华强硬外交失败后，从对苏战略出发，为扭转中国抗日趋势所采取的一种和缓外交。林铣内阁组成之时，南京政府已中止了张群川樾的会谈，中日政府间的交涉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打破对华关系的僵局，林铣内阁决定大搞以经济文化往来为重心的“民间外交”。以所谓“平等”态度待华，诱导南京政府与日“握手言和”。“佐藤外交”与广田内阁侵华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其以“平等”相标榜的对华“民间外交”活动，只不过是引导南京政府与其恢复“政府外交”以便推行全面亡华政策的诱饵罢了。

苏州审判^[1]，压制罢工，东北军东调^[2]，杨虎城出洋^[3]等等）出发，于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画图。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4]，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

[1] 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随后又把他们押到苏州，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1937年4月，这个法院的检察官对沈等提出“公诉”，并于6月11日和6月25日两次开庭审判，说他们违犯了所谓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2] 西安事变以前，东北军驻在陕西、甘肃境内，同西北红军直接接触，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193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隔离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并且乘机分裂东北军内部，强令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和苏北地区。

[3]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原西北军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12月12日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在释放蒋介石后送蒋回南京，即被长期囚禁。杨虎城也被国民党反动派迫令于1937年4月27日辞职，6月29日出国“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于1937年11月回国准备参加抗日工作，但不久也被蒋介石逮捕长期监禁，到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的时候，在集中营内遇害。

[4] 潼关是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处的军事重地。西安事变时，国民党中央军驻在潼关以东，准备进攻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某些号称“左”倾的人们（张国焘是其中之一），主张“打出潼关去”，向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这种主张是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相反的。

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的十年污浊洗掉得干净。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裁和不抵抗的旧毒扫除干净。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为什么有这种改变？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国际上，法国政府由仇苏变为联苏^[1]，同此道理。我们在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诡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央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 1918年至1920年，法国政府积极地参加了14个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并在这次干涉失败以后继续执行孤立苏联的反动政策。直到1935年5月，由于苏联的日益强大及其和平外交政策在法国人民中的影响，由于法西斯德国对法国的威胁，法国政府才同苏联缔结了互助条约。但是，法国政府后来并未忠实地执行这个条约。

民主问题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一二·九’就对了。”

让我首先发出一点问题：能够在过去阶段中（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说，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吗？过去强调和平是错了吗？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和平运动吗？（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正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现在也还没有绥远抗战或“一二·九”。）谁人不知：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前一阶段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从“一二·九”起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止）都围绕着争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阶段的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新阶段中，我们希望有、也将会有许多直接的间接的反日斗争，这些将推动对日抗战，也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我以为是不错的。

“日本退后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动摇了。”这是一种不了解历史发展规律而发生的不适当的忧虑。日本如因国内革命而根本后退，这是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战线崩溃的开始，为什么还忧虑？然而究竟还不是这样；佐藤外交是大

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英国的动摇政策只能落得无结果，这是英国和日本的不同利害决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长期动摇，便变为全国人民之敌，也为南京的利益所不许。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因此不能否认新阶段，也不能否认民主任务的提出。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何况实际情况已经表明，指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时局已经前进了，不要把它拉向后退。

“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等，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丝毫也不与民主任务和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斗争和人民生活斗争，要和民主运动相配合，这是完全对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革命前途问题

有几个同志发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只能是简单的。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

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1]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

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2]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286页），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十二、十三部分（《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97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4页）。

[2]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的策略》第二部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三部分（《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14、279～293、400～402页）。

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干部问题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1]

[1] 参见1935年5月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党内民主问题

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

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1]，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1] 这里所说的分歧，指1935年至1936年间党中央路线和张国焘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1936年10月，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1937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总结，使党和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新的一致，标志着这个分歧已经解决。至于后来张国焘公开叛党，堕落为反革命分子，那已不是领导路线上的问题，而只是个人的叛变行动了。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毛澤東活頁文貢文選

爭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綫戰一統族民日抗入進
爭取千百萬群眾而群衆萬千百爭取爲



華北聯合大學印選處務教學大會聯北華

华北联合大学出版的毛泽东活页文选《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解决的步骤^[1]

(1937年5月9日)

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四、我们实行军队改编，南京实行释放政治犯。五、目前为免除顾、张等疑虑，可由周发表一谈话。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

(1937年5月10日)

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在过去这十年中，红军是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现在在这十年的伟大斗争的基础上，又滋生了红军新的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因此，这一满十年的红军纪念日更带来了特殊的纪念意义。

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特决定大规模的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并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溪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十一同志为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负责收集整理，委员会以徐梦秋为主任。

现特号召中华民族的英雄——全体红军指战员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各就个人的闻见，把红军各种的历史，战斗等等写出来，并寻各种纪念品，来完成这一部伟大的史著，纪念十年奋斗的红军。

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稿件须在七月半以前送到委员会。稿末必须注明真姓名和机关。征集项目附另纸。

中革军委主席 毛泽东

总司令 朱 德

五月十日

红军历史材料征集的项目

历史——各部红军的产生和发展，
战史——各个战役和重要战斗，
长征史——片断的或全部的回忆，
史略——牺牲的同志传记或红军的故事，
报纸——过去的各种大报小报，
宣传部——过去的传单标语宣言等，
书籍——新编的，翻印的，铅印的，或油印的，
图书——旧存的和新的，
剧本活报——过去印出的□本或补录的，
日记——机关的和私人的，
歌曲——过去的各种歌曲，土调，山歌，
像片——旧摄的或新摄的，
纪念品——牺牲同志的或缴获的，
旗帜——自己的或缴获的，
奖章——牺牲同志的或自己的，
文件——过去一切决议，命令，通知报告……
法令——红军的或苏维埃的。

复李宗仁电^[1]

(1937年5月13日)

和平、民主、抗战为今日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割的方针。和平虽已实现，然非民主不足巩固和平。抗战迫在面前，然非民主不足保证抗战。促成全国政治之民主改革与开放人民之自由权利，为当前任务之重心。

[1] 这是毛泽东复李宗仁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一事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5月14日)

同意他们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坚决反对康泽^[2]及其他任何叛徒进来，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朱德、张国焘关于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一事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康泽，当时任国民党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

给西班牙人民与人民军的信^[1]

(1937年5月15日)

西班牙人民及武装同志们：

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苏维埃，认为西班牙政府现在所领导的战争，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战争。这个战争不只是为了西班牙民族的生命，也是为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而战，因为西班牙政府，是在抵抗破坏世界文明文化和人类正义的德意法西斯蒂及西班牙的卖国贼们。西班牙的政府和人民正在向德意法西斯蒂战斗，而德意法西斯蒂却正是极力支持在远东进攻中国之日本法西斯蒂的。日本法西斯蒂正以其全力进攻中国，它占领了我们东北四省之后，又侵入我们的北部和中部。如果没有德意法西斯蒂的帮助，日本法西斯蒂是不会像今天这样疯狂的向中国进攻的。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在人民阵线中团结的各党派，而且我们也正在号召中国各党各派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来反对日本法西斯蒂。我们的工作正在急切的进行，我们得到胜利必将予日本法西斯蒂以打击，这也就帮助了西班牙人民与政府。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斗争是不能与你们在西班牙的斗争分开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正以反对日本法西斯蒂的斗争来帮助和鼓励你

[1] 这是毛泽东给抵抗德意法西斯侵略的西班牙人民和武装同志的致敬信。

们西班牙的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为你们保卫马德里及在北方和南方前线上的胜利激动万分。我们苏维埃区域的报纸每天发表着关于你们的英勇斗争的消息。我们坚决相信，你们人民阵线中各党的统一是你们最后胜利的基础。我们对于西班牙共产党提议的十大纲领也完全赞同。

你们的斗争和我们在东方的斗争是相同的，除了已经提到之外，在我们的队伍中，都有着托洛茨基匪徒分子的混入。唯有坚决反对这些内奸，我们才能巩固我们的阵线。在反对我们自己敌人的斗争中，我们也在帮助你们在西班牙的斗争。

在中国有着百种以上的杂志报纸发表你们的消息、文章和照片，同情你们为了民主和自由的英勇斗争。我们知道：你们的胜利将要直接援助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蒂的斗争。你们所努力的事业也就是我们所努力的事业。我们激动的读着由各国人民组成的国际纵队，我们很喜欢的知道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参加其间。中国红军中许多同志愿意到西班牙来参加你们的斗争，没有一天不是在讨论着你们的斗争和整个西班牙的时局。如果不是我们眼前有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红军经过了十年的无休止的艰苦斗争，没有财源，饥寒交迫，缺乏武器弹药的供给，直到最后我们得到了现在的胜利。我们知道你们及你们的军队也在经历着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困苦。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的。我们十年的斗争指示我们，如果一个革命的人民和军队不怕痛苦，不折不挠的英勇反抗敌人，他们一定会胜利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对于你们为了西班牙的民主制度而斗争的英雄男女们，表示深切同志的

敬意。通过他们，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表示了无限的团结和友爱精神。像过去一样，我们将注意你们每一个时辰每一个日子的斗争经过，为你们的一切胜利而欢欣鼓舞，我们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你们的。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于陕西延安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1]

(1937年5月15日)

韦尔斯问：关于国共两党最近的和平谈判如何？

毛泽东答：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则不能很好地合作。大纲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革命任务。关于军队之改编及苏维埃之改变诸具体工作，不久即将进行。至现在为止，国民党方面所表示的仍然不够，如对上海救国领袖之起诉^[2]，对上海纱厂工人之待遇及对国民大会法规之种种限制，皆使人失望。

问：内战的危险已经完全消灭了吗？

答：内战的危机在表面上是过去了，但是内中仍然存在着，不过不是重要的了。如果说和平完全成功，会使群众对于“巩固和平”这一个运动表示松懈。目前全国规模的停止内战仍然没有做到。共产党方面已经指令散在全国各处的红色部队停止战争，但是

[1] 这是毛泽东和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

[2] 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称七君子事件。同年12月，沈钧儒等被押至苏州，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1937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对沈钧儒等提出公诉，并于6月开庭审判。由于全国人民声援和七君子坚持斗争，七七事变后沈钧儒等被释放。

国民党军队仍然“进剿”，如在闽浙赣边区、鄂豫皖边区、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处战争仍然在继续着，我们现在正向国民党要求停止这些地方的进攻。至于南京与地方的对立，也是存在着，惟有实行彻底民主，才能完全消灭此种对立与内战的危机。

问：共产党对南京各派的看法是怎样？

答：我们愿意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联合，对那些不同情的，作解释工作，使他们明了，使其不妨碍民族民主的革命。国民党左派的赞成和平、民主、抗战的运动正在发展，他们愿意全国团结，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党，恢复其革命精神。另一部分人，他们的坚决性不够，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彻底接受，对国共合作表示怀疑，他们挣扎着，人民的任务在推动他们，影响他们，使他们到人民这边来。又另外一部分人，所谓亲日派，也存在于国民党中，他们为全国所不满，国民党中的大部分也不满意他们，这部分人如不改变态度，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民党。

问：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得到了怎样的开展呢？

答：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是有开展的，国共两党的接近，是最主要的，其余那些怀疑共产党政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他们不反对国共合作；至于“左”倾分子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也比较减少了。但是文化界、学生界、舆论界对南京政府的不信任，却依然存在，因为南京迄未具体表示其彻底的坚决的转变，许多错误政策仍然保留着，致引起全国的不信任。我们说“大家应该工作”，南京之彻底转变有待全国人民之继续工作，不要等着它自动转变。统一战线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国内必须团结，才能达到抗日的目的，这是非常明显的。

问：国内各党派对统一战线的反应如何？

答：汉奸除外，其他一切党派，对全国团结都是同情的。有许多资产阶级人物对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所取的和平政策，表示欢迎与赞同，但是另外一部分顽固分子，却取反对的态度，这些分子如果不改变其态度，不论其主观见地如何，实际确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反对国内团结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汉奸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1]之流等便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分子的活动毫无疑义是汉奸的行动，对这部分人，我们的办法是尽量揭破其阴谋，使其在民众中间不能起欺骗作用，使全中国人民认识他们是全民族的公敌，以便群起而攻之。

问：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问题怎样解决？

答：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存在，是不利于对外的，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少此种对立，达到团结对外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南京与各省都应当接近一步，主要是在民主问题上有所进步，以后才能消除对立，走向团结抗日的大道。

问：在统一战线政策中，阶级斗争问题怎样求得其适当的解决？

答：阶级的矛盾，在阶级制度未废除前，是无法消灭的。但在抗日战争的面前，我们对这个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因此在统一战线纲领中，我们提出给人民在政治上以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以生活的改善。工人农民受着政治与经济的压迫，起来反抗是必然的，只有给以民主权利与改善其生活，始能减少其矛盾。我们要在正与国

[1]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系、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需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之。

问：你们为什么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

答：关于民主与抗日的关系，我已经在别的机会中讲过许多。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问：怎样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

答：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全国军人应该拥护民主运动，因为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民主运动的具体进行，应注意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开会，应注意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与爱国救国的完全自由。这是起码的民主权利。如果整个国家向这个方向走，则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能实现的。

问：共产党对此次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

答：今天的国民大会，带着国防性，同时是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桥梁，因此全国应参加国民大会，共产党是准备参加的。南京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如不加以修改，则国民大会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全国应联合要求南京修

改其不正当的规定。国民大会的选举，应由人民参加，它的召集与开会，应予以充分的自由，其任务应不限于谈宪法，而须扩展到彻底而具体的讨论抗日救亡的方针。共产党对国民大会的意见，已向全国发表，并向国民党提出，现在仍继续谈判，目的在使国民大会完成民主抗日的任务。

问：对释放政治犯问题，共产党的意见如何？

答：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共产党早已提出，现在继续要求，把它当作同国民党谈判之一部。南京如果要表示它政策的彻底转变，则没有理由不释放政治犯；不过目前国民党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现，虽然口头上答应释放政治犯，但实际并没有做到，而且还有继续逮捕爱国犯的事件。苏州对救国领袖的审判，大失人望，南京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满，南京要真诚表示它与民更始的决心，应马上释放救国七领袖，并宣告其无罪。

问：关于准备抗战问题，你有何意见？

答：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哪一天向我进攻，我们都要即时予以抵抗，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论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但是假如日本暂时不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武力进攻，在准备侵略期间采取较缓和的政策，我们就应利用此时机作积极准备抗战的工作。我们提出“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敌准备工作。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

抗战的意见。

问：中日战争的结局你怎样估计？

答：战争的结局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国内统一战线的成功，人民与政府的紧密团结，国际和平战线的胜利，日本国内和平势力的援助，是争取此种前途的条件。但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与坚决的抗战，为取得此种前途之最主要的和决定的条件；无此条件，则抗战是无前途的。次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达到它的目的，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此种危险也是存在的。但这必由于中国人民的分散，不团结，不抗战或不坚决不彻底的抗战，不联合世界上帮助它的友人等条件下才发生此种危险，中国人民如果继续睡觉，房子就会被敌人抢去。共产党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斗争。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就是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我们号召各党派、各阶级坚决地反对中国殖民地化，要求中国的自由与解放，并且为了取得这种自由与解放的胜利，我们要同敌人斗争到底。

问：英、日最近的接近，你怎样看法？

答：日本统治者与英国保守党政府正企图缓和他们间的冲突，进行着妥协调判，以达到他们牺牲中国的目的。中国人民不能听他人的宰割，中国人民应当严密注意此事，如果南京在保卫民族利益的工作上表示动摇与消极，人民与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对它都是不能饶恕的。同时我们要知道，英日两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妥协，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基础。不错，英日的妥协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能的，但是何时何地是有限制的。英国欲维持现状，但现状的内容容易时刻变动着，这从“九一八”后英国的步步退让中可以看出来。在基本上，日本对华的独占政策与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所持的门户开放

政策是对立的，但是一时的、某些部分的妥协是可能的，因为英国本来随时可以出卖中国的利益，而达到于它有利的目的。不管英日妥协的程度如何，关于中国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国人民不应一刻疏忽。在抗日运动中，不能过于信赖英国。我们要认清英国的本质，就不会上它的当。中国不能完全孤立，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在今天有着实际的政治意义，中苏的关系应当进一步接近与改善。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对英国保守党与广大的英国人民，我们应当区别开。保守党在西欧政策上徘徊于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之间，已引起国内人民的极大不满；如在对华问题上再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求妥协，则除了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外，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同情。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在进行着准备裁制一切法西斯主义。中国的解放运动与世界的解放运动是密切联系着，我们的前途是绝对光明的。

问：你对北方青年有怎样的希望？

答：北方青年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烦闷，这应在集体的运动中求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现的斗争。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的一环；如若干人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果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



《春暖花开》(油画)

致李富春、黎林电^[1]

(1937年5月23日)

为着彻底肃清苏区内的土匪，保障一切建设事业的实施，创造抗日模范特区，陕甘宁地方武装应作出清匪计划。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军事部部长黎林电的主要内容。

会见蒋介石须谈两方面的问题^[1]

(1937年5月24日)

周：

我们觉得此次见蒋须谈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二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军事、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请将你对上述两方面如何提法之意见电告，我们将于二十七日以前有一电报给你。因此请你准备二十八日飞沪。

毛 洛 博

五月二十四日十九时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给周恩来的电报。

和国民党谈判要点^[1]

(1937年5月25日)

周：

关于见蒋谈判之问题，除同意来电所提者外，应增加下述各点：(甲) 向蒋提出并询问蒋之方针者：(一) 保卫绥远、青岛，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英日伦敦谈判等对日问题；(二) 联俄问题；(三) 太平洋集体安全问题；(四) 国防军事财政之准备；(五) 汉奸亲日派退出政府问题。(乙) 须力争办到者：(一) 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二) 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长林彪，二师长贺龙，三师长徐向前，四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三) 取缔北平陶希圣、杨立奎等凶殴学生，西安扣留解放报及书籍，上海逮捕共党，文化建设杂志，破坏两党合作等行为。(四) 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之行为。(五) 增加红军防地。

洛 博 毛

有午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给周恩来的电报。

给抗大的信^[1]

(1937年5月28日)

印度祝大夫捐一〇一□□为抗大射击优胜奖，最好请照他的意见办理。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印度祝凯华大夫为抗大捐款一事给抗大写的一封信。

在欢迎中央考察团晚会上的讲话^[1]

(1937年5月29日)

今天这个欢迎会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由是国共两党干起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中央考察团此来，使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重大，我认为要说明如下两点：

一、有人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对双方都怀疑，今天的事 实，考察团之此来就说明了这一点，共产党方面在两年来政治上的 表示，如文件宣言，谈判等都是为着两党团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的方针，都表示两方的和平政策，不怕敌人挑拨，始终没有动摇， 过去已证明了这一点，以后如何呢？要看以后工作来证明，在以后 应巩固两党的团结，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若干必须解决的矛盾（不 利于团结的矛盾）结成坚固团体去对付我们的敌人，以求得民族独 立，民主权利，民生幸福的实现。

二、又有人怀疑两党合作双方都存阴谋诡计，都是临时的策略 作用。这也要看过去我们的工作到底是破坏还是团结，我想在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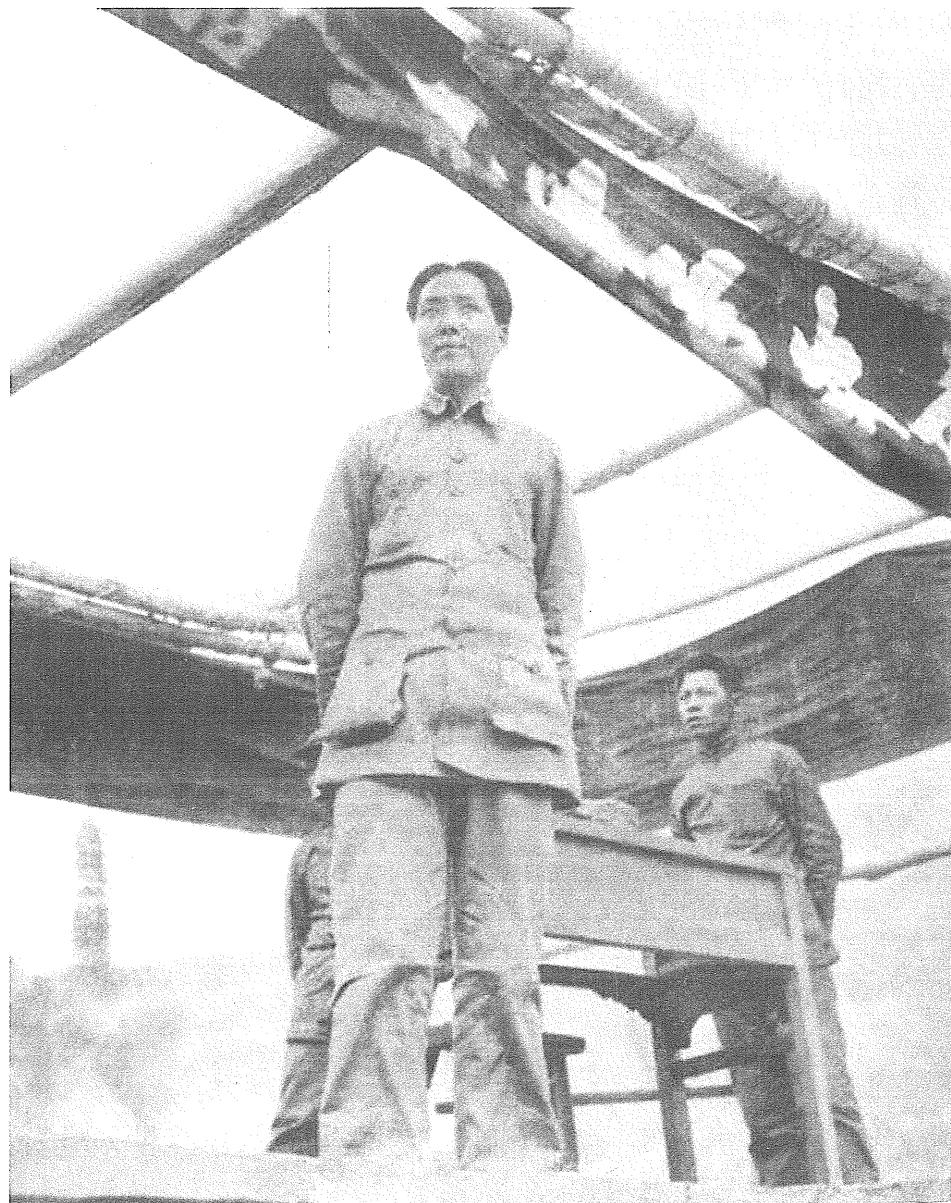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在特区政府欢迎由团长涂思宗（国民党第四军副军长）率领的“中央考察团”晚会上的讲话。

事变以后，事实更加告诉了大家，是向着团结方面的，这主要的看以后，同时有人怀疑两党没有长期合作的诚意，我想这都是一种猜想，我们是希望两党长期的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干。

共产党方面诚意的欢迎中央考察团，丝毫没有假意，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充分的表现。



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和国民党中央考察团人员在延安欢迎会上。



1937年5月，毛泽东在欢迎由涂思宗率领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大会上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合作是长期的。



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和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等在延安合影。



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和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等在延安合影。

在延安纪念“五份”和欢迎 “中央考察团”大会上的讲话^[1]

(1937年5月30日)

今天我们的敌人是日本。日本占领了东四省、察北、冀东等地，到处捣乱，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打日本、救中国。我们欢迎中央考察团也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现在国共双方都感到要团结，共同抗日救国。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五份”和欢迎“中央考察团”大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为参加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题词^[1]

(1937年5月)

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五月于延安城

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 一九三七年五月
于延安城

毛泽东为参加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的题词。

[1] 这是毛泽东于1937年5月在和18位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同志在延安合影时，在照片的顶端所写的题词。



1937年5月，毛泽东和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

观赏万花山牡丹时的谈话

(1937年5月30日)

这是我们民族的财富，一定要管好，等全国解放后，可以在这里修公园，修疗养院，作为劳动人民游玩和娱乐的场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

(1937年6月3日)

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联系这个问题，还有党内关系、宣传教育问题，也是极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于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党与群众工作的发展与缩小、成功与失败，不完全决定于主观方面，也决定于客观方面。在客观有利时而弄得不好，在客观不利时而不使事情弄得不十分坏，这是主观的原因。然而大发展，必在客观有利之时。主观指导受客观可能性的限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但是，党员群众与广大干

[1]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由刘少奇等主持。会议开始，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与会代表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出现了一些分歧，有的代表没摆脱“左”的思想影响，认为刘少奇的报告有右的倾向，批评了刘少奇一些正确的观点。为此，6月1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白区工作问题。这是毛泽东6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避免，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和给以防止。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并且取得伟大的成绩。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左”的传统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并且占着大的数目；（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要克服“左”的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

给郭化若^[1]的信

(1937年6月4日)

郭化若同志，并告彭、任、袁^[2]：

在保安接到你的信，又看到你给罗瑞卿^[3]同志的信，今日又接到来信，你的工作要求与身体情形已经知道了。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学习、工作应在不损伤身体的原则下，减少到适当程度。

毛泽东

[1] 郭化若，(1904—1995)，福建闽侯人。当时任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任，指任弼时，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政委。袁，指袁国平，当时任庆阳步兵学校政治委员。

[3] 罗瑞卿，当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

(1937年6月5日)

关于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必须承认下面的论断：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这是第一方面。但还有另一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6月5日和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1]，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这是第三点。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这是第四点。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

[1] 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20世纪40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这是第五点。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关于党的传统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乙）有，三个人^[1]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

[1] 三个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何凯丰（1906—1955），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1]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逼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

[1] 伯渠，即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

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同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

证据。

从洛甫^[1]同志分析中也证明这个不良的（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之存在。因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1] 洛甫，即张闻天。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复叶剑英电^[1]

(1937年6月5日)

同意派文彬等去兰州任联络。要求顾祝同介绍文彬至青海，释回红四方面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的人员。向徐向前同志问明陈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设法接引回来。

[1] 这是毛泽东复叶剑英并告张文彬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6月10日)

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

北方局要成立，中央代表另派，北方局和省委不需设许多委员会，只设部。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北方局工作讲话的一部分。

致王世英电^[1]

(1937年6月12日)

已与彭泽湘^[2]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已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

[1] 这是毛泽东致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彭泽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干会成员。

致潘汉年电^[1]

(1937年6月12日)

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

[1] 这是毛泽东致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

在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

(1937年6月20日)

高尔基具有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个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个很好的政治家。

[1] 苏区文艺协会在1937年6月20日晚上召开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和美国学者T·A·彼森的谈话^[1]

(1937年6月22日、23日)

二十二日

问：一九三一年以来，南京对日政策有何演变？这种发展能否分为几个阶段？

答：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由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国民党二中全会为止。在此期间，国民党继续执行它依赖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步步退让、镇压人民的独裁政策。

“九一八”以后，它无条件地放弃了东北。由于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战争，中国资产阶级让日本帝国主义吓坏了。他们在沿海各省连一点防御工事都不搞，准备把这些省份拱手让给日本。上海战争时，他们就准备迁到洛阳，当陪都，如果必要还要再迁至西安。直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T·A·彼森的谈话。彼森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问题，1924年至1928年曾来中国教书，1937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研究中日关系问题，并于同年6月访问延安。1973年3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的《中国研究专刊》第11号上发表了彼森写的《1937年的延安：同中共领导人的几次谈话》，其中第九、十两章为《访问毛泽东》。本篇谈话即《访问毛泽东》。文中问者即T·A·彼森，答者为毛泽东。

到南京发现日本发动上海战争只是作为使占领东北合法化的一种手段，而日本军队并不想占领沿海各省，加以英国和美国也作了一些努力反对日本，南京这才决定不迁都。所以，他们又回到南京，但仍然害怕日本，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华北事态发展前，都是如此。^[1]

一九三五年，日本企图一举占领华北，南京吓坏了，只得签订何梅协定^[2]。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种态度还占优势。南京当时仍旧表示：只要能和，它并不想打，也即是说，它准备进一步投降。

只有到了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二中全会上，南京才改变了它对日本的腔调。会上，它宣称：假如日本不再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不占更多土地，它就不打。这即是表明要求维持现状，从而它也阐明了准备作出牺牲的限度。体现这种路线改变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就是张群和川樾^[3]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三日的谈判。当时南京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从一九三一年直到一九三六年，南京的投降政策这才第一次表现出有所改变的迹象。

问：这个时期，是否跟南京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如果有关系，涉及这一斗争的有哪些主要集团？它们代表哪些社会经济势力？

答：现在我们要谈谈南京改变政策的原因。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有三种：

[1] 日本搞的“华北自治化”运动，曾激起平津学生广泛的游行示威，并且扩大到全中国，导致在各大城市中组成各界救国会。

[2] 何梅协定，签订于1935年7月6日，主要内容是在华北给予日本特权。

[3] 张群，国民党外交部部长。川樾，日本驻华大使。

(一) 中国人民发动的抗日斗争、爱国军队、共产党和红军。这包括：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一九三二年在上海），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打击了日本人的吉鸿昌部队，一九三六年取得保卫绥远胜利的傅作义部队，学生的示威游行，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国救亡运动。

国民党认为，日本的侵略是无法抵抗的。我们知道，东北义勇军已经抵抗了而且还在继续抵抗。国民党认为，人民的抗日运动只会给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口实。实际上这种运动给予日本人的打击如此沉重，以致日本人胆战心惊，对侵占更多的土地也产生动摇。国民党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事实上，上海战役和长城战役（在察哈尔和绥远一带）已经证明中国能够抵抗，而且有一段时期制止了日本的侵略。

国民党把共产党视作势不两立的世仇，而不把日本人看作敌人。因此，国民党总想消灭共产党，但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强迫国民党不得不正视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这就是导致南京对日政策发生变化的基本原因。从这点出发，南京开始认识到人民中蕴藏着真正的、整个的民族力量。它开始感到胆大些了，勇敢些了，所以说统一战线使它减少了对日本人的恐惧。

(二) 第二个因素是国际形势。苏联同情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这是当然的。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部分：一部分希望和平，保持现状；另一部分，由法西斯侵略者和新的世界大战的煽动者组成。英国远东政策（具有某些反日行动）的相应改变，也对南京产生了影响。由于以上两种因素，产生了助长南京转变的最后一一种因素，这就是：

(三) 国民党统治阶级和党内的分化。国民党内部原有许多集团

和派系，但基本上是两个集团：亲日集团和反日集团。分化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已经开始，但直到一九三五年日本搞了华北“自治”运动之后，国民党区域内那种认为中国必须抗日而且能够抗日的见解才形成舆论。过去，这只是相对少数的人所持有的看法；如今，它已日益普遍。到了一九三六年，它已如此广泛，以至于对南京的政治和政策产生了第一次真正有力的影响。

问：南京有哪些集团或者个人赞成或者反对统一战线？南京政府有哪些迹象向民主化发展？沿着这条路线，你认为最近的将来还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

答：现在，我们谈下一个阶段，即关于现在和将来。从张群、川樾谈判开始表现出来的南京政策的改变，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明显地继续有所表现。会上，国民党的政策在各方面表现了真正的变化。现在它对日本的态度变得强硬多了，正式通过了国内和平的政策，即不打内战。这种发展，跟中共早就提出的必须团结全国一切力量抗日的政策直接有关。

当前，下一个最重要的步骤是南京有关民主政策的改变。国民党没下决心彻底放弃它统治的根本特色，即其军事独裁。南京没有作出这种改变。实现民主改革，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要巩固国内和平和全国团结一致，民主是基本条件。没有民主，就不能有效地推进抵抗日本侵略的艰巨任务。

因此，今天人民大众的口号是：（1）国内和平，（2）民主改革，（3）抗日战争。所有这些都从属于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国家的总口号。在这个时期，影响国民党政策的上述三种因素将对全国人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借助于这三种因素，我们可以实现这三个口号。

至于那些反对统一战线的集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一) 国际方面，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但日本不是孤立的，德国也参加了这个法西斯集团，还有意大利。他们总想引诱中国统治阶级参加他们的阵线。它们不仅要中国成为一个殖民地，而且要它成为用来对抗和平阵线的一支力量。这是第一个有威胁性的因素。

(二)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亲日派和社会上的托派^[1]。它们竭力反对统一战线和上述三个主要口号。这是第二个危险因素。

(三) 不坚定、动摇分子的危险。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中都有这种人。原则上他们赞成抗日，但又不肯给予人民民主权利。他们的难处是脚踏两条船，结果他们或者是淹死，或者是双脚踏上日本人的船。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五月四日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冲突和将救国会的领导人关进监狱。北师大的杨立奎^[2]就是这些分子中的一个。

国际、国内的这三个集团，实际上站的是同一个立场：他们实质上反对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政策。统一战线的任务能否实现，取决于抗日派、主张改革南京制度的民主派和一切争取团结一致的人们能否战胜上述三种反对派。如果战胜了，这些口号就会实现，否则，前途就会困难。结果如何，要由这两个阵线之间的斗争来决定。

至于双方斗争的发展会怎样，应当看到抗日阵线已经取得初步的胜利。主要的迹象是：制止了中国参加法西斯阵线，使它转向反

[1] 托派，极左分子，如张国焘等人，曾反对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要作出的妥协。

[2] 杨立奎，北师大物理系主任，曾大造舆论攻击北平学联接受中共津贴，但从不拿出任何事实来证明他的论断。

法西斯阵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日本已经被打败了。中共早就全力以赴地阻止中国参加法西斯阵线。这表现在西安事变前它就长期致力于在统一战线中团结全中国力量的工作；这也表现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并没有利用这个事件在内战中谋取私利；这更表现在西安事变后中共为了团结全国力量抗日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

问：西安事变时以及事变后，前面说到有组成一支西北联军（东北军和红军联合起来反对南京）的可能性，它在政治上有什么好处？

答：首先，中国没有加入法西斯阵线（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时，在南京由何应钦领导的、不祥的政治动乱已经预示了这种威胁）。其次，如同我刚才所讲的，团结中国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唯有实施这种政策，才能救中国。

问：西安事变后，燕京大学的学生选举中，左派力量对于要遵循什么方针似乎有所疑虑。他们未有力地参加竞选，结果反动学生取得了控制学生会重要职务的胜利；最近，在新领导召开的一次燕大学生会代表大会上，竟至通过决议要退出北平学联。这会不会是一种迹象，表明群众运动对于理解和正确执行这条新路线遇到的困难？

答：这种情况反映出西安事变引起的一种反作用。西安事变开头还是一种反蒋起义，只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这种性质才起了变化。后来它转变成在承认蒋政权的条件下的大团结。使叛乱变为联合的是红军。中共并没有因此而失利。恰恰相反，中共的力量和影响反而在全中国进一步大大扩展。粗粗一看，似乎我们在燕京的影响有所减退，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我们假如从全国的大学和城市全面来看，实际上中共的影响和威信并未削弱，而是增长了。我们相

信，学生们一定会看清全局，认识我们的政策在西安事变中取得的胜利。

问：承认南京是全国各种力量的领导，会不会使学生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产生混乱？要采取什么行动路线才能避免发生这种困局？

答：对于领导问题，群众不会产生什么怀疑。领导并不靠力量的大小，而在于领导者提出的纲领和作出的努力。中共不谋私利，只为大多数人民的、国家的、劳苦大众的利益服务。如果斗争胜利了，日本人打败了，如果局势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就意味着这个运动是在中共的领导之下。中共指明的道路，是救国的唯一道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的。如果全国都遵循中共所规划的道路，敌人阵线的钢铁意志也定被粉碎。不论是日本的影响、亲日派或者各种动摇分子，他们统统都要被中共领导的人民斗争所消灭。永远存在下去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必定会看到这种结局。

问：英国加强中国实力以抗日，是不是为了避免战争和保护它的利益，并且通过使敌对双方保持均势的做法利用双方来反对苏联？这种支持难道不会促使南京出现一个将来企图消灭中共的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

答：英国加强对中国的影响，是当前的一种矛盾现象。抗日斗争中，由于中国处于殖民地的地位，一个第三国有可能在此时加强它在中国的地位。那么，是否可以说这就是前门驱虎后门引狼呢？不行，那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

不能把日本看作是和英国同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跟侵略阵线勾结，另一个并非如此。把它们一样看待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是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结果我们就要同时打它们两家，

或者必须同时打一切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危险的。只有托派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打一切帝国主义。表面上，它仿佛很革命，但实际上会把英国赶到日本一边去。这是作茧自缚。

中共的政策刚刚与此相反。我们必须从任何反对日本的国家得到援助以打击日本。我们体会到，如果中国像东北那样地被法西斯国家所征服，从托洛茨基的漂亮词句中我们什么也得不到。至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中国提供的援助，这种支援必须限于一种特殊的范畴。这种国家的政策必须不同于日本，主要是在这一点上不同：即维护中国的主权。

从前，英国是反苏十字军的头子，大英帝国的神圣职责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德国和日本接过了这个衣钵，英国正在改变对苏联的态度。目前它采取维持它现有地位的保守政策。尽管英国不喜欢苏联，但新的形势也叫它不能十分喜欢德国和日本。当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贯对他们的思想自由引以自傲，他们爱怎么想就可以怎么想，但他们到头来必定会得出这个结论：还是借苏联的帮助维护他们的利益好些。思想跟行动并不总是一回事。

英国搞不成你讲的那种远东实力均势。确实，英国很久以前就采取了并一直遵循着均势政策。但是，一旦均势双方力量不均，就要这边加点那边减点以求取得平衡。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任何这样的均势只能是暂时的。英国在欧洲想搞这种均势，但只要出现任何均势，法西斯国家毫无疑问就会破坏它。英国要拯救自己，就不得不援助和平阵线的势力、民主势力。

在某种情况下，因为法西斯势力迅速发展，英国必须利用往往是革命的反法西斯力量。所以，它不能阻挠革命的反法西斯力量成长。妥协政策、均势政策容许革命力量成长。法国和西班牙的实例

体现了这种进程。这两个国家里都有一定的亲法西斯势力，但让这种势力当权，对于英国是太危险了。因此，英国尽管不喜欢联合阵线政府，但也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之合作。英国当前的政策有许多的矛盾。它的妥协行动也助长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抬头，而法西斯洪水的泛滥又激起了革命的浪潮，这样以来苏联这条船就升得更高了。

今天中国的形势跟西班牙的弗朗哥境况有某些相似之处。黄埔集团（南京的军事右派）面对着两个敌人——中共和日本。假如它联日反共，它就要扮演弗朗哥的角色，像在西班牙那样，那就要跟中国革命力量打一场内战。假如黄埔集团决心抗日，它就必须扩展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从而它必须接受中共的纲领。因此，它也不能阻挠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不管它怎样做，中共的影响都会增长。

至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很明显，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到现在，甚至从更早些时候起，南京一直在搞军事独裁，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独裁又外加一个亲日政策。现在，国民党改变了它的外交政策，它也必须改变它的国内政策。国民党在同一个时候既要镇压人民，又要抗日成功，那是行不通的。很可能，南京并不愿意深入、持久地执行抗日政策。现在还没有抗战，还没有民主。这只能是一种暂时情况。目前时期具有过渡的特点，它正在从一个阶段跨入另一个阶段。我们正处在这个过渡时期之中。

笼统地说，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也可能看到许多不健康的现
象。在中国，我们看到逮捕和审讯救国会的领导人，看到镇压群众运动，看到还未完全放弃的旧政策的一些残余。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健康倾向反对残余弊病的斗争。我们还看得见另外这一面，因此我们不必过分担心。要客观地注视正在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才是

目前时期的本质特点。假如某些国民党成员继续坚持旧政策不求改革，他们有采取这种态度的自由；但是，新生的抗日民主力量正在成长壮大，它必将制止这些人的行动。即使是美国最高法院院长（查尔斯·伊文斯）休斯，也得有所改变，否则只有垮台完事。

二十三日

问：学生和知识分子当前应持什么立场？

答：作为二者择一的情况——或者跟随南京，或者跟随中共——来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过去，有些学生跟中共站在一起，一些学生跟南京站在一道。如今，在统一战线中，在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中，有着一个共同的前途。根据反对日本、拥护民主阵线的纲领，我们能够团结绝大多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只有一小撮右派会动摇。

在过去，知识分子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军事独裁统治的双重压迫。感到这种内外交煎压迫的，还不仅是知识分子，那些受到内外压迫的资产阶级也有同感。

今天，有了一个新的前景。目前情况是，我们取消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国民党取消它的专制独裁，双方联合起来创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假如不满足这个要求，假如这个纲领不向前发展，南京的地位将日益削弱，要维持现状也越来越困难。因此，双方都要朝着同一个政治目标——抗日统一战线——作出努力。与此同时，还要跟敌对势力——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的联合阵线——作斗争。

问：你看统一战线将来的发展怎样？

答：统一战线当然是由一些不同的集团组成的，它们之间的斗争将决定它的将来。它将按照不能详加预见的不同阶段向前发展。

它的组成，基本上以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另一方。它们有些东西是共同的，有些是不同的。那些共同点应该而且能够团结统一战线中的双方，但同时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带来斗争，这种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问题必须这样来看待。

况且，国际舞台上发生的外部事件也影响着将来的发展。因此，它取决于中国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发展。但有一点可以断言，显然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阵线胜利，要么就是中国统一战线胜利。一切取决于这两者之间斗争的结局。

至于在最近的将来，中国国内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所有各种集团都有它们在其中的一份利益。基本任务是改善农民、工人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进一步的任务是解决受到殖民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威胁的资产阶级的某些问题。这些就是统一战线纲领第一阶段的任务。

民主共和国创立之后，下一项预定任务是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它的未来，首先，是民主共和国；其次，是社会主义革命。

问：为什么你认为中国不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答：第一，无论过去或现在，中国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资产阶级可能梦想那样一种远景，但无论中国的目前状况或是现时代的要求都不允许那样。

中国不准备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但现在它正准备着争取独立的地位。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争取实现

了友谊。你们为了促使美国采取正确立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进行斗争的政策，我们完全同意。

不能把中国的革命看成是孤立的。它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虽然有它本身的特点，但基本上跟西班牙、法国、美国和英国人民的斗争是相同的。这些斗争的固有特征全都相同，全都是为了争取世界进步。美国大众对中国的广泛同情正表明了这种共同性。他们关怀中国人民的命运，我们也关怀他们的命运。请把这个意思转告美国人民。中国存在着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压迫，美国也存在着压迫，只是来源不同。因此，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我们两国人民团结起来的联合斗争，能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



毛泽东和外国友人在一起。

和尼姆·韦尔斯的谈话^[1]

(1937年6月24日、7月4日、8月13日)

—

(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前途。过去一些知识分子站在国民党一边，一些站在共产党一边。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目标，大家都将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团结绝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是可能的，只有极少数右派会动摇。”这个统一战线是反对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它的内部，一方面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他们之间有共同点，所以能够联合起来；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所以在统一战线内部还有矛盾和斗争。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根据中国内部和外部的形势而定。抗日战争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日本侵略者胜利，或者是中国抗日阵线胜利；第二种可能性的前途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问题，如提高生活待遇等，资产阶级的问题，如避免殖民化危险等，都将得到解决。民主共和国建立后，下一个

[1] 尼姆·韦尔斯是美国记者、作家斯诺·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埃德加·斯诺的前妻。1937年访问延安，先后3次采访了毛泽东。她后来根据当时的访问记录，写成了《延安笔记》《革命生涯：传记》《中共杂记》等书。本篇谈话选自《延安笔记》。

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者十足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 中国怎样才能摆脱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任何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这个条件使中国在将来能跳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现在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胜利当然是属于革命一边的；苏联的存在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将有决定性的影响；再加上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据这三个条件，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但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在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需要的，因为它是抵抗帝国主义的力量之一。通过工业的发展，它将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力量。

—

(一) 关于中国各阶级的问题。中国的银行家许多是买办和半买办。中小银行家与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宋子文和孔祥熙是国家资本的银行家。一部分地主和买办的利益与日本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他们可能成为汉奸。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半殖民地社会里，作为附属品的知识分子处于工作没有保障的地位。学生是社会革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起这种作用。农民是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他们会跟着资产阶级

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他们会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称无地的农民为农村无产阶级，没有足够土地来维持生计的农民为半无产阶级。红军主要由贫农和农村、城市的无产阶级组成，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地主是四位一体的，他们是地主、商人、收税人，但不一定都是高利贷者。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形式有租金、高利贷、征税、商品价格。国民党是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上层的联盟，他们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也有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可能性，这要根据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态度而定。蒋介石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包括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当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合作时，阶级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亲日派和投降派可能会减少。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运动的性质。基本性质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经过民主阶段到达共产主义阶段之后，它才能进入共产主义领域。正如前面提到的，由于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此必须由它的党来领导。

三

（一）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问题。红军刚接到南京的命令，要他们在南京政府指挥下开赴抗日前线；朱德总司令已到南京去参加正在举行的国防会议，但蒋介石还没有允许发表两党合作的政治宣言。由于蒋介石拖延，所以红军还没有改编。南京担心，如果宣言一公布，将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应。我们要求早一点公布，但是南京不同意。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南京要求军队的总司令和政治部首脑由南京来任命，我们拒绝了。而我们有些要求，如释放政治犯，给予言论、出版自由，允许

共产党在白区公开工作以及公布宣言等，南京方面都接受了，但还没有实行。

（二）对日作战问题。共产党要求立即对日作战。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将决定这次战争爆发的时间。战争的前途有两种可能：第一胜利，第二失败。我们怎样取得胜利呢？我们必须满怀信心地英勇作战，坚持斗争，我们必须实现共产党提出的十项要求。这样，我们就一定能胜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败。



毛泽东和外国友人在延安。



1937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记者合影。左起：拉铁摩尔、叶非、毛泽东、阿拉尼斯、彼森、韦尔斯。

毛澤東同志
長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
政治報告及結論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

飛躍先哲收存

一九三七
年五月三日
斯諾

斯諾

毛泽东在赠斯诺的书上题字留念。

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信

(1937年6月24日)

我亲爱的白劳德同志：

趁一个同志的访问之便，我致此信与你——我们敬佩的白劳德同志，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和美国人民的领袖。

中国共产党同样是面临着一个历史的任务。这就是抵抗和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努力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我们的工作是处于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我们已经有了进步，我们也正在尽力要做到所企求的结果。

从一些美国朋友和其他方面，我们听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同时我们觉得，当我们获得胜利的时候，这胜利会给美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很多帮助。

世界现在正处在一个大爆裂的前夜，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企求解放的人民一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斗争。

此致

革命敬礼！

毛泽东

六月二十四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6月24日)

关于各省工作问题，如果我们在各省的领导弱，讲统一，国民党不发钱，就要发生很大困难。所以还是较缓进行，我们派人弄通了再说。首先要各省变更政策，执行新政策，变更对地主的政策、土地政策。如果军事上敌人进攻，就坚决地打，俟大局定了，不会妨碍我们的军队，我们即可与之协商改编办法。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红军归我们办，各地都要弄好关系。但对国民党采用经济上限制、硬要缴枪等事，须与之抵抗。基本原则是不能减弱我们的力量。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等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张云逸电^[1]

(1937年6月24日)

应坦白地向李宗仁、白崇禧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为扩大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函请各方谈话的范围，应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三方政治人物应邀前往。广西、香港方面应进行宪政促成运动。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致张云逸电的主要内容。

给何香凝^[1]的信

(1937年6月25日)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2]，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3]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4]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

[1] 何香凝（1878—1972），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画家，廖仲恺夫人。早年加入同盟会，随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2] 《双清词草》，是廖仲恺的诗词集，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出版。

[3] 承志，即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州人。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国民党左派，诗人。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经常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题画，共同表达胸中的愤慨。

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號

馬敘先先生：

承賜筆、承賜書葉及製畫
詞章。都收到丁，大為感謝。沒有
什麼奉答。先生，惟有多做些
工作，作為答謝厚意之物。先生
的文章，充滿革命之義，我雖不知底，
也覺很好。今日之事，惟有斗胆
乃能勝利。先生一流人，繼承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一號

先生傳統，苦斗不屈，為中華民族
樹立模範。某仰慕膺此，有全國
民衆不獨澤東舉力數人而已。
所志在此甚好。大家部覺以他如
此勿寧多矣。士卒不足，先生知
此較多一些，捨心別矣。弟齊、山老
士亦急盼。請勿擱置。敬候
如意，為兄至人。惟時乞為致意。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一號

像這樣有骨氣的革命文人，恐怕太
少。沒二三個拿句毛語送冲做人中
流砥柱，是知他這時代的時代竟
如何？時事斷有轉机，想
先生尚有回天之力。誠為煩你
大努力方能達到。敬祝
健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毛澤東上

前

毛泽东致何香凝信的手稿。

和廖承志的谈话^[1]

(1937年6月26日)

你母亲是个杰出的女性，就你这个独子都不溺爱，把自己最心爱的亲人献给了革命。

有人马上去上海，我给令堂大人写了封回信，你有什么话，也写封信带上，我让他们等你。

偷懒！好，我给你代笔，但可得给润笔费呀！

[1] 何香凝托人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份礼物：一套上好的狼毫湖笔，一本画集，一本《双清词草》。这是毛泽东和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谈话的一部分。



1937年年初，毛泽东经常到延安新华通讯社视察工作，和廖承志交谈。
图为根据廖承志回忆所作的油画。

致潘汉年电^[1]

(1937年6月26日)

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6月28日)

对兰州新到被俘人员应除慰问外并向他们解释一切，最好能派人同来西安，免致中途失散。请何柱国致电贺耀祖^[2]，将兰州收容人员概送西安处置，切勿中途失散。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贺耀祖，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西安行营副主任。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6月28日)

请商何柱国以电话告顾，我们将派人去鄂豫皖及闽西南两处联络。鄂豫皖为郑位三，同行约十五人，闽西南为方方，同行为十人，均带有小电台，请行营发护照并介绍附近最高长官接洽。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6月29日)

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有些地方还保存有游击队，如闽西南、鄂豫皖等。据报纸和新闻记者的报告，很多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的人民，对共产党很拥护，说明我们过去的斗争没有白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消息要使红军里面的人都知道。现在应用相当长期的工作恢复我们的力量。对于这些游击队，应采取坚决方针，要保存；但要改变名称不叫红军，又不打仗，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有些准备不改编的，就改为抗日义勇军。保存这些游击队、这些根据地，是有重大意义的。组织上可成立闽粤赣省委，以张鼎丞、邓子恢、谭政、方方为常委，张鼎丞为书记。对于江西的工作，要想各种方法搞进去。鄂豫皖工作，要特别注意重新讨论党与群众工作。那里保存了很大的力量是好的，然而有一缺点就是没有深入的群众工作。党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能够抓紧群众工作，要依靠群众开展鄂豫皖工作。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闽西南和鄂豫皖的工作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二

关于谈判，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保持独立性。但现在的情形，是要限制我们党，限制我们军队，一切行动要受同盟会的决定，并且蒋介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次去谈判就要签字。我们的态度，还是在他定的圈子里做事。当然他这个圈子在形式上是大大地损伤我们的独立性，在实质上也若干损伤我们的独立性。现在应从政治上来观察，是不是根本上损伤独立性，那还不是的。党的独立性主要是政策问题。大革命时期形式上是独立，实质上是做了尾巴。现在我们的政策是逐渐地冲破他的圈子。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限制就与他决裂。在前途上，我们是可以战胜他的圈子的。他这个圈子可以限制我们一些工作，但有两条他不能限制，一是党的秘密活动，一是红军给饭吃，红军、苏区实际上归我们管。

关于暑期各地学生来苏区参观的 接待问题致彭德怀等电^[1]

(1937年6月30日)

应由前总政治部办一临时招待处，由西安介绍这些坚决要进来的学生至云阳、淳化一带参观，指令专人与之谈话并讨论各项问题，发给刊物文件阅看，如愿留作短期训练者可给以一二星期训练。事毕如交通已通，可择其最好者来延安一游，余则直接出去。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暑期各地学生来苏区参观的接待问题和朱德、周恩来致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剿匪的基本方针^[1]

(1937年7月6日)

景范、黎林转分区委：

来电悉。

(一) 剿匪胜利是很好的，请更加努力。陕北散匪已肃清，股匪李清武^[2]已投诚，关中六股土匪已消灭五股。因此请你们加速完成剿匪任务。

(二) 根据剿匪经验，基本方针应该是，积极以军事力量打击土匪威胁，同时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分化、改造、改编、瓦解的策略，最后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

(三) 赵老五^[3]匪股暂时可以停止军事进攻，积极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的工作，特别注意甜水堡一带的群众工作，达到争取、分化、瓦解、消灭的目的。至少应使其暂时中立，以便我方集中力量首先消灭最坏的，然后乘其不备解决之。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给中共三边特委军事部部长刘景范和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黎林的电报。

[2] 李清武，又作李勤五，系活动于陕甘宁苏区宜川县北部及延安县临真镇一带的土匪头目。

[3] 赵老五，名赵思忠，系活动于陕甘宁苏区盐池县西南甜水堡、环县北部山城堡一带的土匪头目。

(四) 子弹现在没有，后需要时请派人来领。

毛 朱

六日

为日军进攻卢沟桥致蒋介石电^[1]

(1937年7月8日)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2]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贺龙

林彪 刘伯承 徐向前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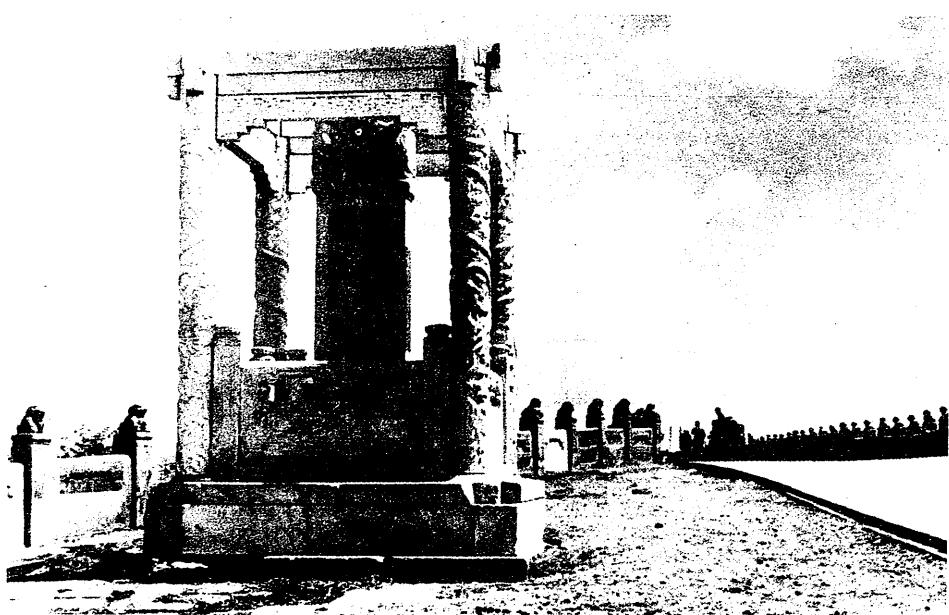
庚亥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暨各方面军首长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给蒋介石的电报。

[2] 三中全会，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由于会前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电报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会议期间，宋庆龄等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迫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这次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图为中国守军在卢沟桥上奋起抵抗日寇侵略。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图为卢沟桥桥头的“卢沟晓月”碑。

我們對蘆溝橋事件的主張

中國共產黨爲日軍進攻蘆溝橋通電

全陝各報館、各團體、各軍隊、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暨全國同胞們：

本月七日夜十時，日本在蘆溝橋，向中國駐軍漢治安部隊進攻，要求漢部退至長辛店，因漢部不允，發生衝突，現雙方尚在對戰中。

不啻日寇在蘆溼橋這一挑戰行動的結局，即將擴大成爲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或者造成外交壓迫的條件，以期導入於將來的侵略戰爭，平津與華北被日寇武裝侵略的危險，是極端嚴重了。這一危險形勢告訴我們：過去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新起義」、「新政策」的空談，不過是準備對於中國新進攻的烟幕。中國共產黨早已向全國同胞指明了這一點，現在烟幕揭開了。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佔平津與華北的危險，已經放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面前。

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險，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本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

全中國同胞們！我們應該擋禦與擁護爲治安部的英勇抗戰！我們應該擁護與擁護華北當局與國土共存亡的東方！我們要求宋哲元將軍立刻動員全部廿九軍，開赴前線應戰！我們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實援助廿九軍，並立即撥放全國民衆愛國運動，發揚抗戰的民氣，立即動員全國海陸空軍，準備應戰，立即肅清潛藏在中國境內的漢奸賣國賊份子，及一切日寇奸探，鞏固後方。我們要求全國人民，用全力援助神聖的抗日自衛戰爭！我們的口號是：

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
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寸土！

爲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
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集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願逐日寇出中國！

为日军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1]

(1937年7月8日)

北平宋明轩先生、天津张自忠先生、张家口刘汝明先生、保定冯治安先生勋鉴：

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除电蒋委员长，及全国友军请缨杀敌外，特此奉达，即祈明教。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贺龙

林彪 刘伯承 徐向前叩

庚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7位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北平宋明轩、天津张自忠、张家口刘汝明、保定冯治安等的电报。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7月9日)

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1] 1937年7月9日，毛泽东收到叶剑英来电。来说，卢沟桥事件轰动全国。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上海、太原、广西、西安 党的负责人电^[1]

(1937年7月9日)

请根据党的宣言及红军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对外之阵容才能应付大事变。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上海、太原、广西、西安党的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电^[1]

(1937年7月11日)

已向蒋介石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将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也准备派出。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对日作战方针的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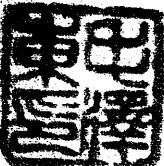
(1937年7月13日)

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

作戰主導，依賴著此得勝。固當奮鬥到底，萬勿令對日作戰失
掉方針。多方這的動員努力，尤其達到此
終力針頭方針。一切動搖將階級和階級
和努力都是要不得！

毛泽东


毛泽东题写的抗日作战方针的手稿。

在延安全市共产党员及各革命机关 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7月13日)

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1] 1937年7月13日，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紧急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1937年的毛泽东。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7月13日)

积极同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七路军及冯钦哉^[2]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我们拟先派四千人赴华北，主力改编后出发，正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准备陆续派出。

[1] 这是毛泽东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冯钦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长。

致王稼祥电^[1]

(1937年7月14日)

你在上海写的信收到了。闻你已到目的地，不胜欢慰。身体如何？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红军准备开动，赴前线协同作战。八号我党发布宣言，主张坚决抗战，保卫平津，红军将领亦有通电，大得各方欢迎。华北、上海及各地救亡运动正大起来，我们正令各地组织统一战线机关。恩来、博古、伯渠^[2]已到庐山数日，谈判抗战方针与亲密合作。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王稼祥于1937年初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同年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2] 恩来、博古、伯渠，即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秦邦宪、林伯渠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军委主席团命令

(1937年7月14日)

彭总指挥、任政委、林校长^[1]，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各师、各团及各军事学校，首长同志们：

(甲) 日本大举向华北出兵，国家危急，二十九军正在抗战，国民政府已调派援军，全国救亡运动正在奋起，我抗日红军，有开赴前线增援友军并配合友军消灭野蛮日军之务。

(乙) 令到着即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增加抗日政治课程，对干部及兵员教授东四省及华北五省地理，教授日本现状。军事训练着重雪地战斗，夜间动作，袭击战斗，防空技术，长途行军，无后方作战等项，各军事学校大体同此办理。

以上各项限十天完毕，听候出动命令。

(此命令对红军公开宣布，惟对日寇及汉奸分子严守秘密，不得疏忽。)

军委主席团

[1] 指彭德怀、任弼时、林彪。

各地当局对全国抗战 应采取的方针问题^[1]

(1937年7月14日)

此时各方任务，一方面促成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方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

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广东、广西、四川各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张云逸电的主要内容。

致中共神府特委电

(1937年7月14日)

高桂滋、李仙洲部准备继续开赴抗日前线，望立即严令神府党政机关及地方部队，对他们所遗防地，我们不得有丝毫侵占和骚乱行为，应各守原防不得异动。

毛泽东

十四日

致叶剑英电

(1937年7月14日)

叶：

告蒋：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同时指出，红军特长于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可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

毛 朱

十四日

致红军各将领电^[1]

(1937年7月14日)

原命令一个月准备完毕，现改为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

毛泽东
十四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改变红军抗日待命的准备时间致红军各将领电的主要内容。

红军政治工作决定要重新起草^[1]

(1937年7月15日)

彭、任、杨、邓：

甲、红军政治工作决定依目前情况须加修改，为着重新直接对日抗战的政治工作，望迅即重新起草。

乙、组织决定^[2]一项可用。

丙、上二件原则由林彪^[3]同志带来云阳^[4]。

毛
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副主任邓小平的电报。根据这个电报精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1937年8月1日正式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在论述了红军进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基本特点以后，明确规定红军改编后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第二，保证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

[2] 指《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

[3]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长。

[4] 云阳，镇名，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北部。当时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

红军出动应做真实准备^[1]

(1937年7月15日)

彭、任、叶：

红军出发前必须补充之物，如刺刀、工具、高射炮、手榴弹、子弹等，由叶剑英向国民党方面交涉办理。红军出动应做真实准备，须迅速，以便在蒋介石、阎锡山同意后，不失时机地向平绥线出动。如情况紧急，补充不及，亦应准备开往太原、大同再行补充。

毛泽东

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给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

给阎锡山的信

(1937年7月15日)

阎副委员长百川先生勋鉴：

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是祷。谨致抗日战争之敬礼！

毛泽东手上

七月十五日

信函多已長而告急。兹附函於此
决迄我之方針及運動任務之方略。則
红军固起前線由內外我固起外用
少用以志者。遇乞平極切。茲
特示兄兄請詳改
抗日戰爭之敵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致阎锡山信的手稿。

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1]

(1937年7月16日)

彭、任，并告叶、刘、张：

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

甲、在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必要与许可时，得再派一部增加前线。如此编成，容易前后方兼顾。

乙、在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2]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3]运动。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张浩（林育英）的电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步实现后，中共中央为促成全国抗战，自1937年2月起即就红军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企图通过改编取消、削弱和控制红军，因而直到全国抗战爆发1个多月后，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时，国民党始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

[2] 红大，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3] 义勇军，即东北抗日义勇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的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组织的抗日武装，其中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主力红军编制如上。但此计划缺点在于尔后主力可能参战，则游击队已前去，后方留兵太少，故当须谨慎。或者只派数百人去作为创立义勇军之种子，主要依靠多派干部去为适宜。不论如何编制按甲项办理。

丙、陈先瑞^[1]全部、王兆相^[2]主力各编为团，准备出动作支队使用。

丁、以上计划请加考虑，并与到会各同志讨论一番，以你们意见电复。

毛 朱

七月十六日

[1] 陈先瑞，当时任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

[2] 王兆相，当时任陕北神府特区红军独立第二师师长。

给阎锡山的信

(1937年7月17日)

百川先生勋鉴：

彭雨峰同志回，备述盛德，并称政躬违和，不知近日已痊愈否？为国珍摄，在此国难关头更为必要。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雨峰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住止，祈先生予以方便。关于尊处无条件抗战方针，敝方完全拥护，已令党员与晋绥当局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尊处新的作法，祈随时告彭雨峰转知弟处。相互共同推进全国上下军民一致的真正的团结一体，抗此大敌。又敝方拟在太原印刷若干必要文件，此种文件不出联合抗日阵线共同纲领范围，亦祈给予方便。国际联结方面，先生有何意见，并祈示知。敝处与先生相见以诚，当前局势下，更须密切团结，谅先生必有同心也。敬致

抗日胜利之礼！

毛泽东手上
七月十七日

方川先生為贊引
劉雨峯先生回
備述 感經亞稱 史卿先生和不和
正月廿七日忽然有方圓折摺在此圖
欲求方子安則於此等折角作戰將以
周士用趨過地氣引兩旁連連大至
再求折子曰 地士用合著此危險而
狀勢又令力抗我則庶若古民而易撫
助之軍工作生焉而刻不容緩云云
諸方稱爭此工作中國人擬在太行
北山所 告乞平以方役周於
萬里之多信件抗我方針兩方定全
標張是乞是反与音信毛唇者
合作支掩危局 番李主制同作伏
兵隨時告別而奉辭知不至相如
則固非迎全圖上不事民一政的區區
固此一觀抗此大敵 又兩方相

化太常印刷若干函件。此種
文件如出解令，祇日降諭，其內綱領或
圖書解說，亦方設圖降解，給方而
其事有得失，必至解。特知，至
此一先，則免以誠，若前半格不至解。
密印圖解詳，其事又有因也。如
此

毛泽东致阎锡山信的手稿。

蒋介石如不让步不再与谈^[1]

(1937年7月20日)

周转林：

- (甲) 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
- (乙) 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 (丙) 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洛毛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转林伯渠的电报。

为力保平津、张家口致阎锡山电^[1]

(1937年7月20日)

百川^[2]先生：

尊电诵悉。老成谋国，至为钦佩。日寇大举已定，无可挽回。如令其占据北平、张家口，则晋绥之危至。拟凭全力督责冀察当局坚守平津、张家口等处。部队似宜以一部向张家口出动增援刘汝明^[3]，一面力促蒋氏^[4]增兵北援。诚如尊言，非抗战无以图存。而今日已至力争平津、张家口之紧急关头。一得之愚，尚祈考虑。周小舟、彭雨峰^[5]到，祈赐接见。

毛泽东

[1]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到山西太原，开展对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采取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态度，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太原建立了和延安直接通报的电台。这是毛泽东发给太原台抄转阎锡山的电报。

[2] 百川，即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一四三师师长。该师当时驻张家口一带。

[4] 蒋氏，指蒋介石。

[5] 周小舟，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受毛泽东派遣，到太原对阎锡山进行团结抗日的工作。彭雨峰，即彭雪枫，卢沟桥事变后，他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电示，多次与阎锡山会晤，进行有关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

(1937年7月23日)

一 两种方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卢沟桥事变^[2]的第二日，七月八日，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蒋介石迟迟至事变后10日才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对日抗战的方针。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和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就在这时，蒋介石政府仍然和日本继续谈判，甚至接受日本同中国地方当局议定所谓和平解决的办法。一直到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无法维持，才被迫实行抗战。但在这以后，直到1944年，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谋和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完全背叛了他在庐山谈话中所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论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声明，反对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人民战争，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更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正是说明了在抗日战争中一条共产党路线和另一条蒋介石路线之间的斗争。

[2] 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10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1]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就是方针问题。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该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

[1] 第二十九军原来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当时驻在平津、河北、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一带。宋哲元是这个军的军长，他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曾一度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冯治安是这个军的第三十七师师长，该师的一一〇旅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揭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该谈话的结语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就是方针问题。

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

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

但是还有采取第二种方针的可能。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坚决抗战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这是每个人都应十分注意的。

第二十九军的全体爱国将士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平津和华北的全体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蒋介石先生和全体爱国的国民党员们，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方针，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以事实回答

敌人的侮辱。

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二 两套办法

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一些什么办法呢？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 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动员我们的二百几十万常备军，包括陆海空军在内，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其主力立即出动开到国防线上去，其一部分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委托忠实行民族利益的将领为各方面的指挥员。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肃清军队中的汉奸分子。动员一定数量的后备军，给以训练，准备上前线。对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给以合理的补充。按照坚决抗战的总方针，必须作如上各项的军事计划。中国的军队是不少的，但不实行上述计划，则不能战胜敌人。以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相结合，我们的军力将无敌于东亚。

(二)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和《新闻检查条例》^[2]，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的覆辙^[3]，前车可鉴。如果坚决抗战出于真心，就不能忽略这一条。

（三）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抗日是一件大事，少数人断乎干不了。勉强干去，只有贻误。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国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国民大会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掌管国家的大政方针，决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计划。

（四）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

[1] 1931年1月31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用“危害民国”的罪名作为迫害和杀戮爱国人民和革命者的借口。按该法的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活动者处死刑；凡与革命活动发生联系的或以文字图书演说方式进行革命宣传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者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统治的日益法西斯化。

[2] 《新闻检查条例》，指国民党为压制人民言论自由于1933年1月19日制定的《新闻检查标准》，同年10月5日又作了补充规定。《新闻检查标准》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报刊上发表的任何文字，都要在刊出以前，将稿件送交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检查。检查官可以任意删改和扣留。

[3] 参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第8节。

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苛捐杂税的取消，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工人待遇的改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生活的改善，小职员的生活的改善，灾荒救济：从这些起码之点做起。这些新政将使人民的购买力提高，市场繁荣，金融活泼，决不会如一些人所说将使国家财政不得了。这些新政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

（六）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

（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穷是错误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说财政经济无办法，真是没有道理的话。

（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政府、军队、全国各党派、全国人民，在这个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上团结起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口号，不应该只是讲得好听，还应该做得好看。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办事要大方一点，手笔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Q主义，实际上毫无用

处。这些东西，用以对付敌人都不行，用以对付同胞，简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这一套为着实现坚决抗战的办法，可以名为八大纲领。

坚决抗战的方针，必须随之以这一套办法，否则抗战就不可能胜利，日本永在侵略中国，中国永无奈日本何，而且难免做阿比西尼亚。

对坚决抗战方针有诚意的人，一定要实行这一套办法。试验坚决抗战有诚意与否，看他肯采取并实行这一套办法与否。

另外还有一套办法，那就是样样和这一套相反。

不是军队总动员，而是军队不动员，或向后撤。

不是给人民以自由，而是给人民以压迫。

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性的政府，而是一个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

不是抗日的外交，而是媚日的外交。

不是改良人民生活，而是照旧压榨人民，使人民呻吟痛苦，无力抗日。

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

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照旧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

不是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而是拆毁这个长城，或是阳奉阴违、要做不做地讲一顿“团结”。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这个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教训。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

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

三 两个前途

前途怎样呢？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也没有疑义了。

四 结论

一定要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

一定要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 第二次宣言

(1937年7月23日)

万万火急！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武装部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据各方面消息已证实冀察当局宋哲元已接受日方所提出的下列三个条件，即：（一）冀察当局向日军道歉；（二）二十九军从平津卢沟桥永定河以东撤退；（三）镇压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这些条件已开始实行。此外有无秘密协定，尚不得而知。

全国同胞们！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同全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的要求完全相反，同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对于卢沟桥事件之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能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亦完全相反。我们的政府与人民万万不能接受这种投降屈辱的条约！我们坚决反对冀察当局宋哲元接受这类亡国灭种的条约！我们要求为保卫平津、保卫冀察的每寸土地而血战到底！

全国同胞们！形势是万分紧急了！日本大量海陆空军正向中国

开进。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不能有任何的让步与妥协了！正像蒋介石先生所说的：“今日的北平若果变为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亦何尝不可变成北平。”问题的中心就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放弃平津，放弃卢沟桥永定河以东的大块中国领土，则冀察必然不保，必然成为第二个东北四省，冀察不保，华北与全中国即将垂危，亡国灭种即将相继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冀察当局宋哲元对于日寇的让步与妥协！

全国同胞们！我们决不能对于宋哲元的投降屈辱的“已成事实”与中日间的所谓“地方解决”，表示默认与软化。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与要求，来贯彻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所宣布的抗日方针。在今天，仅仅是激烈的宣言，不承认的声明与抗议，已经不够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不怕这些的。在今天，希望九国公约签字国出来干涉，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横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不管这些的。今天，我们需要最实际的办法来保证全中国人民的希望与要求的实现，来保证蒋介石先生所宣布抗日方针的执行。这些办法应该是：

（一）立即命令冀察当局宋哲元等拒绝执行日本所提的三条件，率领全部二十九军实行武装抵抗，如宋哲元拒绝执行中央命令，则立刻明令撤消宋哲元现任职务，另派大员领导英勇的二十九军将士及华北各军实行抗战。

（二）立刻派遣大军增援二十九军，并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立刻召集国防会议，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攻。在日军四周

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以配合抗日主力军的作战。

(三) 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权利，满足人民生活上的迫切需要，实行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建立各种各样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四) 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武装缉私，抵制日货，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矿山工厂与财产，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的与经济的特权，封闭一切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与特务机关，逮捕一切日本侦探与汉奸，解除日寇与汉奸在中国内地的一切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团体。

(五) 立刻改革政治机构，使中央与地方政府民主化，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使国民会议真正成为代表民意的权力机关，使国民政府真正成为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肃清潜在政府内部的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这样使政府与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敌。

(六) 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方针。

(七) 立刻实施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文化教育等各种新政策，以巩固国防，改善民生。

(八) 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

全国同胞们！只要我们的政府与人民能够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我们就有力量战胜日寇，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一切失地。只有中

华民族的伟大的坚强的力量才能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新中国！

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现在是民族存亡紧急关头。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

反对一切对于日寇的让步妥协，坚决抗战到底！

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生路！

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保卫平津华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七月二十三日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7月24日)

(甲) 恩来已到沪，不日回陕。事情还没有弄妥，改编事待周回后再定。(乙) 华北事已妥协，仗暂时打不起来。党已发宣言反对妥协，红军暂时不发电为宜，待周回后再说。

[1] 这是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

(1937年7月25日)

红军各首长已集云阳（朱总亦去）讨论改编，现令他们等你们回来讨论决定。蒋对红军办法不能接受，只有拖之一招。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向蒋介石转达红军改编计划^[1]

(1937年7月28日)

周、博、林：

甲、请你们即去云阳^[2]商定改编。

乙、由云阳回西安后，以根据朱、彭、林、贺、萧、刘、张、徐^[3]诸将领意见告蒋鼎文^[4]以下之各点，请其转达蒋介石：

(一) 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

(二) 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5]），以便指挥作战。

(三) 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的电报。

[2] 云阳，镇名，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北部。当时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

[3]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长。贺，指贺龙，当时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萧，指萧劲光，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刘、张，指刘伯承、张浩（林育英），当时分别任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指徐向前，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4] 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

[5] 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拟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

(四) 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

(五) 担任绥远^[1]方面之一线。

(六) 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洛毛

二十八日辰

[1]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1937年的毛泽东。

红军将领庆贺平津胜利通电

(1937年7月29日)

南京林主席、蒋委员长、国民党、国民政府、北平宋委员长哲元、冯师长治安、张师长自忠、赵师长登禹、刘师长汝明、郑师长大章、孙军长连仲、庞军长炳勋、山西阎主任、赵主席、绥远傅主席、山东韩主席、河南刘主任、商主席、西安顾主任、蒋代主任、孙主席、兰州贺主席、宁夏马主席、全国各总副司令、各省市党部、各省政府、各军师团长及全体将士、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公鉴：

日寇进攻，已将中华民族压迫到无路可走之地步。平津一战，申历载未申之积愤，亦寒历载猖狂之敌胆。我前敌抗日将领及全体战士建此殊勋，声振中外，不但敝军同人所积极拥护，亦全国男女老幼所同声爱戴。溯自东北丧失，六年于兹。全国同胞，痛心疾首。此次日寇进攻，华北危急，幸赖国共两党诚意合作，蒋委员长十七日谈话之坚决抗战，宋明轩先生之深明大义，前敌将士之英勇杀敌，全国各界各军之同声援助，致有本月二十八日之大捷。从此军心大振，民意所趋，知日寇非不可抗，但患方针之不当，知国家非无实力，但患办法之失宜。从此方针确定，办法改良，全国一心，军民一体，进一步收复冀东察北及东北四省，决非难事。然日寇经此挫败，必将倾其全力对我作大规模之压迫，一面保守已得地

区，一面进攻华北各地。我全国军民上下，惟有在国共两党亲密合作之基础上，实行坚固的民族团结，发动大规模之抗战，达到保全国土恢复失地驱除日寇消灭汉奸之目的。敝军正在加紧改编，不日出动参加作战。尚望时予指教，民族革命幸甚。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彭德怀

贺 龙 林 彪 刘伯承 徐向前 叶剑英

张云逸 萧 克 徐海东

七月二十九日

实践论^[1]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1937年7月)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

[1]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

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

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1]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1]，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

[1] 里手，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

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1]。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2]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穿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

[1] 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2]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6月3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

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1]。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

[1] 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参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1]，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2]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

[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2]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

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1]。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

[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五节。原文是：“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读米丁^[1]等著沈志远^[2]译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一书的批注

（1937年7月以前）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

第五节 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

.....

现在要问，为什么只有实践能证明我人认识底现实性，为什么实践以外就没有认识底真理性底标度（Criterion或作标准——沈）呢？这是因为人底意识只是社会生活底一方面，它在实践以外就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

[1] 米丁，1901生，苏联哲学家。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2] 沈志远（1902—1965），浙江萧山人。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主要译作有：《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等。主要著作有：《新经济学大纲》《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近代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讲话》等。

底生产一经停止，人底意识活动也就立刻停止。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底基础是物质的生产，照马克思底说法，是人底感官实践的有目标的活动。

所以，只有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维中所预想的结果的时候，人们底认识才会发生力量。假如人底认识不照外界过程底实况来反映这些过程的话，那末人们在实践的活动中也就不能达到意识中所预想的这一活动底各种结果。而且没有实践的活动，甚至连人类社会底生存都不可能；假若人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是虚妄的时候，这种实践的活动就能改变这一虚妄的概念。因此，在社会人底实践中，在他底有目标的活动中，包含着我人关于外界的概念底真理性标度。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底发展过程中，发生和发展着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诸种概念。社会在实践上去影响自然，改变它底形式，同时它也就改变了自身和自己关于外界的概念。由于人们有目标的活动底结果，创造出了物质的事物，这些事物也是物质的现实界之不可分离的部分。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概念的发生和发展

实践高于认识。

照邬梁诺夫^[1]底说法，“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有一般性底价值而且还有直接

[1] 邬梁诺夫，现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

卷之三

樂府詩·物語與歷史唯物論

卷二

卷之三

不僅感覺底能力而且思考底能力二者都是高級有組織的物質底特性只是社會人底腦子具有這種特性。

人只在社會中發展他底感官底活動和思惟底活動。因此，人底感覺和思想不是永遠不變的東西。在社會生活之中，社會底感覺和思想，必須隨著社會本身底發展而發生變化。但社會又是自然底一部分，它改變着自然。同時也就改變着它自身人類實踐的活動。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底生產是人類多方面的生活（即國亦在內）底基礎。人類社會所得到的關於周圍世界的一切知識，它得到這一切知識是由於過去一切物質生產發展底歷史。由於在階級社會內推動這一發展的階級間的戰鬥。

卷之三

費爾巴赫在道德問題上也發揮了形而上的那點照應底見解人底本質是在於他底無能他底無能他底無能

觀察人，所以他始終沒有理解到實在的、行動的人，而永遠抽象地去了解人。因為廣爾巴赫拋棄了人底祖國性，他就不能了解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照費氏底意見，認識是不變的，永遠離不開的自然之同樣不變的東西。

觀察人，所以他始終沒有理解到實在的行動的人，而永遠抽象地去了解人。因為費爾巴赫拋棄了人底社會性，他就不能了解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照費氏底意見，認識是不變的，永遠離此的自然之間接不變的東西。

這裏更順便指出，要開人類底實驗活動，要開創底歷史運動，去觀察認識問題，這不僅是當時巴黎底唯物論底根本缺點，而且也是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論底根本缺點。

這裏要順便指出，去閱人類底實驗活動，至關重要歷史學風，去觀察認識問題，不僅是當時巴黎底唯物論底根據本缺點而且也是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論底根本缺點。

然而照唯物辯證法底見解，我們應當從認識對於社會物質生產底發展和推進這一發展的社會關係上去觀察認識。應當從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上去觀察認識。唯其如此，所以生活實踐底觀點應當看作認識論底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然而照唯物辨證法底見解，我們應當從認識對於社會物質生產底關係和推動這一發展的社會關係的發
展關係上去觀察認識。簡言之，應當從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上去觀察認識。唯其如此，所以生活實踐底
觀點應當看作認識論底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的现实性底意义。”^⑩ (见邬氏文集卷九，页二六一。) 人类关于外界和外界中所发生的过程之理论的认识，揭露了历史发展底规律性和倾向；但是只有社会的实践予理论以彻底的证实，从实物之历史的具体性上去把握实物。……我们不要忘记，人类底有目标的物质生产的活动，是最基本的、决定其他一切的一种实践活动。但社会的实践却不以这一种活动形式为限，它是多方面的。社会的人参加着阶级的战斗，过着政治的生活，从事科学上的创造——简言之，参加着社会底实际生活底一切领域。因此，我人认识底真理性底标度是全部社会实践底总和。[第 179~180 页]

然而人底认识也是社会生活底诸方面之一、诸原素之一，只要它是正确的话，他对于人底实践的活动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正确的认识指示着人们实践活动底道路。假若理论是真实的理论，它就予实践家以决定行动方针的力量，指示他们以明确的前途，使他们对于自己事业具有必胜底自信力。可是为要使理论认识正确，它必须依靠实践，必须跟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

社会的人底实践本身也不是不变动的，它底每一发展步骤，都要求更新的思考，研究。因此，譬如在苏联目前的条件之下，假使一种科学

不止一种实
践活动的形式

正确的理论
积极的〈地〉
指导着实践。

实践是发展
的，理论也应是
发展的。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30 页)

的理论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底实践底要求时，这种理论就没有积极的作用而必然变成劳工阶级底敌人底理论武器。

认识物质的现实的，不是与社会相隔绝的个人，而是跟社会相联系并且依靠社会的社会人。

人的社会性

人底本质是具有社会性的。每一个别的人底生活，完全为社会生活所决定，为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集团间的争斗所决定；每一个人底生活总跟某一社会阶级底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个别人是社会的实体，所以他底生活底任何表现，从实践活动起到理论活动止，归根结蒂都是社会生活之特殊的表现。

不仅感觉底能力而且思考底能力，二者都是高级有组织的物质底特性。只是社会人底脑子具有这种特性。人只在社会中发展他底感官底活动和思维底活动。因此，人底感觉和思想不是永远不变的东西。为社会生活之产物的感觉和思想，必须随着社会本身底发展而发生变化，但社会又是自然底一部分，它改变着自然，同时也改变着它自身。人类实践的活动，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底生产，是人类多方面的生活（认识亦在内）底基础。人类社会所得到的关于周围世界的一切知识；它得到这一切知识是由于过去一切物质生产发展底历史，由于在阶级社会内推动这一发展的阶级间的战斗。

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社会生活变化，感觉和思想也变化。

物质的生产是人类多方面生活的基础。

一切知识是生产斗争与阶级

斗争的结果。

马克斯〈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实践之观点是认识论第一的观点。

认识的真任务在思维。

费尔巴赫在认识问题上也发挥了形而上的观点。照他底见解，人底本质是在于他底躯体、他底机体、他底感觉和思想的能力，费尔巴赫不了解，具有感官和思维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底产物。他丢了人和社会底关系去观察人，所以他始终没有理解到实在的、行动的人，而永远抽象地去了解人。因为费尔巴赫抛弃了人底社会性，他就不能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照费氏底意见，认识是不变的，永远如此的自然之同样不变的反映。

然而照唯物辩证法底见解，我们应当从认识对于社会物质生产底发展和推动这一发展的社会斗争的依赖关系上去观察认识。简言之，应当从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上去观察认识。唯其如此，所以生活，实践底观点应当看作认识论底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人对于物质现实的认识，开始于感官的知觉，这种知觉是外界事物加于吾人感觉机官的作用所引起的。然而感觉上的认识，只给我人以最接近的感觉环境和外表的有限联系之偶然的、经验的知识。它还不能使我们从客观世界底各方面关系上，从它底内部联系上和完整性上去认识它。可是认识底真实任务却在于理解现实底规律。这一理解，是根据我们和现实的相互作用过

感觉与思维
的统一

程中所得到的那些感觉底一般化（Generalization）而达到的。直觉的材料在我人意识中经过改造和一般化的结果，就产生出概念来。这已经是逻辑认识底因素了。自然，认识底感觉方面和逻辑方面不是互相分裂的，它们常常一块儿表现出来。而且，思维发生于概念，在思维跟概念的关系以外，思维就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我们知识底内容是客观的世界。我们底感觉使我们直接跟这一客观世界联系起来。所以只是在感觉概念底基础上，逻辑的认识（即思维）才有可能。

感觉与思维
不能等同。

感觉与思维
的区别与统一

二者不等
同，思维又倚赖
感觉。

然而我们却也不能把认识底感觉原素和理解原素等同起来。感觉的认识不会超过个别的事物和这些事物间的外表联系之反映的，可是经过思维而产生的认识却把握着事物之内部的联系，在它们客观的一致性上反映着它们。

“概念不能抓住整个的运动，譬如说，它不能抓住每秒钟速度三十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却能抓住，且应当抓住。”（《邬氏文集》卷九，页二八九。）在邬氏对黑格尔底逻辑学所写的札记本中，他指明了认识中思维对感觉的依赖关系，他很深切地注意到直觉和思维底区别。

他说：“思维由具体提升到抽象，它不离开真理——假使它是正确的话——而是趋向真理。物质底抽象观，自然底法则，价值底抽象观等等——一言以蔽之，一切科学的抽象观念，都更深

刻、更确实、更完满地反映着自然。从活的直觉到抽象的思维，再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便”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底辩证法的途径。”^[1] (前书)这样看来，感觉和理解二种元素，是我人思维中反映客观实在的统一的认识过程底二种不同元素。这就是认识过程底经验原素和理性原素间的相互关系之辩证法的理解。

经验原素与 理性原素之相互 关系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视实践对于理论认识之决定的意义，可是它跟实用主义 (Pragmatism) ——特别盛行于美国的现代布尔乔亚哲学底唯心论思潮——完全相反。詹姆士所首创的实用主义，以主观唯心论的真理观为根据。照实用主义底见解来说，真理并不是反映客观现实之真实状况的东西，而是对于我们底实际活动有益的、适合目的的东西。裨益于实践的，就是真理的。有益性 (或有用性 [Usefulness]) 是真理性底标度。根据这一点，实用主义就得出来一个真理多数性底相对主义的学说。几种不同的见解可以同样地成为真理，只要它们是适合某一时代、某一民族、某一社会集团、某一个人底利益的。根据这种理论，真理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而且它可以随各种主观利益底殊异而同时存在着

有用性是真
理性的标准——
实利主义

多数真理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页)

许许多多个真理。这样，真理就不是单一的
单一真理了。……

有用非即真
理，真理必是
有用。

反对庸俗的
实际主义

辩证唯物论
的社会观

马克思主义底立场跟实用主义极端相反。马克思
主义的哲学，以客观真理为出发点，它驳斥了相对论，它认为有益的并非即是真理的，而真理的即是
有益的。在物质的革命批判的实践中，产生和锻炼出世界之客观的认识来，而这种认识又促进世界之继续的改变。

脱离了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没有意义。同时，轻视理论、庸俗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这些却也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容的。在实践底过程中生长出来的革命的理论，本身又是实践底引路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见邬著《做什么》）^[1]只有在马克思、邬梁诺夫底理论指导之下的革命的实践，才具有自信性、远大性、精确性和深刻性以及运用策略上的敏捷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达到的最大的胜利，就是他们把唯物论的认识运用到人类社会上去。在马氏以前，即使那些比较最彻底的唯物论者，也不曾把唯物论运用到社会发展过程底认识上去，他们始终只是哲学上的和自然科学上的唯物论者。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为旧唯物论底阶

[1] 参见列宁《怎么办》（旧译《做什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级本质所决定的。开拓社会生活底真理，揭露它底深刻的矛盾和推动的力量，这不是剥削阶级底思想家——那怕他们底革命性如何浓厚——所能担负得起的任务。这一任务——把人类社会底历史变为科学、变为唯物论的认识对象的任务，只有劳工阶级哲学底创导者才能把它实现出来。

[第 181 ~ 185 页]

反宗教

唯物的历史观把反宗教的斗争提到极高的地步。跟宗教取任何形式和任何程度的妥协，直接或间接的跟宗教敷衍或对它取容忍的态度，这都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容的。……[第 187 页]

从被动的直觉的世界观到能动的辩证法的世界观

上述各点，就是现代唯物哲学之基本的指导的原则。这种唯物哲学跟被动的直觉的世界观截然不同。马克思在他论费尔巴赫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但是事情却在于改变世界。”¹¹这是马氏对他以前的哲学所发的言论。辩证法唯物论既为革命的劳工集团底哲学，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哲学，所以它是行动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哲学不是幽静的修道院而是一个战斗的阵营，推进社会发展的社会争斗底阵营之一。现实底认识不产生于好奇心的追求而是为着改造现实。要改造现实就需要认识现实底规律性。由真实的理论所指导的

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

[1]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9 页)

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

斯达〈大〉林的名言

认识史没有结束。

实践是最完善的实践，而最完善的理论、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是最有实际效果的理论。

马、邬主义同样地不容那种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脱离社会争斗之实践的直觉的理论。在马、邬主义中，理论和实践极紧密地融合着发展起来，它们相互地巩固着。然而在这个一致中，首要的作用却属于实践；理论与实践底一致是在革命的实践底基础之上实现出来的。“假若理论不跟革命的实践相联系，它就变成无目的空谈，同样的，假若实践不按照革命理论所指示的道路走去，它就成为盲目的行动了。”^①（约塞夫著《邬梁诺夫主义问题》页十六至十七。）

只有那密切地跟劳工集团之斗争的实践在一块儿走的理论，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资本主义诸国中，加强工人集团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劳工专政之意志，用敌人底知识来武装劳工集团并指示出胜利底道路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底学说并不是死的教条。它并未结束认识底历史，相反的，它替认识底历史开辟了远大的前途。……[第 187~188 页]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

第一节 对立体一致底法则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写道：“……辩证法底法则更是从自然和人类社会底历史中抽取出来的。但是它们并非别的，却是这两个历史发展底领域底最普遍的法则。就实质论，它们可以归纳为下列三大法则：

恩格斯指出

三大法则

量变质和反过来质变量底法则

对立体相互贯通底法则

否定之否定底法则”^[1]

黑格尔

恩格斯又继续指出，所有这一切法则都已被黑格尔所发挥，不过是按照唯心论的方式发挥出来的；这就是说，黑格尔不曾从自然和历史中抽出这些法则来，而把这些法则套到自然和历史上面去，认为自然和历史必须受这些必然法则底支配。于是黑格尔底体系大有令人莫解的意味了。

所谓辩证法
与认识论一致

可是我们只要唯物地去观察这些法则，一切事物就都变成简单而明白了。上面所指出的辩证法底三大基本法则，是客观世界底实在的发展法则，同时也是认识世界底法则，要是认识底法则

是这一客观世界本身在我人意识中的反映的话。

现在我们来研究唯物辩证法底基本法则——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页)

形而上学的
发展观

天不变道亦
不变^[1]

两点实是一点

对立体一致底法则吧。

在人类底思想史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发展观。根据其中的一种，认为发展就是增和减，是数量的增长和向来如此的同一事物底重复。照这种观念来说，一切形而上学事物，（不论它们最初如何发生）及这些事物在人类头脑中的思想上的反映，都变成永形式论理学远如此的东西了。事物一经发生之后，在其本性上是不变的，它永远绕着同一个不变的圈子，循着同一条运动底道路。任何事物底发展，植物、动物、人底发展，实际上只是各方面和各种特性底发长和增加，而这些特性是事物或人原本就有的，不过原先取“微小”的萌芽状态罢了。在这种观念中，完全没有关于事物发展之实在的历史性底认识；这就是所谓形而上的发展观。……

根据这样的发展观，第一点无从解释的，是我人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种类不同底原因，新的发生和旧的被代替底原因。第二点——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运动和发展底渊源，也无从解释了。形而上的观念，不知道内在的原因给发展以刺激和推动，于是它不得不从事物底外部去探求这一发展底渊源（即动底原因），有时用物质的、形而上的“实质”和“力量”来说明运动

[1] 参见《汉书·董仲舒传》。原文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底原因；有时则用超世界的精神来说明它！

邬梁诺夫指出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对于发展底原则是谁都“赞同”的，不过这种外表的、浮面的“赞同”却歪曲和模糊了对于发展的真正的理解。邬氏说：“假使一切都在发展着的，那末就是说一切都从一个转变到另一个，因为发展不是简单的、一般的和永久的发展和增加（或同样地减少）等等……应当确实一些去了解进化，它是一切底发生和消灭，是相互的转变。”^[1]（见《邬氏文集》卷十二，页一八五。）庸俗的进化论不了解发展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不明白那反映存在发展的吾人思维底发展道路，不懂得认识底辩证法之客观的意义和作用，不会把发展底原则跟世界一致底唯物论的原则联系起来。

布尔乔亚的庸俗的发展观，不了解任何事物（和现象）底发展，是事物自己的、为它内部的特质所决定的由此达彼的转变；这种发展观又不懂得发展是事物自身的运动，照黑格尔底说法，是事物底自动。布尔乔亚进化论者认为植物、动物、人类和人类社会底发展，只是取增加形式的重复，是单纯的增长，是此种植物、有机体和社会一开始就有的一些永久不变的特质底扩大和增

列宁驳进化论

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

[1]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0页）

长，不过在最初的时候，这些特质隐藏着不显著地表现出来，它们处于萌芽状态中。照这些理论家底意见，它们底这种增长，是在外界环境条件影响之下，由于“力底传递”，由于植物、动物和人类从外界得到营养而发生的。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底发展是某些永久不变的特征——布尔乔亚社会所具备的诸特征，资本主义的剥削、竞争、个人主义等等——之重复和增长，这些特征，他们以为在古代的奴隶制社会中、甚至在原始的野蛮社会中也可以找得出来的。因此，关于社会发展底原因、渊源、动力，布尔乔亚的思想家或者完全不加思索、或者用人类智慧底进步来解释（他们说人类由于很多次的重复底结果，就日益认识一切人类共同生活底永久的和自然的特征），或者用各个社会底外部的地理的和气候的生活条件，用社会和外界环境底“均衡”底条件来解释社会发展底原因。

辩证法跟这种进化观相反，它主张“从事物自身中”、从它对别种事物的关系中去研究事物，它把事物底发展看作它底自动的发展，就是说，看作事物之内部必然的、独立的、自身的运动，即事物底自动。

辩证法的进
化观

关于黑格尔论自动的发展底学说，邬梁诺夫写道：“运动和‘自动’，这是（注意！）随己的（独立的）、自发的、内部必然的运动；‘变化’、

马克斯〈思〉

与黑格尔

‘运动和活力’、‘一切自动底原则’、对于‘运动’和‘行动’的‘推动’——谁相信这些都是‘黑格尔的倾向’，是抽象的和拙笨的黑格尔倾向？这种本质，正应当揭露出来，了解它、挽救它、澄清它；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做了这些工作。”^[1]（见《邬氏文集》卷九，页一二七至二九。）在黑格尔底唯心的自动学说中，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合理的核心，清除了它底关于纯逻辑发展的神秘观念；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客观世界底发展来理解了。

外因只能引起机械运动。

单纯增长也是辩证发展。

举例

单纯的外部原因，就其本身论，只能引起某一事物底机械的变动，它底范围和度量等等底增或减。但是即使植物或动物有机体底单纯的增长，也不只是数量上的增加，它同时必然发生此有机体之质的变化，从它底一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

在很多世纪中，欧洲差不多处在同一地理和气候条件底影响之下，可是很显然的，欧洲社会底发展并不能用这些条件来说明。固然在许多非洲和亚洲的种族中，同样的地理条件促成了社会关系底单一性和同一劳动方式底重复，然而欧洲底情形却完全不同，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环境底条件之下，各个国家底历史的发展上的差异性和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7页）

外因通过内
因并被曲折才能
发展。

不废除外
因，但内因是主
导的。不明内
因，即无从了解
发展。

自动不带神
秘性与唯心意
义，从客体的
自动上去研究
客体。

不平衡性却非常之大。很明显的，外部条件底作
用，经过一定的社会形态之内部的特性而被曲折了。只有明白了发展之内部自身的动力，揭露了使生命本身发展的自内推动，我们才能理解发展之真正的实质——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诸现象之自动。

那末究竟什么是自动呢？在事物自动底观念中，有没有譬如像布哈林所设想那样的某种神秘思想和黑格尔唯心论底意味呢？绝对没有的，只要我们不是纯机械地去观察运动和发展，即不把运动看作单纯的转移位置或数量的增加，同时又只要我们不是唯心地去了解自动，即不把它当作纯粹逻辑的发展看，不把它当作概念底自行生产看，而把自动当作客观世界底自动来了解就得。自动，就是事物自己的运动，它是由内部的、同时又由外部的条件所引起的，但是这种运动底发生，系依据内部的、事物本身的法则；自动也就是由于内部的冲动而产生的事物底转变，由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转变。从自动上去研究任何客体，能令人避免相信高超的外力（上帝、世界精神之类）或相信高超的内部的精神本质的那种唯心论观念。同时，这样的研究（即从客体底自动

任何现象自身的矛盾性引起事物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基本要素。

形式论理所谓错误正是正确，而所谓正确正是错误。

思想正带矛盾性，二者同时肯定正是对的。

辩证论理^[1]与形式论理的区别

上去研究客体)并不排除这一发展底内部原因以外的外部条件底作用。把发展看作事物自动的这种见解，迫使我们注意于事物自身之内部的、真实的发展渊源底认识。这一渊源，这一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于一切存在底内部的矛盾性，在于内部矛盾底运动和发展。事物自身中的矛盾性，任何自然和社会现象中的内部矛盾力量和倾向，就是唯物辩证法底发展观所根据的基本要素。

照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底观点，矛盾只在我人思维中有发生的可能，在客观现实中是不会有矛盾的。然而这种逻辑上的矛盾，照形式逻辑底见解说来，正是我们应当设法避免的毛病。根据形式逻辑底观念，矛盾是表示思想底错误，表示思维进程底不正确，它阻碍着思想底正确发展。假如说资产者认为“劳工阶级专政跟民主主义相冲突”，那末在他看来二者同时肯定就成为逻辑的矛盾了；若说“劳工阶级专政是民主主义底最高形式”，在他看来是荒谬之谈了。在辩证逻辑看来，思维底矛盾，乃实在的客观存在底矛盾底反映：辩证逻辑不拘泥于两条原则底外表上似乎互相冲突的情形。唯物的辩证法透视于研究对象之内部的本质，它在对象自身中找出矛盾力量、矛盾倾向、矛盾方面、矛盾定性之内部的联系

[1] 辩证论理，旧的译法。现译辩证逻辑。

列宁的辩证法定义，谓是论矛盾的。

来。在客观现实自身中，马克思主义发见了它所特具的和推动它发展的矛盾。旧的布尔乔亚民主底否定和新的普洛列塔利亚民主（取劳工专政形式）底建立是实在的、两方面的矛盾过程。邬梁诺夫说，“就本意上讲，辩证法是研究客体本质中的矛盾”。^[1]

很对。在静止中看事物不在运动中看，在割断中看不在联系中看。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承认事物底矛盾性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在事物和现象底联系以外、在它们不间断的相互作用以外^[2]去观察事物和现象的。

“但是——恩格斯指示着说——当我们开始在事物底运动上、在它们底变化上、它们底生活上、它们底相互影响上去观察事物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时我们马上会碰到矛盾，运动自身就是矛盾。……”^[3]

运动就是矛盾——恩格斯

……许许多多马克思主义底“批评家”，屡次地想推翻上面所述的恩格斯底“运动即矛盾”底原则。他们所凭借的“理由”，是说在现实界中，运动着的事物在不同的刹那间经过了各个不

[1]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2]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勘误。

[3]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引文中“恩格斯指示着说”一语系原书作者米丁所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中断的一致。托洛斯基只肯定不间断而否定间断，斯特鲁威等肯定间断而否定不间断，都是错误的。动与静的一致，续与断的一致，今与明的一致，上与下、生与死、民主与独裁的一致，矛盾就是运动。

列宁的话

相同的空间之点。这些“批评家”（如斯特鲁威^[1]、戚尔诺夫^[2]之流）说，假使把事物所不断经过的空间线划分成为许许多多极小的段点、空间底“间断”，那末在每一刹那间事物处于空间底某一地位、某一空间之点，跟上面所划分的某一空间段落相符合的一点。

……这班“批评家”不了解，所谓运动就是处于一点同时又不处于一点；没有这一矛盾，没有这个连续和中断底一致，运动本身就不可能，他们不懂，否定矛盾，就是抹煞运动。邬氏说：“运动是连续（指时间和空间）和中断（亦指时间和空间）底一致。运动就是矛盾，是矛盾底一致。”^[3]（见《邬氏文集》卷十二，页一九三。）

[1] 斯特鲁威（1870—1944），现译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2] 戚尔诺夫（1873—1952），现译切尔诺夫。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和理论家之一。

[3]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3页）

但矛盾不只是最简单和最普通的运动形式之基础。在各种事物和各个过程之特殊的运动和发展形式中，表现着各种辩证的矛盾。

各个过程中矛盾有特性。

恩格斯曾经指出，生底过程跟它相反的死底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细胞不断的死亡更新（这就是矛盾呀！）是一切有机体底生活和发展底必要条件。在机械学中，任何一种动作都带着内部的矛盾性，它引起了反动作，而没有这种反动，动作就无从解释起。数学中任何一个数量，也带有内部矛盾性的，它可能成为正的和负的数量。现在社会底社会生活中的任何现象，都贯穿着阶级底矛盾和冲突：不论是劳动力底卖买也好，或是高超的哲理学说也好，都无不具有这种阶级的矛盾。[第 194~201 页]

各种不同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矛盾。

互相排斥又互相贯通，互相敌对又互为存在条件。

那末事物（和现象）之内部的矛盾性究竟何在呢？是在一个统一的事物（过程、现象等等）中所存在的对立性，同时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贯通。诸对立方在发展中互相内部地联系着，其中一方为他方存在之条件，但同时一方与他方又互相敌对着斗争着。

这种将统一体分解为二，在任何自然、历史和精神生活底现象中看出内部的矛盾性来的见解，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图（Heraclitus）^[1]

[1] 赫拉克利图（约前 540—前 470），现译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運動就是矛盾，而凡在連續和中斷的一致。在矛盾底二點之間，不斷地有著一個斷裂點，——這就是運動底矛盾。運動與靜的一致，總與它的二致，——上與下，生與死，圓與方，——不圓斷卻說是錯誤的。

他們所憑藉的「理由」是說在現實界中，運動着的事物在不同的剎那間經過了各個不同的空間之點。這些動。他們所憑藉的「理由」是說在現實界中，運動着的事物在不同的剎那間經過了各個不同的空間之點。這些動。

「批評家」（如斯特魯威[Struve]，威爾諾夫[Chernov]之流）說，假使把事物所不斷經過的空间線劃分，成爲許多極小的段落，空閒底「間斷」，那末在每一剎那間事物處於空間底某一地位，某一空間之點，跟上面所劃分的某一段落相符合的一點。

郭榮諾夫指出了這一「批評」底全盤的荒謬性，因爲這一解說事實上把不斷的運動看成這一運動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許多段落，着成許多靜止底狀態，不動的狀態。事實上，事物之處於每一個新的地位，只是因事物從空間底某一點走到另一點的一種運動底結果。這班「批評家」不了解所謂運動就是處於一點同時又不成於一點，沒有這一矛盾，沒有這個連續和中斷底一致，運動本身就不可能。他們不懂，否定矛盾就是抹煞運動。郭氏說，「運動是連續（指時間和空間）和中斷（亦指時間和空間）底一致。運動就是矛盾，是矛盾底一致」（見《郭氏文集卷十二、頁一九三。）

但矛盾不祇是最簡單和最普通的運動形式之基礎，在各種事物和各個過程之特殊的運動和發展形式中，表現着各種辯證的矛盾。

我們不難把任何領域中——自然、社會和思想中——推動各種現象發展的一些矛盾指示出來。

恩格斯曾經指出，生底過程跟它相反的死底過程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細胞不斷的死亡更新（這就是矛盾

将一体分裂为二的见解，是辩证法的基本特质。

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由于有不同的性质，由于有不同的矛盾。

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

某种现象领域中的不同的矛盾统一的认识，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时起已为思想家所注意；邬梁诺夫指出这一见解是辩证法底实质，是它底基本的特质。马克思、恩格斯、邬梁诺夫底唯物辩证法，视对立底一致为辩证的发展底基本法则。这一法则底特殊表现就是存在于一切运动形式中的诸矛盾。

事物种类底差异是由于各种运动形式底特殊性，在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中，每一种都表示一事物之特殊的质地。在自然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运动底形式，例如：机械运动、发光、发热、电流、化合和分解等等。所有这一切运动形式都互相依赖着，互相贯通着。人底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底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自然中就什么也没有。对于每一运动形式，我们应当注意它底特殊性。注意它跟别种运动形式不同的质的区别。唯物辩证法指明，任何运动形式都内在地具有本身特殊的矛盾，具有自身特有的对立底一致和斗争。关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种对立底一致底认识，构成某一门科学底对象。譬如说，数学所研究的基本对立是正量与负量底对立，分数与整数底对立；机械学中的基本对立是作用与反作用底对立；物理学中有阴极与阳极底对立；化学中有分子底化合与分解底对立；在人类社会和社会科学中有阶级底斗争。

辩证的发展观，了解发展为“统一体底分裂为互相排斥的二对立方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

对新旧等同与新旧特殊，进化论与辩证法的区别。

好

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

是客观世界和认识之普遍的法则，一切过程

(见《邬氏文集》卷十二)。这种对立底“相互关系”也就是运动之内部的原动力。根据这一种发展观，主要的注意重心应放在自动来源底认识上。这一发展观底特点就是承认由于内部的对立底斗争而发生新陈代谢底过程。一切布尔乔亚的进化论，固然也不否认产生新事物底可能，可是它把注意底重心放在新旧事物(或过程现象)所共同的一般性上，而把新事物看成旧事物底增加和重复了。辩证法的发展学说就不然，它所重视的是新事物底特点特质。一切原则上跟辩证的发展论相反的布尔乔亚进化论底缺点，就在于它归根结蒂把新的看作旧的，把前者和后者等同起来了。然而实际上产生出来代替旧的那个新的，其所以称为新的，就是由于它底质的特点。照辩证的发展观来说，发展必然促成事物底转变、由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

照邬梁诺夫所下的定义，对立底一致这一法则，就是“承认(发见)一切自然(精神和社会也在内)现象和过程中的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对立倾向”。^④(前书)

对立底一致律是客观世界和认识之最普遍的法则。邬氏说，“从世界一切过程底‘自动’上、从它们底自发的发展上、从它们活的生活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1~712页)

都不能外。

最〈这〉一
法则之普遍的决
定的意义

恩格斯、列
宁与普列哈诺夫
的区别

上，去认识这一切过程，这样的认识底条件就是把它们当作对立底一致来认识”^{〔3〕}。（前书）

这样看来，对立底一致律是辩证法底基本法则。对立底一致律，既是最普遍的法则，它就适用于客观世界底一切现象，亦适用于认识底过程。邬氏在其论辩证法问题一篇短文中所指出的普列汉诺夫底错误，就在普氏不了解这一法则——认识底法则和客观世界底法则——之普遍的决定的意义，他把这一法则解释成“许多例子底总和了”^{〔2〕}。

恩格斯在《反杜林》^{〔3〕}一书中，为通俗化的说明计，举了许多关于这一法则的例子，同时他把对立底相互贯通看作最普遍的发展法则（这一观点在恩氏底《自然底辩证法》^{〔4〕}一书中发挥得最为完满），而普列汉诺夫却把这一普遍的法则简化为它底特殊的场合和表现了。普列汉诺夫只注意于量变质底法则，只注意于内容和形式底矛盾。普列汉诺夫虽然常常斥邬梁诺夫不懂辩证法，可是他自己在许多著作中却不知道把握这一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1～712页）

[2]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7页）

[3] 在其他处又译《反杜林格论》。现译名为：《反杜林论》。

[4] 现译名为：《自然辩证法》。

普是折衷主义。

辩证法底核心、辩证法底实质，甚至不能了解黑格尔逻辑学底理论意义，虽然在逻辑学中这一法则是在唯心论基础上发挥着的。普列汉诺夫常常表露对这一法则的折衷主义的了解，他把对立体底一致了解为“对立体底结合”了。

辩证法敌视折衷主义，给事物〈事物〉本质以确切肯定的答案，所以『所以』能成为行动的指导。这本质就是矛盾统一律。

一特性转到另一特性——与自己相反的，这是最重要的。

平常概念有差异、矛盾，但无转变。

辩证法是根本敌视一切折衷主义的。假使马克思、邬梁诺夫底主义不能给一个说明事物或过程（不论这种事物或过程如何复杂）之本质的确切而肯定的答案，那末它就不成其为行动底领导。所以在唯物辩证法中，正确地了解对立底相互关系，是极端重要的。对立底一致同时就是对立底相互贯通、它们底统一和它们底相互排斥、相互否定、斗争。

邬梁诺夫解说“事物（现象等）为对立底总和和一致”^[1]；在决定这一个定义时，他写道：“不只是对立底一致，而且还有每一定义、每一质地、特征、方面、特质之转变到另一个（它自己的对立一方）。”^[2]在另一地方他又写道：“平常的概念中包括着差异和矛盾，但不包括由此到彼的转变，可是这却是最重要的。”^[3]因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8页）

[2]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9页）

[3]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9页）

此，“辩证法这种学说是讨论对立如何能一致，在何种条件下它们成为一致、由此转变到彼，为什么人底理知不应把这些对立看成死的、固定的，而要把它们看成活的、有条件的、运动的和由此转变到彼的”（见《邬氏文集》卷九）。

相互依赖相
互排斥相互转变

在一定条件
之下

统一是相对
的，斗争是绝
对的。

？

生死

生产和消费

对立底统一（即一致），它们底互相贯通，
即^[1]

它们底互相转渡——这便是理解辩证法底实质的最重要之点。同时，应当着重地，指出这一对立底统一底有条件性；对立底统一，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应当着重地指出，对立底一致是相对的，它们底斗争却是绝对的。前面说到过，生底过程和死底过程在某种关系上是互相继续着的：有机体底旧细胞底死亡是新细胞产生之必要条件，是生活过程底必要条件。这里，二对立方——生和死——互相统一着，又互相转渡着。但是这一对立底统一之有条件性却甚明显：生终究是生，而不是死；在这个过程中，生底原素战胜了死底成分、并且统治着死底成分。

马克思指示道，生产和消费二者不仅互相对立而且在许多关系上又互相贯通的。有了生产，消费才有可能；生产创造了消费底资料，予消费以一定的性质。消费则完成生产品底生产过程，

[1]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勘误。

引起对生产的需要，因此它是生产底组成原素。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马克思说，它们底直接的一致并不消减它们底直接的分裂性。

资产者和无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互相敌对的两个对立体。可是这两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却不可分离地互相联系着，而且一个阶级底存在是另一阶级存在底条件。没有劳工阶级，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同样的，没有资产阶级，也不会有资本主义。失去了生产手段的劳工阶级，替购买他底劳动力的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和占有生产手段的资产阶级底剥削劳动力——这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的统一过程。同时，这个统一（一致）“相互贯通”底有条件性也是很明显的：在这两个阶级底利益中，是任何一致都谈不到的；并非阶级利益底一致，而是相反，阶级间的争斗，才是社会发展底动力。劳工国家底强固，造成了它将来衰亡底条件。然而如果忘记这两个阶段底对立性而简单地把这两个过程等同起来，以为劳工国家底强固同时就是它底衰亡过程，——如果这样设想，那便犯了极大的错误。

现今的机械论和孟塞维化^[1]的唯心论根本歪

[1] 孟塞维化，指孟什维克式的。

矛盾不同于
对抗或冲突。

阶级消灭后
的矛盾

冲突是个别
的特殊的场合。

图式论：
差异、对立、
矛盾。

每一差异中
包含矛盾。

限制矛盾之
普遍性

曲了马克思、邬梁诺夫底对立体底一致和互相贯通底概念。机械论者，从杜林起到布哈林为止，把一切处于一致中的对立都看作外部地互相对抗的两种力量。机械论者把一切对立底一致、一切矛盾，都看成外部的矛盾、看成敌对力量底冲突了；同时这些对抗力量底并存和矛盾底保持，他们把它解说为对立体底均衡，恩格斯曾讥笑杜林将矛盾了解为对抗的力量的那种见解。邬梁诺夫阅布哈林著的《过渡时期之经济》一书时，向布氏指出，把矛盾和冲突等同起来是不对的，譬如在社会主义之下，阶级的冲突业将消灭，而自然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仍将存在。

冲突是矛盾之个别的特殊的场合，即当诸对立体在其发展过程中，达到了采取外部的物体力量底形式而互相冲突时。……[第 201~206 页]

……孟塞维化的唯心论者，脱离了邬梁诺夫关于对立底一致律底理解，他们描绘着一个完全机械的表式，依据这个表式，我们首先遇到简单的差异，然后发现对立，再后才见到矛盾。他们不了解，在每一差异中已经包藏着矛盾；他们像普列汉诺夫一样地限制矛盾发展法则之普遍的性质。……[第 207 页]

相互依赖是
对立斗争的表
现，相对中存在
绝对。

新事物发生
即原有矛盾的解
决，原有对立及
其统一同时消
除，新矛盾开始
发展。

两种研究
法：具体研究与
抽象研究。

共同点与
特殊点都是要
紧的，而特点
尤要。

在相对中存在着绝对——这是邬梁诺夫指示
我们的一句话。在对立底相互贯通中，我们也应
当看出它们底斗争：对立底统一本身、相互贯通
本身，我们应当把它看作对立底斗争底表现。

新事物底发生就是原有矛盾底解决，在这一
解决中，旧的一致和组成此一致的诸对立体也同
时被消除了。新的现象代替着旧的而开始它自己
的历史，从这时起，这个新现象（或事物、过
程）自身内部包含着新的矛盾，推动它继续向前
发展的新的矛盾。

任何领域之科学的研究任务，在于依据这一
唯物辩证法底总法则（这是全部人类知识发展史
底总结论），根据事实的材料、去研究某一自然
现象、或社会现象、所特具的矛盾发展底具体
性。唯物辩证法底原则，是没有一条可以变为抽
象的表式（或图表）的，以为可以根据这样的抽
象表式、用纯逻辑的方法得出对于具体问题的答
案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唯物辩证法要求切实
地、具体地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中所发生
的一切过程。

唯物辩证法不仅教我们抓住一切事物和他们
底一切发展阶段上所共同的一般之点，而且还教
我们把握某一事物及其某一发展阶段所特有的矛
盾发展底特殊点。……

黑格尔首先发扬了对立底一致底法则，不过

黑格尔脱离
具体性。
具体分析是
确实根据。

社会中的
矛盾

他唯心地曲解着这一法则。黑格尔认为认识底对象是思想底发展阶段，不是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实在的事物，而只是思想的、抽象的事物。因此黑格尔底对立底一致底法则，是具有最普遍的性质的思维法则，这种法则是脱离了自然和历史之具体的、实在的发展的。[第 208~209 页]

对于实在的现象发展之具体的分析，应该作为被应用于任何事物的这一法则（对立底一致底法则）底确实的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底唯心的对立一致底学说倒转过来，唯物地改造了它，把它变成客观世界和反映客观世界的思维之普遍的发展法则。当他们将这一法则应用到历史过程底认识上去时，他们看出社会发展底基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矛盾，社会斗争底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与思想的上层建筑间的矛盾。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底经济结构底认识上去时，他发现了这一社会底基本矛盾——生产底社会性和占有底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于个别企业中的生产底有组织和全社会中生产底无政府之间的矛盾；它底阶级的表现则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间的斗争 [第 209~210 页]

邬梁诺夫把马克思底对立体一致底法则，提高到了更高的阶段。他特别注意于阐明这一法则

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分析。我们对中国革命也应如此。

为辩证法之实质、核心底全部意义。……邬氏根据理论和革命实践之不可分裂的一致，说明和发挥了这一辩证法底实质，他把这一法则应用到劳工社会斗争底各个重要阶段底分析上去。发展底内部矛盾性底认识，对于邬氏底分析俄国革命底发展，对布尔乔亚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底学说，有着极重大的意义。波尔塞维克^[1]把布尔乔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一根链条底两个环子，看作俄国革命力量底统一的，整个的图景”。^[2]邬氏及其信徒，重视俄国的“军阀、封建的帝国主义”底一切特征，这种特征促使反帝制的在劳工集团领导之下的布尔乔亚民主革命之史的发展，有跟攻击资本主义的劳工社会革命相联合的可能。

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条件中

邬梁诺夫对抗当时的右翼机会主义者，如卡米业夫^[3]、季诺维埃夫等人，着重地指出在俄国发展底历史条件中布尔乔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底一致，但同时他也跟托洛茨基作争斗，因为托氏不了解革命发展底阶段，不了解各个革命

[1] 波尔塞维克，即布尔什维克。

[2]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8页)

[3] 卡米业夫 (1883—1936)，现译加米涅夫。曾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資本主義剝削底經濟基礎和各種形式，以及資產集團與勞工集團之敵對性底增長，不斷地探討着資本主義死滅和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前提發展之史的傾向。誰要是明白商品論和剩餘價值論底辯證法，即以對立底一致律為根據的辯證法，他就容易了解整部資本論底辯證法。

鄒梁諾夫把馬克思底對立體一致底法則，提高到了更高的階段。他特別注意於闡明這一法則為辯證法之實質、核心底全部意義。簡單地說，可以把辯證法解說為論對立底一致的學說。這樣的解說就抓住了辯證法底核心，但這還須要加以說明和發揮。（見鄒氏文集卷九，頁二七七。）鄒氏根據理論和革命實踐之不可分割的一致，說明和發揮了這一辯證法底實質，他把這一法則應用到勞工社會鬥爭底各個重要階段底分析上去。發展底內部矛盾性底認識，對於鄒氏底分析俄國革命底發展，對布爾喬亞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底學說，有著極重大的意義。波爾塞維克把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看作「一根線條底兩個環子」看作俄國革命力量底統一的整個的圖景。鄒氏及其信徒，重視俄國的「軍閥封建的帝國主義」底一切特徵，這種特徵促使反帝制的在勞工集團領導之下的布爾喬亞民主革命之史的發展，有跟攻擊資本主義的勞工社會革命相聯合的可能。

鄒梁諾夫對抗當時的右翼機會主義者，如卡米葉夫、季諾維埃夫等人，着重地指出在俄國發展底歷史條件（條件）中，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底一致。但同時他也跟托洛茨基作爭鬥，因為托氏不了解革命發展底階段，不了解各個革命階段上勞工集團對農民應取的態度。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注的手稿。

阶段上劳工集团对农民应取的态度。

列宁论帝国主义

邬梁诺夫又以对立体一致底法则，作为分析帝国主义之根据。他视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特殊的新阶段。这里他发现了一般和特殊底一致，揭露了资本主义之一般的规律性和矛盾与帝国主义阶段所发生的诸特殊性底一致。他指出，这些帝国主义底特征（特殊性）不但不消除，而且还加强了一般的资本主义矛盾底表现；垄断和竞争底一致和编合，不但不减轻资本主义矛盾底尖锐性，而且还大大地加强了它，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竞争底深刻化和尖锐化。

新经济政策的两重性

邬氏又揭示了新经济政策底两重性；这一政策容许资本主义分子与社会主义分子底斗争而促使社会主义分子底必然胜利；这一政策是“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底两方面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分子跟资本主义分子斗争底矛盾过程，也是资本主义成份被社会主义成份克服的过程”。

两个世界的矛盾

资本主义矛盾底尖锐化，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时一种新的矛盾又应运而生了。这一新矛盾已非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而是整个资本主义跟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从根源上展开了资本主义底一切矛盾，并将它们集合成为一个结子，将它们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底生死问题了。

第二节 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

唯物辩证法底另一法则就是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这一法则，对于发展过程底理解，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因为由一种质变到另一种质的革命的跳跃式的转变，就表现在这一辩证法则上。

质是现象的定性，规定现象之特殊个性，因此使各现象能互相区别。

科学研究要从质之特点的认识入手。

物质运动之各种不同的形式。每种事物有一定的运动形态，有些有几种运动形态，但必有一种运动形式是表〔现〕该物的特质的。不同的运动形态，就是表现不同的特

所谓质（或质地——沈，）应当了解为现象底定性，各种现象就以其定性之不同而互相区别，并由于此种定性而使它们成为它们。科学的研究，只是从某一客体与其他物体不同的质的特点上去观察此客体时，它才能达到成功。表现事物之特质的定性，就是事物底质地。客观现实各种事物之质的繁复性，这是由于吾人周围之世界中存在着物质运动之各种不同的形式的缘故。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处于一定的物质运动底形态中。自然，也有一些事物中存在着不止一种运动形式而有好几种形式。例如人的机体中就包含着几种物质运动底形式：从机械运动起到思维为止。但是对于每一个特殊的、一定事物，总有某一种运动形式是表现它底特质的、对于它有决定意义的。因此，当我们谈到“质”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并不是与客观世界无关的各种质底存在，而是具有这种或那种质地的事物或现象本身。质地是具有客观性的；自然界中事物之质的定性，系离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人底思维仅仅反

质或定性。映着客观过程底这种质的定性。

质或定性是
客观的。

事物因质的
不同而区〈互〉
相区别，但无绝
对界限。世上无
绝对独立的物事
〈事物〉，每一事物
包含着某种同
他物相似的共同
点，同其他事物
维持不可分离的
关系。

质的定性是
发展变化的，说
不变化不对。

质是过程内
在的定性，特性
则表现此物与他
物的关系上的这
一定性。物之质
的定性在物之许

由于质底不同，事物就互相区别、互相划分开来。固然，这种划分区别的界限并不带着绝对性的，因为自然界中没有绝对个别、绝对单独的事物。每一事物总包含着跟其他一切事物相似的某种共同点，它经常地跟这种共同点维持着不可分离的联系。事物之质的定性，并不是一种固定的、不变的东西，像中世纪时代的烦琐哲学（或经院哲学——沈）底代表们所设想的那样。现实现象之质的定性，是经常地在发展着、变化着和复杂化起来的。

若要正确地理解质地这一范畴，就必先考察质地和本性（quality and property,）^[1]后者亦译特性——沈）底问题。黑格尔在他底《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中讲到过这个问题。他写道：“质地即本性，这首先和主要地

[1] 毛泽东在括号上画了一道斜线。

多特性上表现出来，如玫瑰的质之定性，在玫瑰之香气、颜色等许多特性上表现出来。

质同物之本身不可分的联系。物失掉某些特性还不失去质之定性，但如失了质的定性，就变成他物了。

质的定性表现为特殊的规律性。

只有认识了质的定性，即特

是指这一种意思来讲的：就是它在外部的关系上表露自己为内在的定性。”¹¹（见《逻辑学》页五四）这里黑格尔底意思是说，质地表现某一现象，过程或事物所具有的内在的定性，而本性或特性则表现此事物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上的这一定性。举例来说，譬如玫瑰花这一种花，具有植物形态之一底一定的质地，这一质地也就是它跟其他一切植物形态相区别的定性。而它底这一定性，是在它底许许多多特性上——香气、颜色等等上表现出来的。

质地跟事物之存在（being）本身不可分离地联系着。事物失去了这个或那个本性，它还不失去它底定性，可是假如失去了质地，它就不成其为它了，它变成了别种事物。事物之质的定性，表现于特殊的规律性，表现于它底发展底一定性。事物之科学的定义，只是当它把握住事物之质的定性时，它才具有实在性。

然而事物底认识却也不只限于质一方面底把握，它同时还包括存在于被考察的事物之量的定性。什么是量呢？我们先来看一看黑格尔下量底

[1]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7页）

殊规律性时才算 定义。

认识了某物。

量的定性 黑格尔写道：“质是一般地跟存在同一的、直接的定性，它跟在它以后被考察的量（或数量——沈）有区别；量也是存在底定性，可是它已非直接跟存在同一的，而是对存在无关重要的、外在于存在的定性。”^①（见《黑格尔全集》卷一，页一五七。）

在一定时期内，数量改变，质地不变。

这样看来，黑格尔确定数量为对存在无关重要的外在的定性。在这一定义中，真理底种子是在：在一定的时期以内数量底改变实在是外于质地的（意即与质地无甚关系的——沈）。数量虽然改变，质地却依然如是。然而这只是指在某一瞬间以前而言，从这一瞬间起，数量往后的改变即行促成质地底变化。

与过程同一的直接的定性是质，量是过程的定性，但非与过〔程〕直接同一的，而是在某一一定时期内对过程无关重要的、外在的定性。量虽增减，质仍不变。但在一定的瞬间以后，事情就生变化，量的改变促成质的改变。^②

量也是客观

现象之量的定性，跟质的定性一样，它也具

[1] 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2页）

[2] 以这种方式排印的是毛泽东写的批注。

的，量的概念是现象本身所具有的那些数量关系在人的意识上的反映。科学的研究，不但在质的区别上，也应从量的复杂性上去认识他。

量同质是经常在一起的。

一定的特殊的质必具有一定特殊的量，单纯的质和量是没有的。

质和量在事物中组成不可分离的一致体，这是不同定性的一致，即是对立的一致。

有客观性的。量底概念，是现象本身所具有的那些数量关系在吾人意识上的反映。所以科学的认识，也应当不仅从客观现实底质的区别上，而且也应从它底量的复杂性上去把握和反映它。事物之量的定性不存在于它底质的定性以外，量的定性是经常跟质的定性密切地联系着的。譬如我们讲到事物之量的增或减时，我们是指事物质地底增或减。同时这里必须指出，一定的质必具有一定特殊的量的度量。

譬如说，在自然界中，没有单纯的质和量，而只有具有质的和量的定性的事物。事物之质的和量的定性组成不可分离的一致体。但是这种一致是不同的定性底一致，是对立底一致。……然而事物之量的变化，是在一定的、与它相适应的质底基础上发生的。在一定的时期以内，质限制着事物之量的变化底界限。例如封建的生产方式，极度地限制着生产力，物质财富增长底可

但是事物之量的变化是在与他相适应的一定的质的基础上才发生的，在一定时期内质限制量之发展。建封〈封建〉制度、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三例。

量的变化是以质的定性为基础而受其限制的，但同时质〈量〉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于质。这即是说，受一定的质规定的事物，只在某一瞬间〔以前〕是这样，等到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质的限度和一定的界限时，量就要求质的变

能，限制着社会发展底整个水平。这些封建的关系被布尔乔亚革命所扫除，代之而兴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的作用，可是当它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就变成社会继续向前进展底极端的障碍了。唯其如此，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劳工专政条件之下，社会生活各方面底发展达到了空前未见的速度，这是因为就苏联底生产关系形态言，它代表一种新的质地的缘故。

简言之，量的变化是以事物之质的定性为基础、为限制的。同时，事物之量的变化自身又反影响于它底质的方面。一定的事物之成为该事物，只是在某一瞬间以前。量的变化过程达到了一定的质的限度和在一定的界限底条件之下，它就要求质底变化，引起由一种质变为另一种质的转变。同时，这一转变也是由质到量的转变，因为旧的质一经消灭，新的数量的向前进展就发生了。……

化。同时这一变化，也是由质到量的变化。旧质一消灭，新量就向前发展了。

只有经过量的变化才能发生质的变化。

……恩格斯写道：“我们为着自己的目的，可以把这一法则这样地表达出来：即在自然中，只有经过物质或运动（即所谓能力）之量的增加或量的减少才能发生质的变化——每一个别的场合均以一定的方式变化着。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发生于不同的化学成份，或是发生于不同的运动（能力〔energy〕）底数量或形式，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是最普遍的情形。这样看来，若不增减物质或运动，就是说，若无物体之量的变化，则此事物之质的变化也不可能。”^{〔1〕}（见恩格斯著《自然底辩证法》）

同一化学原素纯数量的增减引起质的差别。

为证实这一思想计，恩格斯在《反杜林》和《自然底辩证法》中，举出了许多例子，来证明同一化学原素之纯数量的增或减如何引起质的差别。[第216～222页]

量的变化，在一定限度内，

根据上面的说明，可以知道现象之量的变化，在一定的限度以内，带着同质事物之不断增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带着同质事物不断增长的性质。即是说在一定限度内，量虽变化，该事物仍为该事物。只有在一定阶段内，在一定条件下，量的发展才能求质的变化，事物此时就失去旧质而变到新质事物。这种质的变化过程同量的变化过程相反，量是渐渐的变，质是跳跃的变。

长底性质。在同一度量界限以内数量上变化着的事物，不停止其为该事物的。只在它底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事物才失去它底原有的质地而变成另一事物、新质的事物。由一种质变为另一种质的转变，跟不断的量的变化过程相反，它不是渐渐地发生而是跳跃式地完成的。事物既变成了新的质地，它只表现着各种不同的特性、各个不同的方面，在诸对立底斗争没有引起质底改变以前，它永远是这个质地底事物。跳跃、连续过程底中断，也就是由一质变为另一质的转变之点。[第 223 页]

恩格斯予机械宇宙观以彻底的痛驳，同时指出来说，“假使我们把一切质底区别和变化都解释成量底区别和变化，解释成机械的转移位置的话，那末我们必然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以为一切物质均由极细小的同一微分组合而成，物质底化学原素底一切质的区别，是由这些结合成原子的微分底空间的组合和它们（指微分——沈）

底数量的差别所造成的”。（见前书，页八一。）^⑩

[第 224 页]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596～597 页）

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

(1937年8月1日)

周、博、林^[1]:

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2]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洛^[3]毛
东西

[1] 周，指周恩来。博，指博古，即秦邦宪（1907—1946），江苏无锡人。林，指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他们当时是中共中央委派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代表。

[2] 指当时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朱德、彭德怀等红军总部领导人。

[3] 洛，指洛甫，即张闻天（1900—1976），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负总责。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8月1日)

拟复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赴京，如何盼复。

[1] 毛泽东等于8月1日收到张冲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等电的主要内容。

在“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 开幕式上的演讲^[1]

(1937年8月1日)

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来了！平津失守了！如果我们还不动员起来抗战，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不要以为平津隔我们这里还远呵，我们这里过去就是山西，山西过去，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用大炮飞机轰炸的平津。所以现在全国无论何处，都应该紧急动员起来。苏区是全国抗日模范区，在这个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我们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做一个榜样，表示我们抗战的决心。很久以前，我们就两次三番地对他们说过，希望他们坚决抗战，他们不听，始终动摇不定，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所致。华北当局始终是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军事上不作充分的准备，对于民众是怀着不必要的戒心，不发动民众，不扩大民众爱国运动。相反的，还要出告示下戒严令，要民众“镇静”，使有着满腔热血的爱国民众们动弹不得，这样干的结果，便把平津丢掉了！我希望全国守土抗战的将士们，对于这个悲痛的教训，有所警惕！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1] 8月1日，延安召开第一届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作演讲。

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

我们今天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就是向着这个方针迈进。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底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我们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收复平津！

保卫华北！

收复东四省！

八一运动大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致朱德、周恩来等电^[1]

(1937年8月1日)

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兵力和作战方针，不应请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待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向南京面交国防计划等事^[1]

(1937年8月3日)

周、博，并告叶：

(甲) 国防计划宜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携往面交，不宜由电报拍往。(乙) 此种计划我们正在考虑中。请将你们商定者，连同红军作战的方针、步骤等，一并于今日电告。(丙) 关于日寇西进危险、中苏国交及红军抗日须求彼方协助等，已分电战士与书记处。(丁) 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 发表宣言。(二) 确定政治纲领。(三) 决定国防计划。(四) 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 红军作战方针。

洛毛

江辰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并告叶剑英的电报。

对国防问题的意见

(1937年8月4日)

周、朱、叶^[1]，并告博、林，彭、任，刘、张，贺、关，陈、聂，徐、程，陈、王，萧、郭^[2]：

国防问题，我们意见如下：

甲、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

乙、第二防线大同、保定、马厂、潍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

丙、至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叶，指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1937年8月初，经中共中央决定，他们正准备前往南京出席商讨国防问题的会议。

[2] 博、林，指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当时任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刘、张，指刘伯承、张浩（林育英），当时分别任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陈、聂，指陈光、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陈、王，指陈再道、王宏坤，当时分别任红军援西军第四军军长和政治委员。萧、郭，指萧克、郭述申，当时分别任红军援西军第三十一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只顾此线而不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

丁、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

戊、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

己、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庚、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

辛、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1]、晋、绥^[2]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3]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与必要的补充。

壬、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癸、其余由你们相机提出，不可过多，要捉住中心。

洛^[4] 毛

八月四日

[1] 察，指察哈尔省，1952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2] 绥，指绥远省，1954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

[3] 热，指热河省，1955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4] 洛，指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负总责。

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8月4日)

红军闽粤边区部队被国民党军阴谋缴械事件^[2]，是极严重的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闽粤边区游击队的领导人何鸣，对国民党利用谈判改编之机消灭红军的阴谋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在7月16日被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包围缴械。

复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8月5日)

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复朱德、周恩来、博古等电^[1]

(1937年8月5日)

我们认为朱德同志以即去南京一行为有利。^[2]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电的主要内容。

[2] 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8月5日致电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说他们反复考虑朱德目前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意见不完全一致，朱德本人认为他目前去南京较以后去有利。6日，朱德、周恩来从云阳镇抵达西安，于9日与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参加国防问题讨论会，并同国民党谈判。

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1]

(1937年8月5日)

朱、周、博、林、彭、任：

支申电^[2]悉，答复如下：

甲、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具体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以出击侧面的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便于派一部远出热河，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博古（秦邦宪）、林伯渠，以及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指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1937年8月4日申时给洛甫（张闻天）、毛泽东的电报。电报就对日抗战的方针问题提出：（一）要求南京要有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和部署，然后从局部抗战做起。（二）争取我们在抗战中参加和领导。（三）不反对在推动全国抗战中要积极准备。关于如何实现上述第一、二项方针，电报提出，作战方针要以分区集团的防御钳制敌人，而反对单守不攻与退却逃跑。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争取消灭伪军与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争）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绥远、宁夏与陕甘一部）。

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这样提出较自由、活泼而有效。即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

乙、使用兵力问题。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对蒋^[1]不说几分之几，事实上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依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

丙、补充接济的后方问题。除陕甘不必提出外，可以要求包头、宁夏，但必须着重要求晋西、宁、绥、榆神府^[2]，事实上马鸿逵^[3]恐难合作，仅在中苏军事同盟订立后有此可能。

洛毛
微午

[1] 蒋，指蒋介石。

[2] 榆神府，指陕西北部的榆林、神木、府谷三县。

[3]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

在延安“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 闭幕式上的讲话^[1]

(1937年8月6日)

运动大会精神很好，我们应该把这一运动大会精神发扬到全苏区去，发扬到每个人民中去。因为我们体育运动应该是大家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要唤起民众坚决打日本，坚决抗战是要每个人参加的，正好像体育运动也要大家参加一样。

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把这一大会的精神带到各个地方各部队中去。

[1] 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于8月6日闭幕，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致闭幕词。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8月8日)

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在洛川，时间十五号左右，由云阳到洛川须几天并估计情况是否可能。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关于研究讨论红军出动问题、作战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8月8日)

三个方面军宜靠拢前进，凡事以谨慎为宜。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出动抗日事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 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8月9日)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大规模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在华北实际是节节退却。

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态度

(1937年8月10日)

雪枫^[1]同志：

各电均悉，甚慰。

甲、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2]、晋、绥^[3]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也要使他们知道，并照昨电所开五类十九种物品要求补充，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

[1] 雪枫，即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在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

[2] 察，指察哈尔省。

[3] 绥，指绥远省。

乙、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朱、周^[1]已于九日飞京，俟接其回电立即出动。如他们问及如何还未改编，则答以因为南京的拖延（不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表指挥部，也不颁布番号，最近几天内才把番号颁下，但指挥部还未委任）。

丙、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余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此点与阎^[2]交涉一定要办到。

丁、太原公开办事处^[3]立即开设，你为主任。

毛泽东
八月十日

[1] 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他们当时已赴南京参加商讨国防问题的会议。

[2] 阎，指阎锡山（1883—1960），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指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

致朱德、周恩来电^[1]

(1937年8月12日)

阎锡山已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

[1] 这是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和韦尔斯的谈话^[1]

(1937年8月13日)

如果有国民党政府的合作，这个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1937年8月13日，毛泽东再次会见美国记者韦尔斯，给她一份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案。这是毛泽东和韦尔斯谈话的一部分。

致彭德怀电^[1]

(1937年8月14日)

红军本可迅速出动，因南京对于宣言、纲领、指挥部、参谋长等问题诸多留难，以致尚须待朱德、周恩来此次在南京谈判结束才能确定出动日期。此点可向阎锡山说明。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复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37年8月14日)

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我们的修改案即告。

[1] 周恩来、朱德等于8月12日在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其间康泽捣乱，他提出：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当时，周恩来、朱德就给以严辞批驳，并把这一情况及时报告毛泽东。8月14日，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这是电报的主要内容。最后宣言还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方案修改，于9月22日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欢送晚会上的讲话^[1]

(1937年8月15日)

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以说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次战争可以说带有最后一次的意义，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到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

[1] 丁玲、史沫特莱等发起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军奔赴前线工作。该团分通讯、宣传两股，通讯股专门从事战事采访；宣传股专门以文艺形式从事抗日救亡宣传，以鼓舞士气，动员民众。1937年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

和丁玲的谈话^[1]

(1937年8月15日)

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好，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找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边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没有搞清楚，这不要紧。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对他们不要有成见，不要轻易作结论，要帮助他们；有这样几个人，你们就有事情做了。

[1] 丁玲，当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毛泽东非常关心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这是毛泽东和丁玲关于西北战地服务团谈话的一部分。

红军主力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

(1937年8月17日)

张淮南^[1]先生转朱、周、叶^[2]三兄：

南密铣辰电悉。

甲、同意我军主力集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但前进不走平汉路^[3]而走同蒲路，在侯马上车，至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

乙、无钱买米，速领得八月份六十万及开拔费。

丙、皮衣、军械、弹药之补充速令太原准备。

丁、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4]节制，速通知阎。

毛泽东

十七日

[1] 张淮南，即张冲，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当时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谈判。

[2] 朱、周、叶，指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当时他们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

[3]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4] 阎百川，即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坚决不同意黃白案^[1]

(1937年8月18日)

周、叶：

黃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根本问题解决后，我军主力（不是全部）决定由韩城渡河，决不走陇海线和平汉线。

洛毛
十八日

[1] 黃白案，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黃紹竑和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的八路军出动方案。具体内容是：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周恩来、朱德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期间，白崇禧、黃紹竑提出这一方案。这是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8月18日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叶剑英发给周恩来的电报。

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1]

(1937年8月18日)

博、林，彭、任，并告周、叶：

甲、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 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 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 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2]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乙、我们对策见中央给周叶训令^[3]。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和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并告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3] 指1937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训令提出的十项条件主要是：(一) 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二) 发表边区组织。(三) 发表指挥部。(四) 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五) 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六) 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七) 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八) 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九) 不分割使用红军。(十) 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锡山节制。

丙、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1]中慎重讨论。

丁、请博朱彭任刘张贺关^[2]八同志一齐出席，并请于二十日由云阳^[3]动身。

洛毛
十八日未

[1] 洛川会议，指1937年8月22日—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了红军改编后对日作战的指导原则。

[2] 博朱彭任刘张贺关，指博古（秦邦宪）、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林育英），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

[3] 云阳，镇名，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北部。当时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

给任弼时、邓小平的信^[1]

(1937年8月19日)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事请为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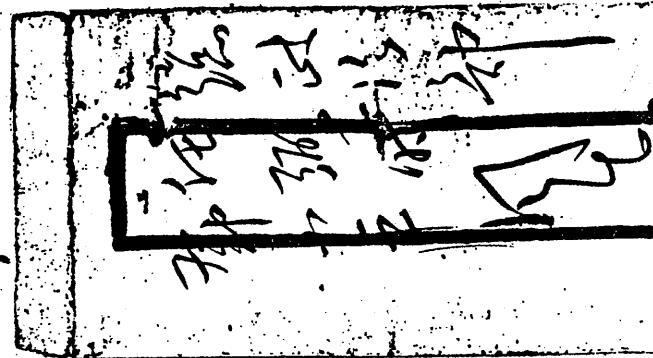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写给任弼时和邓小平的信，请他们帮助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到前线采访，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任弼时
邓小平



斯洛夫人随军越战地担任
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請你們給她
以帮助，出錢等等事情為解決。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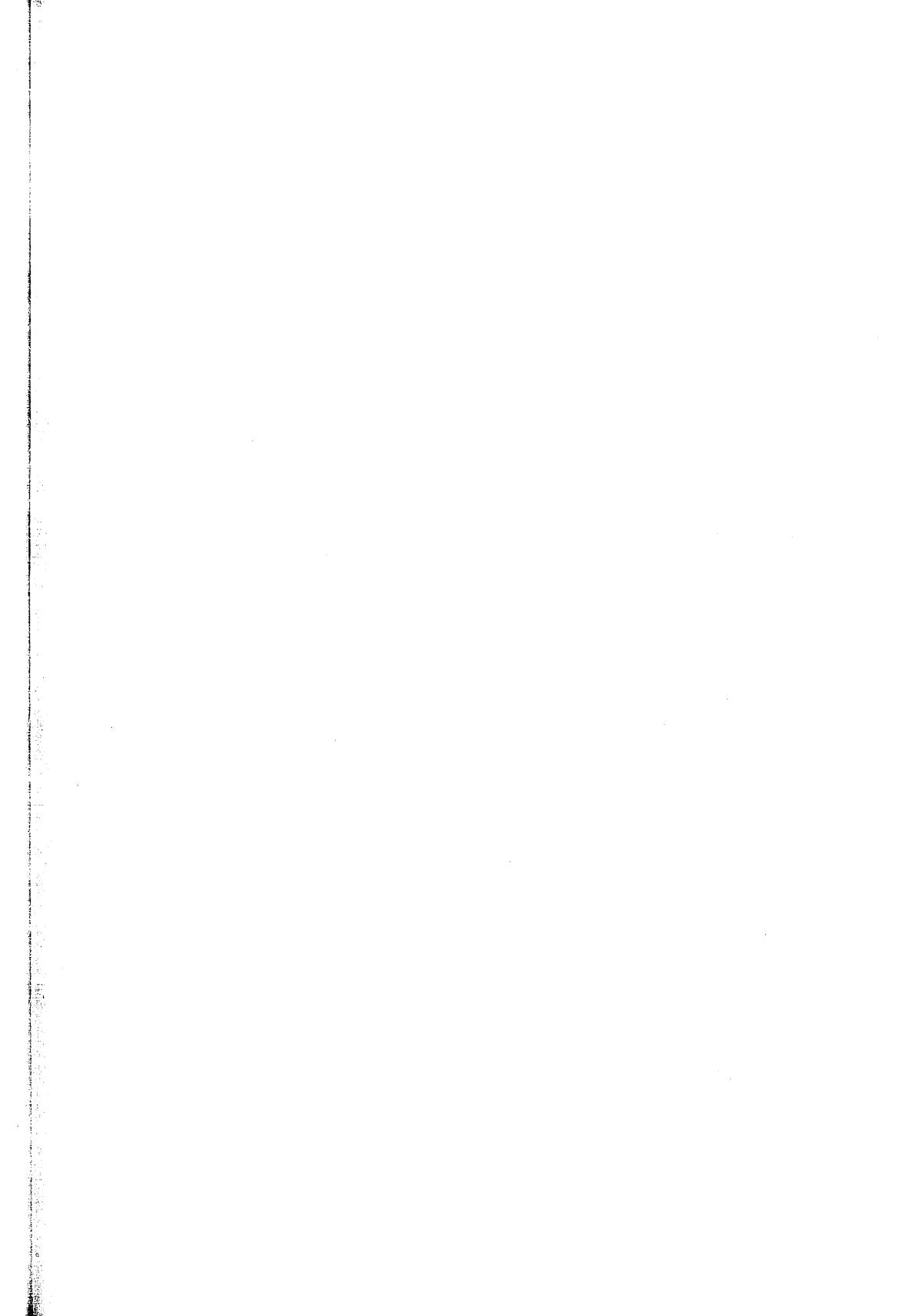
毛泽东致任弼时、邓小平信的手稿和信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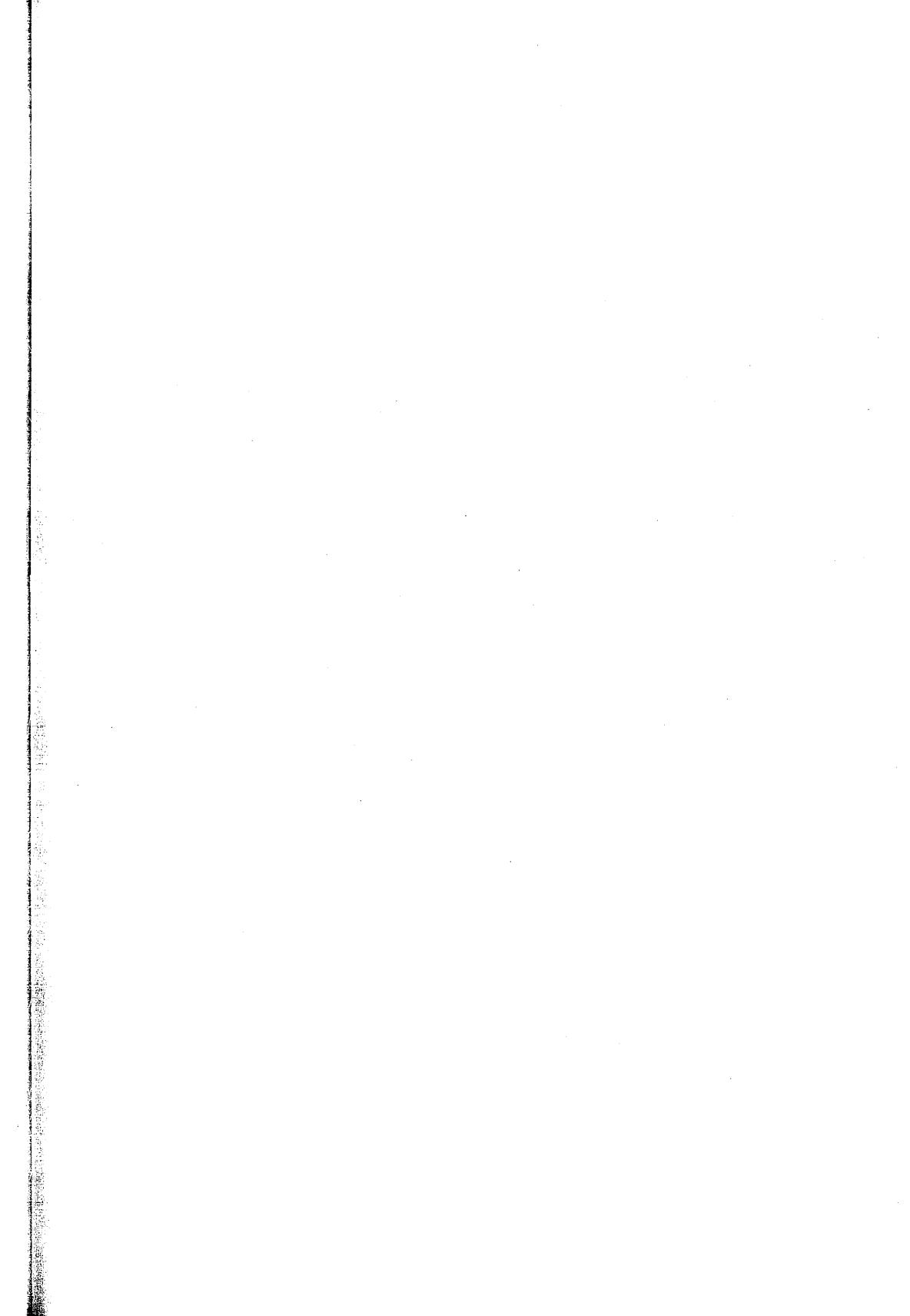
致谢觉哉电^[1]

(1937年8月21日)

朱、周赴宁已回，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朱为总指挥，彭为副。全国性抗战已开始，我先头部队于十九日出发，其余俟合作宣言发表才开。干部须在本地物色，暂无适当之人可派，回族可组民族性的党，其名称可用回族抗日救亡协会等。嘱我不要回陕。

[1] 这是毛泽东致谢觉哉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0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 7 号兴力工业中心 5 楼 09 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 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 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 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